全球城市史

THE CITY: A GLOBAL HISTORY

乔尔·科特金/著
Joel Kotkin
王旭等/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文版序言

21世纪初，中国城市人口首次超过总人口的半数，再次迈进城市史的前沿。经历了近500年相对滞后的历史，中国又重新成为全球建筑、社区规划和经济基础设施开发方面万众瞩目的焦点。

但是，如果说上海、广州、北京和其他数十座城市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和新的房地产开发能够代表晚近现代化的话，中国的城市传统的深厚根基也不可小觑。她有别于欧洲和美洲城市建设的历史传统可以追溯到4000年前，其延续性在这个地球上任何一个文明都无法与之媲美。

从传说中的商周时期开始，中国的城市主义就自觉不自觉地与国家的演进联系在一起，其原因难以洞察。在中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其城市的建设服务于国家的管理。和世界其他文明一样，中国最早的城市也履行着作为神圣、安全、繁忙的基本功能——有环绕的城墙拱卫其安全、有商业市场维系其经济繁盛的宗教中心。

当然，中国与其他早期城市文明既有共同特征，又具有自身特点。创建伊始，中国的大城市就严格遵从“宇宙模式”建造。中国的城市建设者们严格而广泛地遵循这种独特的模式建造城市，甚至都城远距离搬迁，也是如此。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以国家为中心的城市主义模式最终构织成一个更为广阔的城市网络，较小的行政管理中心也随之在全国兴起。在发达的农业和长期稳定局面的维系下，这些城市在发展规模和气势上都取得了不俗的业绩。大运河连接了相距遥远的各大都市，向广袤的地域运送管理人员、货物和文人墨客。

这种局面发生在西方世界城市式微之时。从罗马帝国垮台到文艺复兴这段时期，在西方历史学者眼中是城市衰退阶段，而在中国，则是一个城市建设兴盛时期。洛阳、长安和开封等都城在这段时间相继跻身于世界最大城市的行列。这是本书所关注的一段重要时期，欧洲以外的其他地区如近东地区、北非和美洲，城市主义也在此时期兴起。

中国“模式”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她辐射范围之广泛。她影响到亚洲其他国家的城市建造者如朝鲜、越南，尤其是影响到日本。造访汉城（首尔）和京都以及顺化的游客都可看到这种影响。

到公元第一个千禧年的后半期，中国也出现了新型城市的征兆——商业中心。虽然商人和工匠们几乎接近于社会金字塔的最底层，但中华帝国日益增殖的财富产生了萌生资本主义经济的大量机会。

第一次商业城市的兴盛发生在唐宋时期，中国商人的活动范围开始遍及世界大部分地区。当时中国的航海者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在使用指南针方面居领先地位，所绘制的海图远至好望角。宋代游客周去非写到：“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马润潮（Laurence J.C. Ma）：《宋代中国的商业发展和城市变革》（Commercial Development and Urban Change in Sung China），安阿伯，1971，第30~31页；L 卡林顿·古德里奇（L Carrington Goodrich）：《华人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纽约，1943，第151页；王才强（Heng Chye Kiang）：《贵族与官僚城市：中世纪中国城市景观的发展》（Cities of Aristocrats and Bureaucrats: The Development of Medieval Chinese Cityscapes），火奴鲁鲁,1999，第151页。这种现象直至20世纪后期才再次出现。

远洋经济交往的增长刺激了以商业为导向的世界性城市如广州和漳州的发展，这些城市不久就跻身于世界最大的港口之列。这些城市不同于那些中华帝国的传统城市，把它们与亚利山大里亚、开罗、安条克大型商业中心归为一类可能更恰当。

这些沿海城市与全国内部贸易网也有密切联系，最著名的是在宋代的开封。在帝王宫殿之外的街道上人流如过江之鲫，兴盛的店铺、酒肆和妓院比肩而立。对传统商业活动如严格宵禁管制的放松，刺激了城市文化名副其实的发展，两到三层高的商业建筑出现了，大众文学和各种群众娱乐活动非常活跃。马润潮：《宋代中国的商业发展和城市变革》，第5~6、160页；王才强：《贵族与官僚城市：中世纪中国城市景观的发展》，第135、150、170、192页。

13世纪初蒙古人入侵尽管使许多宋朝人痛惜不已，然而，却加快了上述这些趋势。对此，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曾在其著作里有详细描述。这些城市如果得到充分发展，将使中国在城市发展方面遥遥领先。

可惜事实并非如此。到16世纪，中国向全球经济的冲刺力减弱。随着贸易的萎缩，尚在上升阶段的商业中心开始落在更有活力的正在崛起的西欧城市后面，其结局对中国来说是凄惨的。

这种衰落有很多原因，有些与中国朝廷的腐败有关，有些与上流社会中盛行的中国比世界其他地区优越的认识有关。此外，新儒家理念的复兴也排斥处在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精神。而就在这段时期里，西方具有商业冒险精神的城市如威尼斯、后来的阿姆斯特丹以及伦敦不久就获得了在全球、包括对中国沿海的支配地位。

这样一来，中国的重要性开始下降。不过，即使在那些欧洲的列强超越中国的暗淡时期，中国城市主义精神也并未完全泯灭。欧洲列强出于在东亚建立桥头堡的需要，促成新城市的发展，最著名者如上海、香港和新加坡。这些城市有助于培植中国城市主义的现代化，也促成了新的、更近代化的商业城市的发展。

虽然经常充斥不平等和滋生腐败，但是这些西方殖民主义的产物也在中国传统城市主义与崛起的全球世界体系相联系的过程中提供了桥梁。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受控于外国人，但中国居民的创业精神产生了很多新企业和商业文化，这些如我在较早的论著《部落：在新的全球经济中种族、宗教和思想如何保证成功》中所写，将会动摇资本主义世界。

近20年来，在中国现代化政策的带动下，新的中国的城市主义在其母体上再次出现，其中包括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都城和正在崛起的世界城市上海。随着工业和科技实力的扩展，中国在从事着世界历史上最雄心勃勃的城市建设活动。

结果，尽管尚未居领先地位，但5个世纪以来中国再次成为现代世界城市规划和建设的中心。中国城市居民层次在提高，收入在增长，将可能塑造很多新的城市生活模式，这是对21世纪城市生活非常关键的交

通和社会形式的伟大实验。

这种变化的速度是突破性的。随着农民迅速地离开农村，农业经济转变为一个工业甚至是后工业经济，中国试图在二三十年的时间完成西方世界用了150年时间才完成的事情。

这种激烈的转变伴随着社会不稳定的潜在问题，正如19世纪初英国工业革命后的那段时期所发生的一样。同时，环境问题，从潜在的气候变化到人类健康和演进问题，都可能危及中国城市化的质量和走向。

在这样的环境下建设城市文明是一种巨大的挑战。中国如何面对这些问题将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决定未来几十年内国家繁荣问题，也将在全球范围内决定未来的城市生活。

乔尔·科特金

2005年11月于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

前言

城市的演进展现了人类从草莽未辟的蒙昧状态到繁衍扩展到全世界的历程。正如法国神学家雅克·埃吕尔曾经注意到的，城市也代表着人类不再依赖自然界的恩赐，而是另起炉灶，试图构建一个新的、可操控的秩序。

埃吕尔写到："该隐创造了一个世界，他用自己的这座城市来代替上帝的伊甸园。"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城市的意义》（The Meaning of the City），丹尼斯·帕迪译，密歇根州大急流城，威廉斯·厄德曼斯出版社，1970，第5页。为了产生一种新型的人造环境，城市建造者们忙碌不已，从中美洲到中国，到北非，到印度，再到美索不达米亚，都是如此。在此过程中，他们构建了社会和道德的秩序，超越了此前制约人类关系的老式部族间和亲族间的联系。

有两个中心性命题纵贯整个城市历史。第一个命题是，尽管有种族、气候和地点等方面的差异，但城市的发展是普遍性的，甚至在迅达便捷的通讯、全球性网络、便利的交通使得城市间更加相似之时也是如此。正如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德·布罗代尔曾经评论的那样："城市永远是城市，不论它位于何处，产生于何时，空间形式如何。"威托尔德·雷布金斯基（Witold Rybczynski）：《城市生活：新世界的城市展望》（City Life:Urban Expectations in the New World），纽约，斯克里布纳出版社，1995，第49页。

*本书开头提到的16世纪贝尔纳尔·迪亚斯的日记以惊人的方式宣告了这一命题。作为追随科尔特斯墨西哥城前身特诺奇蒂特兰城的征服者，一西班牙海军大将。——译者注征服墨西哥的士兵，迪亚斯邂逅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异族城市：浩大的特诺奇蒂特兰城，即今天的墨西哥城。该城居然展示出只有在欧洲城市如塞维利亚、安特卫普或君士坦丁堡才能看到的种种特征。

像欧洲城市一样，特诺奇蒂特兰城也是作为一个巨大的宗教中心、一个神圣的地方而立足的。它位于一个具有天然屏障、安全的地方，可

以培植复杂的城市生活。这座巨大的阿兹特克帝国都城也曾自诩有巨大的市场，该市场尽管提供了很多稀奇古怪的异域物品，但像大西洋彼岸城市的市场一样，它们发挥作用的方式是一样的。

这种共性在今天全世界的城市都可看到。东亚、英格兰东部或洛杉矶巨大郊区的治安警力、商务中心、宗教设施都按同样方式运作，在大都市发挥着同样关键的作用，甚至拥有共同的建筑模式。在这里，对城市的“感觉”几乎无处不在——繁忙的街道上，非正式的市场上，高速公路交汇处，都有同样快节奏的速度；同时，也能够感觉到希望把城市做大做出名、享有独特市政属性的需要。

很多城市史学者都把这种现象认定为一种特殊的城市——主要表现为中心城区的密集而居，纽约、芝加哥、伦敦、巴黎、东京都是其缩影。但我的定义要宽泛得多，我试图把很多新的、横向扩展的大都市区，诸如我现在所居住的洛杉矶和世界上迅速发展着的实际上高度分散化、多极化的大都市区，都包括进来。虽然在形式上与“传统的”城市中心不同，但这些新的城市区域就其本质性特征而言，依然可看成是城市。

这就使我们推导出对城市的第二个命题：成功的城市靠的是什么。早在发轫之初，城市区域就已扮演三种不同的重要功能：构建神圣的空间；提供基本的安全保障；拥有一个商业市场。城市或多或少地都拥有这些功能。一般而言，城市在这三个方面只要有一个薄弱环节，都会损毁其生活，甚至最终导致其衰亡。

今天，全世界各色各样的城市均程度不同地演绎着这些功能。在这个发展中的世界蔓延的城市，缺少一个行之有效的经济体系和稳定的政治秩序是最紧迫的问题。在很多情况下，人们还保持着牢固的家庭联系和体制信仰——或是古代的民间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或是佛教——但是其物质城市的基础却已经被侵蚀了。这就促成新的历史现象的产生，即出现了没有传统的所谓繁荣但仍能保持增长的大城市。

现在西方国家所面对的基本问题，也是东亚和南亚较发达地区将面临的问题是：城市性质的多样化。在这些区域内，城市通常是相对安全

的，而且，即使按历史标准，把其郊区也包括进来，它们仍然可以称得上是非常繁荣的。但是，这些城市日益缺少一个对神圣地点、市政属性和道德秩序的共同认知。

对于这一问题的最有力的解释是，在世界大多数重要的城市核心区，中产阶级家庭的地位在迅速下滑。今天，这些高档城市常常吸引游客，以及在其高端商业服务业做事的上层人口、那些为此提供服务的人，还包括流动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后来可能又流向其他地点。这些短暂繁荣的城市似乎把其最高希望寄托在时新、超然、精当等转瞬即逝的价值上。

但是，这些方面无论其表面如何有吸引力，都不能取代家庭、信念、市民文化、邻里等持久的重要纽带。一个基础狭窄且游移不定或享乐型的经济远远不能发挥足够的作用，以孕育一个向上流动的家庭和以广泛多样性工业为基础的经济。久而久之，这些中产阶级家庭索性到城市外围或城市领地之外的小城镇寻求“避难所”，远离城市中心。

这些现象并没有像世界发展中城市里常见的赤贫或不稳定状况那样构成尖锐的挑战。但是，对城市史的研究也提示我们，一个没有道义约束或没有市民属性概念的城市即使富庶也注定会萧条和衰退。我希望当今的城市，无论位于何处，都能够找到履行其历史作用的方式。唯其如此，21世纪，也就是全世界多数人居住在城市的第一个世纪，才会成为一个城市世纪，这不仅限于人口统计学意义，也体现在更超常的价值上。

读者可能并不完全同意上述分析或者我的很多论断，在某种意义上，这无关宏旨。本书主要不是做深层次分析，而是作为一个指南，以引导读者进一步考察城市经历的本质问题。我希望，一旦读者被带入这个铺陈开来的历史之中，就会更充分理解与认识城市经历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恰恰是这种复杂性和多样性，也丰富了我和我家人的生活。

第一章　神圣的起源

早在墨西哥、中国或欧洲兴起第一批城市之前，城市生活的基本模式就已经在中东地区缓慢成型。现代人类的基本体质的进化形式据说在25万至4万年前基本完成，进而在公元前8000年左右，人类实质上扩展到地球这个星球的所有可居住地区，包括美洲和澳洲。莫里斯（A.E.J.Morris）：《城市结构史：工业革命之前》（History of Urban Form: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伦敦，朗曼出版社，1994，第1页。

随着最后一次冰期的结束，家畜驯养和农耕方式传播开来，相应地产生了定居生活方式。小村落发展成为手工业活动和产品交换中心，而其中最先进的所谓“首发城市”在叙利亚草原的广阔地区，在耶利哥、伊朗、埃及和土耳其等地快速发展起来。A.E.J.莫里斯（A.E.J.Morris）：前引书，第2～5页；威廉.H.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瘟疫与人》（Plagues and Peoples），纽约州加登城，安克出版社，1974，第27页。

美索不达米亚

从巴勒斯坦的西海岸延伸至埃及的尼罗河谷地、再到底格里斯河及幼发拉底河流域的这一地区，构成了所谓的“新月沃地”。德国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沃内·凯勒注意到：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的最初阶段，距离这个“新月沃地”越远，“夜色越浓，文明和文化衰减的程度越深。这似乎就像另外一个大陆的人们如孩子般地在等待被唤醒”。沃纳·凯勒（Werner Keller）：《圣经的历史解读》（The Bible as History），纽约，威廉莫罗出版社，1981，第3页。

现今伊拉克境内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冲积平原，是向城市化骤变的理想环境。在这个后来被希腊人称为美索不达米亚的区域里，有着大片干枯的沙漠地带，其间交错分布着芦苇丛生的沼泽，其水域有大量鱼类，河岸边野生动物随处可见。这里生长着最早的原生谷类、大麦和小麦，能够培育成可食用的农作物，这就使新石器时代的农

夫们的劳动产品有了剩余，这是非常关键的，城市文明起源正是建基于此。戈登·蔡尔德（Gordon Childe）：《历史中所发生的故事》（What Happened in History），伦敦，企鹅出版社，1957，第89页。

即便有这种丰饶的环境，早期城市的建造者也面临着许多严峻的挑战：汉斯·J 尼森（Hans J Nissen）：《古代近东早期史：公元前9000~2000年》（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9000-2000B C ），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8，第56页。矿产资源短缺，建筑用的石料和木材匮乏，雨量稀少，河水不能像埃及那样顺遂天意地灌溉周围的大面积干枯的土地。结果，在这个地区生活的人们不得不修建复杂的水利系统灌溉土地。格雷厄姆·克拉克（Grahame Clark）：《世界史前史概要》（World Prehistory:An Outline），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61，第85～90页。

这种耗时巨大的努力需要一种道德和社会秩序以及人对自然的支配关系，以应对社会的复杂管理和对自然界更有支配力的关系，这是从已经维系了传统的乡村生活千年之久的家族血缘关系中脱离出来的重要一步。最早的城市正是作为这些社会变化的载体而兴起。这些早期的城市聚落最早可以上溯到公元前5000年，但按照现代甚至是古典的标准来衡量，其规模都比较小。甚至到公元前3千纪，巨大的乌尔“都市”也不过150英亩，居住人口约24000人左右而已。蔡尔德，前引书，第92～96页。

祭司阶层成为新的城市秩序的主要组织者。他们负责阐释人高于自然的神圣法则，完善礼拜体系，在复杂的大型公共活动中规范很多往往看似无关的人们的活动。

置身当今的世俗时代，我们很难想像在城市发展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宗教在多大程度上扮演核心角色。例如，彼得·霍尔爵士在权威而又全面的著作《文明世界的城市》（Cities in Civilization）（纽约，潘西昂图书出版公司，1998）中，没有贯穿始终论及一般意义的宗教、伊斯兰教、基督教或者是大教堂在城市史形成中的作用。同样，在托尼·希斯（Tony Hiss）的杰作《地点的经历》（The Experience of Place）（纽约，诺普夫公司，1990）中，对公园、公寓、办公楼和火车站等场所多

有论及，但几乎没有谈到崇拜的场所。像后来的天主教会、佛教、穆斯林、阿兹特克人或印度教祭司一样，苏美尔的神职人员赋予古代的城市以秩序和恒久的涵义。祭司们拟定日程，为全体民众决定何时工作、敬神和举行大型的庆祝活动。蔡尔德，前引书，第137页。

了解了祭司阶层的重要地位，供奉诸神的神庙主宰了早期的“城市轮廓”就不足为奇了。乌尔的南那月神神庙是最早的塔庙之一，此塔70英尺高，俯视美索不达米亚的地平线。梅森·哈蒙德（Mason Hammond）：《古代世界的城市》（The City in the Ancient World），马萨诸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72，第35页；凯勒，前引书，第8页。米尔赛·伊利亚德认为高耸的塔庙构成了直接同宇宙相接的“宇宙山”。米尔赛·伊里亚德（Mircea Eliade）：《永恒回归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Eternal Return），威拉德·R 特拉斯克译，新泽西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1，第13页。

神庙在早期苏美尔城市文明的所谓“内城”中居支配地位。在这片内城的城墙之中，神庙与王室的宫殿和显贵的宅邸比邻而立。这种布局让整个城区充满着一种神庇护下的安全感。哈蒙德：前引书，第37～38页。

神庙建筑群也促进了早期城市的商业发展。除了奴隶之外，普通手工业者和熟练工匠也参与到这些宏大的建筑群的建设中，很多人在工程结束后留在这里以服务于祭司阶层。也就是在这里，约公元前3500年，由于宗教和商业两方面的原因产生了可以识别的最早的文字体系。哈蒙德：前引书，第28页。

祭司阶层也牢固地掌握了物质世界的统治权。他们以神的名义控制公共土地。这个“神圣家族”控制了河渠、所有重要剩余农产品的仓储和分配。《吉尔伽美什史诗》最早形成于苏美尔时代，其中提及的“神圣仓库”一词的含义就是“女神伊丝塔尔的宝座”。

在早期城市中，神庙也起到“购物中心”的作用，它为各种各样的货物提供了一个开放的交易场所，从植物油、动物油脂、芦苇到沥青、席子和石料等。神庙还拥有自己的工场加工衣物和器皿。《吉尔伽美什史

诗》（The Epic of Gilgamesh），安德鲁·乔治译，伦敦，企鹅出版社，1999，第1页；凯勒：前引书，第17页。

日月轮回，朝代更迭，但宗教体制却总能幸免于难。例如，乌尔城的历代征服者都不断修缮乌尔塔庙。神祇的等级和祭祀的方式可能因时间而变化，但神庙功能的核心性却保持了千年之久。蔡尔德：前引书，第102页；哈蒙德，前引书，第44页。

这种模式在苏美尔人全盛时期过后，依然持续存在。实际上，后来出现在这一地区的其他民族——从巴比伦人和亚述人到波斯人——都把他们的城市想象成为最神圣之地，把他们的城市与神密切相连。巴比伦——美索不达米亚最大的城市，被称作“巴比-伊拉尼”（Babi ilani），即“众神之门”，意思是诸神于此处降临大地。伊里亚德：前引书，第14页。

埃及

现在还不清楚是否美索不达米亚直接影响了早期的埃及文明，但是很有可能如历史学家格雷厄姆·克拉克所言：“苏美尔的种子滋育了”古埃及。克拉克：前引书，第107～109页。像美索不达米亚的早期城市一样，早期埃及城市地带的形成在经济上也是建基于农业剩余产品之上。粗略估计，普通埃及农民可以生产出相当于他们自身的生活所需三倍的产品。罗伯特·W 朱利（Robert W July）：《非洲人民史》（A History of the African People），纽约，斯克里布纳出版社，1970，第14页。

然而，在这两个早期的文明之间仍有很多差异。在埃及，法老掌握着绝对的控制权，并自称为神。同时，官吏们也以此为荣，加以效仿，而不去为神和王国的经济利益从事水利灌溉和剩余产品的管理工作。蔡尔德：前引书，第114～118页。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演变中的重要因素——公众地位和祭司之间的密切联系，在埃及几乎不存在。

由于上述原因（并不局限于此），早期埃及并不足以作为向我们清晰地展示城市化起源的范例。美索不达米亚社会总是围绕城市生活和一

套恒久的宗教体制运作，而埃及人的生活以王室为中心。A 伯纳德·纳普（A Bernard Knapp）：《古代西亚和埃及的历史与文化》（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Ancient Western Asia and Egypt），加利福尼亚贝尔蒙特，沃兹沃思出版社，1990，第109～110页。官吏、工匠、手工业者和奴隶不是把自己与城区联系起来，而是与法老的尊贵相联系，来认定自己的身份。如果王朝更替，祭司阶层和行政组织也随之变化。克拉克：前引书，第109～110页；莫里斯：前引书，第11～14页。

当然，埃及这样历史悠久而伟大的古老文明依然产生一些有影响的城市。例如，底比斯，在公元前15世纪的一个赞美诗中写道："她被称作城市；她笼罩了万物，万物经由她得到传扬。"哈蒙德：前引书，第73页。在巴比伦之类城市兴起之前的世界里，埃及城市的人口规模与同期的美索不达米亚城市比，有过之而无不及。钱德勒、福克斯：前引书，第300～301页。

尽管如此，甚至埃及底比斯或孟菲斯这样的大城市也没有像苏美尔各个中心城市那样，寻求成为独立的政治实体，寻求经济活力和宗教上的神圣地位。首先，埃及持久而井然有序的发展，与无法约束、支离破碎的美索不达米亚人的世界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埃及人的世界观并未促成自我封闭性城墙环绕的城市的发展。同时，竞争性贸易的缺乏也减缓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埃及是这样一种文明：她的伟大成就——金字塔——是为了死去的人建造的房子，而不是为活着的人提供的环境。城市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注意到，"在埃及，其他任何东西都能找到永恒的形式，除了城市之外"。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历史上的城市：起源、演变和前景》（The City in History:Its Origins,Its Transformations,and Its Prospects），纽约，哈考特布瑞斯出版社，1961，第80页。

印度和中国

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城市地区的共同特征是文明以宗教为中心。与美索不达米亚相似的是，约建于公元前2500年的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也是把标志性的宗教建筑安置在城市中心，这两个城市位于现在巴基斯坦的信德和旁遮普省境内。它们与其保持贸易联系的苏美尔相类似，蔡

尔德：前引书，第129页。神权统治在城市运作中扮演支配角色。主要的信仰似乎集中于“生育女神”，这是与中东的丰产崇拜相同的重要特征。克拉克：前引书，第182～185页。

同“新月沃地”联系很少或者没有直接联系的城市也具有这种宗教取向。在中国，约公元前1700年左右，商代的统治者将神庙置于城市空间的中心。祭司或者巫师不仅在宗教事务中，而且在行政管理方面也扮演关键角色。

也是从商代开始，我们看到了祖先崇拜模式的出现。祖先崇拜在中国连续而持久的城市文明模式的演进过程中莫里斯：前引书，第2页。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约瑟夫·利文森、弗朗兹·舒尔曼（Joseph Levenson and Franz Schurmann）：《中国：从起源到汉的衰落的历史阐释》（China:An Interpretive History,from the Beginnings to the Fall of Han），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69，第19～22页。虔诚的信仰和宗教习俗对于征召大量的农业劳力来建造城墙和城市基础设施至关重要。正如一首中国古诗所描述的：

其绳则直

缩版以载

作庙翼翼

保罗·惠特利（Paul Wheatley）：《四方之极：中国古代城市起源及特点初探》（The pivot of the Four Quarters:A Preliminary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and Character of the Ancient Chinese City），芝加哥，奥尔代恩出版社，1971，第71页。

在中国古代历史的主要发展过程中，大城市的规划要遵循“奉行天道”的原则。神庙、宗庙以及统治者的宫殿耸立在城市中心。统治者希望通过抚慰诸神来规范自然万物和众生。保罗·惠特利：前引书，第175、179页。

美洲

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在遥远美洲的最早期的城市中，宗教的优先地位更为显著——这一区域不可能同美索不达米亚或中国的城市中心有某种联系。像在美索不达米亚和中国的城市一样，墨西哥、秘鲁和美洲其他早期文明建成的第一批城市也是将宗教建筑置于大都市中心的心脏地带。G C 瓦里安特（G C Valliant）：《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人》（Aztecs of Mexico），纽约加登城，双日出版社，1944，第35、44～45页；杰里米·A 沙布洛夫（Jeremy A Sabloff）：《古代墨西哥的城市:重建一个失落的世界》（The Cities of Ancient Mexico:Reconstructing a Lost World），伦敦，泰晤士·哈德逊公司，1989，第28、41页；乔根·E 哈道伊（Jorge E Hardoy）：《拉丁美洲文明二千年》（Two Thousand Years of Latin American Civilization），选自乔根·E 哈道伊主编《拉丁美洲城市化道路与问题》（Urbanizaiton in Latin American Approaches and Issues），纽约加登城，安克出版社，1975，第4页；雷内·米隆（Rene Million）：《特奥蒂华坎主宰的最后岁月》（The Last Years of Teotihuacán Dominance），选自诺曼·约菲和乔治·L 考吉尔（Norman Yoffee and Ceorge L Cowgill）主编《古代国家与文明的崩溃》（The collapse of Ancient States and Civilizations），图森亚利桑那大学出版社，1991，第108～112页；克拉克：前引书，第225～230页；加尔西拉索·德·拉·威加（Garcilasco de la Vega）：《印加人》（The Incas），玛丽亚·姚拉译，纽约，奥赖恩出版社，1961，第57、119页。在特诺奇蒂特兰兴起前1000年左右，离现在墨西哥城不远的特奥蒂华坎的主要街道“死亡大街”两旁有百余座神庙。

南部地区也是如此，玛雅和秘鲁的早期城市以神庙、宗教仪式和习俗为中心。在秘鲁北部的高地，公元前一千纪的查文文化的建设者修建了规模宏大的宗教建筑群。这些建筑展现了查文文化的发达，也代表了南美洲西海岸城市文明未来的根基。J 奥尔登·梅森（J Alden Mason）：《秘鲁古代文明》（The Ancient Civilizations of Peru），伦敦，企鹅出版社，1957，第40～48页。约2000年之后，印加人也在他们城市的中心建造神庙。印加社会笃信他们的统治者是神，而他们的都城库斯科是“世界的肚脐”。沙布洛夫：前引书，第28页；米隆：前引书，第108～112页；克拉克：前引书，第225～230页；德·拉·威加：前引书，第57、119页。

一些历史学家和史学爱好者认为，文化可跨越遥远的距离进行传播（当然这种传播并不明显），他们试图以此来解释古代城市宗教起源的相似之处。或许也可以参考一个更有说服力的观点，如美国的历史学

第三章　最初的商业都市

从中国到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最终到美洲，早期帝国城市控制着广阔的疆域，其发展为贸易快速增长创造了条件。尽管如此，在城市社会，手工业者和商人的作用从整体上讲仍受到严格限制。

今天，商人阶层往往被视为生机勃勃的城市区域的主要塑造者（如果不是决定力量）。然而，在古代世界，甚至当商人和手工业者已经积累了可观的财富时，权力仍然集中在祭司、军队和官僚手中。商人往往只是简单地作为中间人，为国家或者祭司阶层的贸易牵线搭桥。一个历史学家记载，埃及法老是“唯一的批发商”。T　R　费尔巴克（T　R　Fehrenbach）：《火与血：墨西哥史》(接下页注)

中国的城市商人利用财富来攀越森严的等级限制，接第20页注①)（Fire and Blood:A History of Mexico），纽约，麦克米兰，1979，第42页；沙布洛夫：前引书，第41页；埃尔曼·R　塞维茨（Elman R　Service）：《国家与文明的起源：文化演变的过程》（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The Process of Cultural Evolution），纽约，W　W　诺顿出版社，1975，第221～231页；惠特利：前引书，第371页；朱利：前引书，第28～29页。为他们自己或者子女进入贵族或官宦阶层寻找途径。中国城市的布局也体现了这种社会特权：统治者的宫殿位于都市中央，市场被置于缺少便利的偏远之处。薛凤旋：《中国首都北京的自然与规划》（Victor F　S　Sit,Beijing:The Nature and Planning of a Chinese Capital City），纽约，约翰威利，1995，第6～28页；惠特利：前引书，第126～127、133、176、188～189页；利文森、舒尔曼：前引书，第99～100页。

(上腓尼基的兴起

如果想探寻商业城市的起源——这对于以后城市的发展意义重大——我们的视角反倒是应该从强大的城市帝国转移到地中海和海岸山脉之间的狭长地带。

这个后来被称作腓尼基的地区气候宜人。正如一个阿拉伯诗人所描绘的："冬天在它的头上，春天在它的肩上，夏天睡在它的脚间。"迈克尔·格兰特（Michael Grant）：《古代地中海》（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纽约，斯里克布纳出版社，1969，第62～63页。这里早期的港口城市，如叙利亚北部海岸的乌伽里特，早在公元前2千纪中期已发展成为赫梯帝国和埃及帝国的贸易中心。迈克尔·格兰特：前引书，第74～76页。

在几乎所有其他城市的居民对开阔的海洋深感恐惧的时代，腓尼基商人却在探寻广阔的已知世界。他们黑色的帆船探索了从遥远的非洲西海岸到塞浦路斯、西班牙甚至不列颠群岛的每一个地方。萨巴蒂诺·摩斯卡梯（Sabatino Moscati）：《腓尼基人的世界》（The World of the Phoenicians），阿拉斯泰尔·汉密尔顿译，纽约，普雷格出版社，1968，第99、101页。腓尼基的主要城市（如西顿或推罗）的人口从没有超过4万——仅仅是巴比伦人口数量的一小部分钱德勒、福克斯：前引书，第300页。——然而，他们所影响的范围可以无可辩驳地比此前任何一个文明都要广泛。

与强大的帝国有所不同，腓尼基人从没有向内陆地区深入扩展。与此相反，他们依托海岸，主要凭借向强大邻邦进行货物贸易（有时是服务业），来丰富他们的城市生活。蔡尔德：前引书，第140页。腓尼基人的天赋在于使他们自己不可或缺，与此同时获得丰厚利润。

"它的商人是王子"

到了公元前9至8世纪，腓尼基诸城市，像毕布勒斯（黎巴嫩雪松贸易的关键港口）、推罗和西顿，依靠自身实力富强起来。这里首次出现了一个有影响力的甚至起统治作用的商人阶层。《圣经·以赛亚书》中记述，推罗"无人能与之争锋，它的商人是王子，他的买卖人是世上的尊贵人"。哈蒙德：前引书，第89～91页。

腓尼基人的贡献远远超出了他们作为货商的角色。从某种角度而言，后来在诸如威尼斯、阿姆斯特丹、大阪等城市所见的腓尼基人，也具备工匠或者手工业者的技能。腓尼基人加工的玻璃、珠宝、服装和其

他装饰品远销至从西班牙旷野一直到苏美尔古城的广大地区。荷马在《伊利亚特》中提到，帕里斯给海伦穿上“由西顿妇女织的闪亮睡袍”。希罗多德：前引书，第126页。腓尼基人在他们的海滩上发现了一种海生蜗牛，并掌握从这种蜗牛的体腺中提取紫色颜料的复杂工艺，一项特别重要的手工业由此而生。这一地区的名称“phonikes”（希腊语“紫色”或“红色”）即来源于这一颜料。格布哈特·赫马（Gebhard Herm）：《腓尼基人：古代世界的紫色帝国》（The Phoenicians:The Purple Empire of the Ancient World），纽约，威廉莫罗出版社，1975，第79～81、88～89页。

腓尼基城市也输出他们的专门技术。腓尼基人是周围古代世界精美城市建筑、宫殿和神庙的设计者，其中包括耶路撒冷的所罗门圣殿。哈蒙特：前引书，第75～86页。

腓尼基人的最伟大的文化贡献——字母——也是商业需要的结果。腓尼基的商人和工匠从美索不达米亚人和埃及人那里学来了书写符号，并把它作为记账和立法的工具。从公元前1100年左右开始，这些务实的城市居民发明了一种比古代象形符号更加简单和易于掌握的书写系统。这一书写系统成为以后希腊和拉丁字母的基础。纳普：前引书，第190～191页；格兰特：前引书，第77～78页；克拉克：前引书，第161页；希罗多德：前引书，第299页。

作为当之无愧的天才商人，腓尼基人尊重自我价值。他们及时地提醒主顾，按他们的吩咐办事是为了利益，而不是出于被迫。法老派出特使来索要木材为阿蒙神制作圣器时，毕布勒斯王国严辞告诫埃及使者：“我不是派你来的那个人的奴仆。”摩斯卡梯：前引书，第10页。

腓尼基人衰落的根源

像承袭了他们商业帝国的希腊城邦，或者是2000年之后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诸城市一样，每一个腓尼基城市都渴望获得独立。城市的运作绝大部分控制商业行会手中，他们最为关心是的扩展贸易。

商人阶层狭隘的本土观念没能使腓尼基人成为帝国的缔造者。当其

商人远离本土建立永久基地时，他们也只是倾向于建设一个新的独立城市。

北非的迦太基是这些殖民地中最大的一个。一般认为，迦太基由推罗人在公元前814年建立。它被称作“新城”（Quat Hadasht），是腓尼基人向西地中海边缘地区扩展贸易的基地。这个新生贸易中心的影响渐渐渗透到西班牙向北通往康沃尔的大西洋沿岸，有些记录甚至显示到了几内亚沿岸。摩斯卡梯：前引书，第123～126页。

到了公元前5世纪，迦太基的人口规模超过了西顿和推罗的总和。它这时已跻身地中海地区强国之列，拥有庞大的舰队，并同包括意大利的伊达拉里亚在内的其他地区的势力建立了一系列联盟。西部地区的其他腓尼基殖民点都把迦太基视为领袖和保护人以对抗敌对城邦——这些城邦多数由希腊人所建。摩斯卡梯：前引书，第116～121页；赫马：前引书，第129页。

这些远离母邦的联盟的产生削弱了腓尼基自身的力量。没有其后裔的援助，老城邦无法摆脱亚述、巴比伦和波斯等帝国日益扩张带来的打击。结果，这些城市丧失了独立，也失去了古代地中海重要贸易枢纽的地位。腓尼基的“黄金时代”走到了尽头。赫马：前引书，第144～160页。

最终，迦太基也没能摆脱作为一个古代单纯商业城市所固有的局限。作为腓尼基文化和政治理想的承载者，迦太基人——其人口数量在顶峰时可达到15万到40万人赫马：前引书，第214页；钱德勒、福克斯：前引书，第302页。——以城邦体制来组织行政机构：选举产生执政官（suffetes）、元老院和民众大会。具体的组织形式通常由商业贵族所控制。奴隶和仆役从事卑贱的工作，士兵和水手战斗，祭司祷告，而由富人来统治。摩斯卡梯：前引书，第131～135页；格兰特：前引书，第125、129～130页。

像他们的腓尼基先祖一样，正是迦太基人固执的商人本性导致了其衰落。除了追逐利益外，他们缺乏扩张所需的更明确的使命感和原则性。甚至同其他殖民地结系在一起时，迦太基人也没有试图去建成一个

统一的帝国。维持一个由商业利润所驱动的国家是他们首要和优先的选择。摩斯卡梯：前引书，第135页。

在古代世界，为商业而设计的都市远远逊于为了征服而建造城市。建基于利润和狭隘自我利益基础上的意识形态远不能抵抗帝国的理念，而正是这种理念统治了近代来临之前的城市史。

第五章　罗马——第一个大都市

泰特斯·彼特罗努斯是尼禄皇帝的朝臣、一个罗马的富家子弟，他终日热衷于在城市的街头巷尾寻欢作乐，与妓女和放荡的贵妇厮混。他后来因涉嫌参与宫廷政变而被迫自杀。但彼特罗努斯却把他对这个城市以及这个城市所创建的帝国的深刻感悟和精彩描绘留给了后世。彼特罗努斯（Petronius）：《萨蒂里孔》（The Satyricon），J P 沙利文译，纽约，企鹅出版社，1986，第11～13页。在彼特罗努斯生活的时代，罗马已经发展到了直到现代社会才再次出现的规模——一个庞大、不断蔓延的都市：闹市、酒肆、神庙、拥挤的房屋以及贵族的府邸充斥其间。彼特罗努斯笔下的罗马让我们仿若穿越了时空隧道，接近了现在的纽约、东京、伦敦、洛杉矶、上海或是墨西哥城。罗马的人口超过了100万人，比早期像巴比伦这样的大城市人口多2到3倍。莫里斯：前引书，第37～38页；杰罗姆·卡哥皮诺（Jéròme Carcopino）：《古代罗马的日常生活》（Daily Life in Ancient Rome），E O 洛里默译，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40，第16～20页；霍尔：前引书，第621页；钱德勒、福克斯：前引书，第302～303页。路易斯·穆弗德提到，罗马的人口比例完全失衡，就像一个城市巨兽忍受着“大都市象皮病”的煎熬。芒福德：前引书，第237页。

然而，罗马人创建的法律、经济和工程方面的成就使这个庞然大物成为世界的神经中枢近500年之久，这是他们永远的荣耀。在其鼎盛时期，这个最伟大的城市帝国统治着从不列颠到美索不达米亚的广大地区，所包括的人口近5000万人。麦克尼尔：前引书，第104页。

“胜利的罗马人”

罗马人如何向城市的未来迈出了勇敢的一步？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是通过整合古代城市的两大构建模块——宗教信仰和有组织的军事力量——来实现的。罗马人坚信追求帝国是他们伟大和持久的责任。彼特罗努斯提到：

整个世界都在胜利的罗马人的手中。海陆日星都归他掌握。但是他

还不知足。卡哥皮诺：前引书，第174页。

罗马人的伟大力量并非来源于其地理或者自然环境的优越。贯穿整个城市的台伯河不能与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或者尼罗河等伟大河流相提并论。诚然，城市的中心受到了七个山丘的保护，而且它的内陆位置保护其免于来自海洋的入侵。但是，这些天然屏障对于雄心壮志的征服者而言并不重要。

当然罗马也具备一些基本的经济资源，然而并不比其他大多数城镇优越。温和的气候和适宜的土壤有利于农民和牧人的活动。城市的位置靠近最容易渡过台伯河的地点，这使得早期的罗马成为周边民族的天然商贸通道，特别是对当时拥有较发达文化的伊达拉里亚人而言。盐矿为罗马人提供了一个重要贸易项目。约翰·E　斯坦博（John E　Stambaugh）：《古代罗马城市》（The Ancient Romen City），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88，第7～8页。

罗马人力量的源泉在于他们特有的民族神话和神圣的使命感。传说罗马城由罗慕路斯和莱慕斯兄弟建于公元前753年，他们曾被丢弃于台伯河畔，由母狼哺育长大。他们从小就心性残忍，互相残杀。在粗犷的乡村居民中，战争和农业之神马尔斯很早就拥有忠实信仰者。约翰·E　斯坦博：前引书，第11～12页。

最初，罗马人只凭坚忍的品质还不足以对抗伊达拉里亚人。公元前7至6世纪，他们控制了罗马城的部分地区，并且在这里建立王权。然而，罗马人在很多方面受益于这次失败，这让他们受到了更成熟文化的熏染，并且同希腊和腓尼基世界联系到了一起。马西莫·帕罗蒂诺（Massimo Pallottino）：《伊特鲁里亚人》（The Etruscans），J　克莱莫纳译，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75，第95～97页。

一旦摆脱了外国势力的控制，罗马人很快地改革了他们的羽翼初丰的城邦，这个城邦在公元前5世纪有近4万居民。公元前450年，他们将政府的法规汇编成了12铜表法。这一法典涵盖了集市开放的日期、保护人和食客之间的关系、贵族的权利和平民的保护等方方面面的内容。

制定罗马法律的目的是规范公民行为（最好是自律方式），使之与根深蒂固的个人和公共道德准则相一致。历史学家F E 阿德科克认为，拉丁词“religio”本身就有“把公民义务转化为对家族、城邦和神的责任”的意思。F E 阿德科克（F E Adcock）：《罗马的政治理论与实践》（Roman Political Ideas and Practice），安娜堡，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64，第16页。

罗马人深深地依恋他们的土地，并表现出对过去的强烈传承感。家族事务是所有事情的中心；每一个家族都设有祭台供奉他们的祖先和神。努马-丹尼斯·甫斯特尔·德·库朗日（Numa Denis Fustel de Coulanges）：《古代城市：对于宗教，法律和希腊罗马体制的研究》（The Ancient City:A Study on the Religion,Laws,and Institutions of Greece and Rome），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80，第17～52页。李维评述说，“罗马历史的核心充满宗教信仰……神居住其中”。库朗日：前引书，第132～134页。

严格地同传统保持一致贯穿于罗马人漫长历史的大部分时间。法律可以修订，但是同过去的联系给予他们无法估量的确定性。在他们的眼中，伟大意味着古老。生活在彼特罗努斯之前一个世纪的罗马政治家西塞罗写到：库朗日：前引书，第182页。“这有我的宗教，这有我的家族，这有我祖先的遗迹。我简直无法表达我在这里感受到的魅力，它们渗透到了我的思想和意识中。”库朗日：前引书，第91页。

罗马人对他们的“共和”（或“共和体”）的献身精神在历经磨难之后仍然存在。罗马军队能够被击败——公元前390年，罗马城几乎被高卢的入侵者所占领——城市能够经历数不清的大火，但是罗马城却总会在原址重新建立起来。在希腊文化统治其他意大利城市的时代，这些情结帮助罗马人保持了自身的独立性。斯坦博：前引书，第12、18～19页；克拉克：前引书，第164～166页。

西塞罗在他的“思想”和“意识”中所感觉到的东西——罗马城环境和思想所独有的特性——也促使罗马城不懈地对外扩张。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罗马人不懈战斗并最终击败了伊达拉里亚人和希腊人。可以认为，罗马的关键性胜利发生在公元前146年，以迦太基的灭亡为

标志，它曾是地中海世界最有可能威胁罗马霸权的城邦。

帝国城市的形成

公元前2世纪，罗马已有城市帝国之相。与港口设施、引桥渠和不断延伸的市政广场共同兴建的还有很多新的拱门和神庙。宏伟的公共建筑周围布满了成千上万的拥挤住宅、集市和店铺，来满足的不断增长的人口的需要。斯坦博：前引书，第33～35页。

在随后的百年中，帝国的成就破坏了古代的共和体制。包括奴隶在内的新移民占总人口的1/3。富裕的贵族和窘困的平民之间长期存在的冲突日益激化。民众领袖提比略·格拉古指出，战争中得胜回到意大利的老兵发现他们失去了土地，被迫“与妻儿过着没有土地、没有房子的生活……没有家族的祭台或墓地，他们的战斗和死亡是为了别人享受财富和奢华”。基思·霍普金斯（Keith Hopkins）：《罗马贸易，工业和劳力》（Roman Trade,Industry and Labor），选自《古代地中海文明》，第774页；斯坦博：前引书，第36～37页；莫里斯：前引书，第44页。

一个多世纪的政局动荡和变乱（其中包括斯巴达克斯领导的著名的奴隶起义）为帝制做好了准备。公元前49年，裘利斯·恺撒被宣布为独裁者，他对桀骜不驯的共和体制施以强硬政策。恺撒也是一位城市革新者，他决心使罗马更适合作一个领土广袤的帝国的首都。他颁布法律对城中泛滥成灾的破旧房屋的高度进行限制，强迫使用瓦片以及拉开建筑物间的距离来防止火灾，并且开始市政广场的大型扩建。

公元前44年，恺撒遇刺，他所进行的宏大规划被中止，只好留给了他的后继者奥古斯都。莫里斯：前引书，第45页；斯坦博：前引书，第44～45页。在奥古斯都统治期间，罗马形成了一个拥有雄伟宫殿、神庙和其他公共建筑的城市。正如奥古斯都自己所说的那样：“我接手了一个泥砖建造的城市，却留下了大理石建造的城市。”斯坦博：前引书，第51页。

罗马：大城市的原型

公元前31年，奥古斯都在阿克兴海角击败了托勒密王朝的最后君主克娄巴特拉七世和她的盟友马克·安东尼，这标志着希腊化时代的终结。罗马人事实上已经征服了所有的希腊城邦、原塞琉古帝国的大部和其他更远的地区。在此后的4个世纪中，西方城市化的历史主要是由罗马人和他们的臣属书写的。

有些观点认为罗马人缺乏希腊人的创造才能，如哲学家、城市设计师或者建筑师。这是不公平的。罗马人确实了吸收他们在希腊世界发现的东西，并在此基础之上发扬光大。但是他们也改造或者重建城市，如迦太基；或帮助修复一些城市，如神圣的雅典。E J 欧文斯（E L Owens）：《希腊罗马世界中的城市》（The City in the Greek and Roman World），伦敦，鲁利格出版社，1991，第121～140、150～152、159页。

罗马把城市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首先是罗马城自身。罗马修建了前所未有的公共工程——道路、引水渠、排水系统——以使城市有能力承受不断增长的人口。一个罗马的作家发问，希腊人所能自诩的是其“无用”的艺术，埃及所谓的遗产是躺在“闲置的金字塔”里的，这些怎能与罗马的14条引水渠相媲美？赫伯特·穆勒（Herbert Muller）：《过去的价值：历代社会的侧影》（The Uses of the Past:Profiles of Former Societies），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2，第219～220页。

然而，在这些成就之下却隐藏着可悲的事实。精美的大理石材料覆盖了新奥古斯都广场上的宏伟建筑和马尔斯神庙，但是大多数的罗马人却生活在贫民窟一样的住宅中。罗马城内有26个住宅屋区（insulae）为个人提供住处（domus）。虽然恺撒已经立法，但是大多数住宅屋建筑还是破烂不堪，有时会倒塌，并且经常失火。卡哥皮诺：前引书，第20～27、65页。

日常生活经常混杂无序。弯弯曲曲的街道很少是笔直的，挤满了人和垃圾。在白天，到处是蜂拥的人群（裘利斯·恺撒的法令将车流限定在晚上）。夜幕来临，噪音和喧闹更严重。讽刺作家尤维那质问说：

在屋里怎能睡觉？马车穿行在狭窄而弯曲的街道，车夫停车咒骂，

这一切可能夺去了斑海豹的睡眠，甚至克劳狄乌斯皇帝他自己也可能无法入眠。卡哥皮诺：前引书，第45～51页。虽然有这些缺陷，罗马仍然在城市发展史中表现出许多创新。大城市居民吃、穿和用水的需要使经济活动的组织产生了很多创新之举。洞察世事的彼特罗努斯主张，帝国的任务是，无论以什么样的生命代价，都要保护财富的来源以供给数量不断增长的城市家庭。这位朝臣评述说："命运取决于战争和继续寻找财富。"彼特罗努斯：前引书，第129页。

吸纳这些物资的工作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有三个港口为这个城市运送供养人口的谷物、富人所需要的奢侈品和服务于富人的奴隶。这里有巨型货栈和高度专门化的市场用以流通从蔬菜、猪到酒、牛和鱼在内的各种各样的货物。罗马的商业如此富有活力，以至于任何有野心的自由人（如彼特罗努斯所著《登徒子》中的特利马奇奥）都能积累巨额财富，以取得更显赫的社会地位。

在这里，现代形态的城市零售业初露端倪。书籍、宝石、家具和服装经销商集中在特定的区域内。这里既有起到超级市场作用的大型集市，也有大量位于住宅屋底层的小店铺。罗马最高级的商铺是现代的商业中心的预演：莫卡特斯·特来尼拥有一个五层楼的商铺，里面出售各种各样的商品。莫里斯：前引书，第46～47页；斯坦博：前引书，第150～153页。

罗马的经济被广泛描述为一种被征服民族的财富所供养的寄生经济。西班牙的干鱼、波斯的胡桃木、高卢的酒，当然还包括来自于各个国家的奴隶涌入到这个城市中；而世界只得到了相当少的罗马商品。斯坦博：前引书，第144～145页。如果从商业的角度来看，罗马是在消耗整个世界；但是，它天才的行政管理能力将城市保障发展到了一个空前水平——在已拓殖的广阔地区激起了一个城市建设的新的黄金时代。

"一个由城市单元组成的联邦"

后来欧洲的主要城市，约克、伦敦、特里尔、巴黎、维也纳和布达佩斯等，都从诞生于台伯河畔的这座"天才城市"中获益匪浅。莫里斯：前引书，第39～44页。在某种意义上，罗马化成为城市化进程的同义

词。

空前的安全保障为城市发展创造了条件。爱德华·吉本说："罗马人保卫和平的方法就是不断地为战争做准备。"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第一卷，纽约，现代图书，1995，第8页。从荒凉的撒哈拉直到寒冷的苏格兰边境，布置在边界、城墙和道路附近的罗马军团保卫着各个城市。在这些偏远的地区，城墙和防御堡垒对于城市的生存至关重要。即使这样，像德国的特里尔和维鲁勒尔姆（圣奥尔本），也不仅仅是一个军事哨所。甚至到了公元一二世纪，一些不列颠城镇还因整齐的道路、复杂的排水系统、浴池和管道引水而自豪。

更重要的是，城市文明的繁荣不单单是帝国法令的结果，基层力量同样也在发挥作用。各种各样城市之间充满活力的竞争刺激了新的建筑项目、剧院和露天剧场的发展。罗马允许独立城市实行相当程度的自治，正如历史学家罗伯特·洛佩兹所言，帝国本身发挥"城市单元的联邦"的作用。罗伯特·洛佩兹（Robert Lopez）：《欧洲的诞生》（The Birth of Europe），纽约，M 埃文森公司，1967，第15页。

19世纪之前，欧洲没有再度出现过如此安定繁荣、人口众多的城市。人口、物产和思想观念沿着从耶路撒冷到布伦之间的安全的航海线和5 1万英里长的平坦路道，在广阔的"城市单元"群岛之间快速流动。查尔斯·路德维格（Charles Ludwig）：《新约时代的城市》（Cities in New Testament Times），丹佛，埃森特图书公司，1976，第12页。富裕并喜爱游历的罗马青年可以随意到海外，如雅典、亚历山大里亚、马赛利亚（马赛）或罗得斯等城市去接受教育。J P V D 鲍尔斯顿（J P V D Balsdon）：《古代罗马的生活与休闲》（Life and Leisure in Ancient Rome），纽约，麦格劳-希尔出版社，1969，第224～225页。

商业和技术也传播到边境地区。来自于地中海的工匠带来了玻璃和陶器的生产技术以及农业器具。到了公元3世纪，莱茵地区第一次以主要的工业区的面貌出现。通过陆路和海路，贸易范围扩展到了以前没有开发的印度和中国市场。柴尔德：《欧洲文明的衰落》，第267～273

页；格兰特：《古代地中海》，第293页；柯廷：前引书，第99～100页。

在其全盛时期，罗马把早期居鲁士和亚历山大构思的世界性帝国的理想转变为活生生的现实。塔西佗记载道，皇帝克劳狄乌斯自己觉察到，公民身份的逐渐推广是罗马超越狭隘的雅典城邦最有利的条件之一。吉本评述说，曾经同恺撒作战的“高卢人的子孙”现在“统率兵团，执掌行省，还被允许进入元老院”。吉本：前引书，第33页。公元3世纪，罗马公民权对已知世界的所有自由民开放；来自意大利的元老已经不足半数。G W 鲍尔索克（G W Bowerstock）：《罗马帝国的瓦解》（The Dissolution of the Roman Empire），选自《古代国家与文明的衰落》，第169页；格兰特：《古代地中海》，第297～299页；理查德·P 萨勒（Richard P Saller）：《罗马阶级结构与联系》（Roman Class Structures and Relations），选自《古代地中海文明》，第569页。

公元98年，从西班牙人图拉真开始，外省人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以后的世纪中，国家的首脑都是来自于高卢、叙利亚、北非和色雷斯等各地。所有这些各种各样的人在罗马——所有其他城市的神圣首府——居住并进行统治。公元2世纪的希腊作家阿里斯泰德宣称：“罗马已经成为将世上所有民族都视为其村民的城堡。”马勒：前引书，第218页。

把这个世界主义的理念最好地表达出来的大概是罗马皇帝兼哲学家马可·奥里略，他在公元161年安东尼·比约死后继任元首。同古典的罗马人一样，奥里略认为他的“城市和祖国”就是罗马。但作为一个皇帝，他从更宽广的视野看到了罗马的使命，去完成整个已知世界的“人类使命”。迈克尔·格兰特（Michael Grant）：《安敦：转变中的罗马帝国》（The Antonines:The Roman Empire in Transition），伦敦，鲁利格出版社，1994，第55～56页；马勒：前引书，第221页。

第七章　伊斯兰群岛

公元1325年，阿布·阿卜杜拉·穆罕默德·伊本·白图泰离开了他的故乡丹吉尔市，向东开始他的神圣的麦加朝圣。后来，为了履行在阿拉伯的宗教义务，他在以后的几乎1/4个世纪里到处旅行：在沿着东非海岸的贸易点逗留，穿越中亚大草原上商队驻留的城镇，到达印度和丝绸之路上那些流光溢彩的城市。

即使跨越了数千英里地域和色彩纷呈的文化区，在绝大部分的旅程中，伊本·白图泰几乎在每一个地方都有回家的感觉。他遇到了许多不同的种族、语言和文化，但是多数城市都处于他所熟悉的伊斯兰世界的范围之内，这是信奉一个神和一个人——先知穆罕默德——的启示的世界。

此时距离罗马及其城市网络垂暮之年的最终痛苦挣扎阶段已过千年之久。君士坦丁堡这个永恒之城的继承者仍旧在它的城墙后面存活着，但是已经积重难返并被敌人所围困。它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20座城市中仅有的欧洲城市；而几乎所有其余的城市都属于东方世界，它们或者在中国或者在伊斯兰世界。钱德勒、福克斯：前引书，第270页。

穆斯林世界盛极一时，极大地削弱了欧洲城市文明。穆斯林控制了地中海和通往东方的商路，切断了欧洲商业与其财富和知识重要来源的联系。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欧洲的严酷考验：九、十世纪的欧洲历史》（The Crucible of Europe:The Ninth and Tenth Centuries in European History），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6，第61页。阿拉伯的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评述说："基督徒在海上都漂不起一个木板了。"亨利·皮朗（Henri Pirenne）：《穆罕默德和查理曼大帝》（Mobammed and Charlemagne），伯纳德·迈阿尔译，克利夫兰，默里迪恩出版社，1957，第166页。纸草等产品已经从欧洲的修道院中消失；从地中海长途贩运的酒现在不得不在本地生产。只有通常由叙利亚和犹太商人贩卖的少量奢侈品能够在欧洲的市场和贵族的宫廷中看到。理查德·霍奇斯（Richard Hodges）：《黑暗时代的经济：城镇与贸易的起源》（Dark Age Economics:The Origins of Towns and

Trade），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82，第31、181页；戴维·C 道格拉斯（David C Douglas）：《诺曼底人的成就，1050至1100年》（The Norman Achievement,1050-1100），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69，第189页。

与此相反，诸如此类的商品充斥着穆斯林城市的集市，令人眼花缭乱，从西班牙的托莱多、科尔多瓦到遥远印度的德里，均如此。穆斯林的商人和使团现在把他们的影响扩展到了东南亚的海岛，并在富饶的中国沿海城市殖民。

穆罕默德的城市视野

伊斯兰文明依存于对人类生存目的的深刻洞察上。与它所取代的古典文明一样，其核心在于对城市的虔诚信仰。必须把信徒群体聚集在一起是伊斯兰信仰的关键一环。穆罕默德不希望他的人民重新返回沙漠和宥于部落的价值体系；伊斯兰教实际上需要城市作为“人们在一起祈祷的地方”。保罗·惠特利（Paul Wheatley）：《人们一起祈祷的地方：七到十世纪伊斯兰土地上的城市》（The Places Where Men Pray Together:Cities in Islamic Lands,Seventh Through the Tenth Centuries），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1，第41页。

早期伊斯兰教的历史就是一部城市居民的历史。穆罕默德是一个成功的麦加商人。麦加是在荒凉的阿拉伯半岛上建立起来的古老的商业和宗教中心。长久以来，这个城市先后受到了希腊文化和罗马统治的影响；它的居民成分混杂，包括异教徒、犹太人以及公元2世纪之后的基督徒。菲利普·K 希提（Philip K Hitti）：《阿拉伯伊斯兰的都城》（Capital Ci ties of Arab Islam），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73，第4～8页。

和大多数早期城市一样，麦加和在半岛的西北角汉志地区的其他商业城市缺乏深厚的农业基础。这里干旱、严酷的气候条件——一个公元10世纪的阿拉伯地志学专家把这个城市描绘为“被令人窒息的高温、讨厌的风和成群的苍蝇折磨着”惠特利：《人们一起祈祷的地方》，第12、18页。——只能把商业作为其经济发展的基础。

大多数麦加人是贝都因人的后裔，他们在广阔的汉志地区游牧，为牧群寻找草场和水源。贝都因人以氏族为组织，通过保护或者袭击商队来补充他们贫乏的收入。他们只崇尚对本氏族的效忠，而氏族之间则纷争不断。伊本·赫勒敦认为贝都因人之间的牢固的依存关系是艰苦生活环境的自然产物。他评述说，“只有靠群体感情维系的氏族才能在沙漠中生存”。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普世历史：历史简介》（The Muqaddimah: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y），弗朗兹·罗森塔尔译，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9，第97页。

在新纪元初期的数十年间，一部分氏族居住在像麦加这样的城市中，开始拥有他们自己的商队，并在也门和累范特之间的贸易增长中获利。麦加逐渐发展成为有5000人口的居住地。

沙漠文化中古老的氏族效忠观念对新生的城市社区造成了明显的威胁。麦加缺乏维系和规范不相关联人群的通用社会准则或者法律制度，自从美索不达米亚时代以来，这是维系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

穆罕默德是麦加城中颇有势力的古莱西氏族的成员之一。他体会到了建立秩序的必要性，这个更高的目标将取代旧的氏族社会所固有的血亲复仇的混乱状态。他的信仰体系——伊斯兰教——既是宗教活动又是对社会正义和秩序的呼唤。

穆罕默德关心传统的社会弱势群体的思想在《古兰经》中反映出来。他要求保护长期受到各种不公正待遇的妇女，使其免受虐待。男子最多拥有4个妻子，并要求对她们同等尊敬。而在过去，财产的多寡是唯一的限制。

穷人也受到保护。施舍成为信仰表达的必要方式。《古兰经》的教义规定，富人应意识到“乞丐和贫民应有的权利”。 希提：前引书，第14页；艾伯特·豪瑞理（Albert Hourani）：《阿拉伯人民史》（A History of the Arab Peoples），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2002，第120页。

由单一的信仰统一起来的大公社（ummah）或者团体的观念或许是穆罕默德思想最深刻之点。这种观念倾覆了传统的异教信仰和古代的氏

族关系的首要地位。传统的氏族首领似乎理解到了这一点。公元622年，他们迫使先知和他的一部分追随者逃亡（hijira）到了麦加以北200英里的敌对城市麦地那。这个城市有很多的犹太移民，更能接受先知的一神观念。希提：前引书，第18～19页。

新皈依者壮大了穆罕默德的力量，他的军队在公元630年占领了麦加。伊斯兰公社迅速扩张到整个阿拉伯。曾经是一群纷争的氏族的阿拉伯人，现在成为一个目标一致的单一民族。《古兰经》中说："将世界上所有的财富都分给他们，你也不能把他们联合到一起。但是真主却能联合他们。"伊本·赫勒敦：前引书，第74页。

伊斯兰城市的本质

穆罕默德于公元632年去世后，他的继任者哈里发决心去实现先知的遗愿。穆斯林的新纪元代表了城市史的一个新开端。在公元7到9世纪之间，伊斯兰文明以惊人的活力从近东和北非扩展到了西班牙，戏剧性地结束了古典城市文明的古老传统——正如苏格拉底的理解，这种传统认为"城市中的居民"是知识的主要源泉。格兰特：《古代地中海》，第192页。伊斯兰文明培育了更加成熟的城市文化，但并不因为城市自身的原因而崇拜城市；宗教关怀——人们的日常生活同万能真主之间的合一——使得对城市事务的关注相形见绌。

信仰的首要地位明显地表现在伊斯兰城市的布局中。清真寺现在成为城市生活的中心，取代了古典城市所重视的公共建筑和公共空间。斯蒂法诺·比安卡（Stefano Bianca）：《阿拉伯世界的城市结构：过去与现在》（Urban Form in the Arab World:Past and Present），纽约，泰晤士·哈德逊公司，2000，第25～36页。

宗教导向和与之相伴而约束人们日常生活的律法，使得伊斯兰征服了其他游牧民族的入侵，这些入侵者也在掠夺衰败的古典文明。当日耳曼人、匈奴人和其他民族攻占罗马、波斯和拜占庭大城市时，他们只留下了灰烬和废墟。与其相反，穆斯林设法把新获取的城市——大马士革、耶路撒冷和迦太基——融入到他们认为在精神上超人一等的城市文明中。

大马士革：人间天堂

公元661年，哈里发放弃了麦地那作为行政首都，迁移到了大马士革，这个城市更适合扩张中帝国的行政、交通和商业的需要。与麦加或者麦地那相反，大马士革位于富饶地区，从黎巴嫩山发源的巴拉达河滋育着这片土地。正如阿拉伯诗人伊本·朱拜尔写道：

如果天堂在人间，大马士革一定就是它；如果在天上，大马士革可以与之匹敌。希提：前引书，第61页。

大马士革将阿拉伯人的影响拓展到了其他文化中。大马士革是一个世界性的大都市，各种基督教团体和犹太人居于其中。在伊斯兰教的统治下，这些“在册民族”都可以保留自己的信仰，经常比在以前拜占庭的统治下更自由。《古兰经》规定“受保护者”（dhimmis）要向新政权交纳“贡赋”，因而“地位卑微”。然而，在其他方面他们的权利得到保证。这种相对的宽容受到了犹太人和基督教徒的欢迎，甚至在穆斯林攻取他们城市的时候还得到了他们的帮助。皮朗：《穆罕默德和查理曼大帝》，第154～155页；曼戈：前引书，第91～97页。

伊斯兰城市生活国际化的特征也促进了贸易以及艺术和科学的发展。惠特利：《人们一起祈祷的地方》，第35～38页。在新征服的城市中，希腊罗马的广场被改建为阿拉伯人的露天剧场。统治者建设了精心规划的商业区，其中有遮挡沙漠中烈日的大型建筑，供商旅使用的客店和货栈。新的统治者以罗马时代以来就未曾见过的速度建起了大型的图书馆、大学和医院。豪瑞理：前引书，第124～125页。

新的城市精神越过大马士革的城墙向外传播。伊拉克的巴士拉、北非的非斯和马拉喀什、伊朗的设拉子和西班牙的科尔多瓦都证明了新秩序下城市的创造力。惠特利：《人们一起祈祷的地方》，第39页。一个德国的修女写到，科尔多瓦是“珠宝的世界，高雅而年青，对自身的实力感到自豪”。一个公元9世纪的基督教学者抱怨说，文化的推动力是如此的巨大，以至于在科尔多瓦，很少有教友能够完全写拉丁文；而多数人却能够用阿拉伯语优雅地表达自己，并且用这种语言写出的诗篇比阿拉伯人自己写的还好。希提：前引书，第154～155页；玛丽亚·罗斯·麦

奴卡（Maria Rose Menocal）：《世界的装饰：中世纪西班牙穆斯林、犹太人和基督徒如何建立宽容文化》（The Ornament of the World:How Muslims,Jews and Christians Created a Culture of Tolerance in Medieval Spain），波士顿，小布朗出版社，2002，第66页。

巴格达："世界的十字路口"

阿拔斯·哈里发在公元8世纪后期建立的新都巴格达，是早期穆斯林城市中最大一个。它位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临近古代巴比伦和泰西封遗址（萨珊波斯帝国的前首都）。当时的一个名为阿布·犹舒夫·亚库伯·伊本·伊沙克的观察家，把这个城市誉为"世界的十字路口"。

巴格达被计划建造成一个伟大的首都，城市是以环形来规划的：城墙、护城河和内城围绕着宫殿。惠特利：《人们一起祈祷的地方》，第54～57页。城市的人口至少25万人，使威尼斯、巴黎和米兰等当时的欧洲主要城市都相形见绌，可以同希腊—罗马文明最后的庞大堡垒君士坦丁堡相匹敌。在公元900年，它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豪瑞理：前引书，第110～111页；钱德勒、福克斯：前引书，第270页。

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哈里发垮台，巴格达失去了对政治权力的绝对控制。但是这个城市仍旧保持着引人注目的文化生产力。纸张的传入和书籍的流通（包括西方和波斯古典著作的翻译）促进了图书馆和大学的繁荣。后来，阿拉伯的学者发明了一种薄纸，这种纸制作的书更易于携带和书写。豪瑞理：前引书，第49～50页。

开罗的黄金时代

多个伊斯兰都城的建立有助于西班牙、波斯，特别是埃及新的中心的诞生。开罗建于公元10世纪，在以后的3个世纪中，从一个哈里发的宫廷式行政中心发展成为羽翼丰满的国际性都市。历史学家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记述道，它成为"统治者和民众一同居住的大都市"。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Janet Abu Lughod）：《开罗：城市胜利1001年》（Cairo:1001 Years of the City Victorious），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

版社，1971，第6～21页。

在伊本·白图泰到来的时候，这个城市已经在马穆路克的统治之下，他们是在1个世纪前控制了政权的突厥奴隶兵。这时的开罗比最初城墙环绕的地区几乎扩大了5倍，成为了卓越的文化中心。这里有大学、中心医院和藏书量超过160万卷的图书馆。它的著名的撒拉丁城堡高耸于向外蔓延的巨大城市之上。阿布-卢格霍德：前引书，第41页；马尔罗·阿隆（André Raymond）：《开罗》（Cairo），威拉德·伍德译，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2000，第36、47页；罗斯·E 邓恩（Ross E Dunn）：《伊本·白图泰的冒险：14世纪的穆斯林旅行者》（The Adventures of Ibn Battuta:A Muslim Traveler of the 14th Century），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6，第41页。

开罗控制着洲际市场，自罗马时代以来就没有城市能发挥如此作用。伊本·白图泰写到，埃及的大城市是：

广阔行省和富饶土地的女主人，她的民众无法计数，她的美丽和辉煌无与伦比；她是旅行者汇聚的中心，疲乏者和健壮者的歇息处。阿隆：前引书，第120页。

嘎萨巴是开罗最大的一个街市，常住人口约为4000人。它有数百家店铺，其中高级商铺总共拥有约360个房间。当时的一个埃及作家写到，其“货物丰富”令人吃惊，“脚夫忙于往驳船搬运货物，喊叫声”震耳欲聋。阿隆：前引书，第123页。

嘎萨巴是阿拉伯商人的一个重要终点站，他们以此控制了连接非洲、中国和印度与地中海世界的主要贸易路线。瓷器、丝绸、香料和奴隶涌入亚历山大里亚等港口，再南下至开罗。意大利和其他欧洲人所垂涎的奢侈品多数经过在尼罗河上的城市从事经营活动的穆斯林、犹太或是基督教的商人之手。

从某种意义上说，商业的生命力有赖于安全和强大的政权，我们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萨尔贡时代和后来的罗马时代，对此已有所见。在同一个时代里，当在欧洲旅行艰险重重的时候，像伊本·白图泰这样的

游客去埃及，却可以在连成一片的高度城市化的世界中畅行无阻：

尼罗河上的旅行者不必携带任何必需品，因为无论何时，他们想要上岸就可以上岸来洗礼、祈祷、购买食物或者干其他任何事情。从亚历山大里亚到开罗有一连串的集市……邓恩：前引书，第45页。

从北非到中国边界

伊斯兰的兴起也为拓宽由穆斯林商人控制的主要贸易中心构成的群岛创造了条件。惠特利：《人们一起祈祷的地方》，第337页。以前从来没有一种信仰，或者城市体制，能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力。伊斯兰公社为各种各样的城市提供了统治秩序、行为准则和文化规范。例如，伊斯兰政权设立了专门的机构（wakil al tujjar）来提供司法代理和安置外国商人。柯廷：前引书，第114～116页。

这些机构超出伊斯兰教传统的核心地区向外扩散。到公元13世纪，包括蒙巴萨和摩加迪沙在内，有30多个独立的伊斯兰商贸国家在非洲东海岸兴起。伊斯兰教也在卡诺、廷巴克图等西非一些商业中心繁荣起来，这里的黄金和奴隶吸引了来自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商人。廷巴克图通过南部的商路与开罗相连接，公元14世纪时这里发展成为5万人口的城市。朱利：前引书，第58～59页；邓恩：前引书，第122～128页；柯廷：前引书，第121～122页。

波斯人控制了到达印度和中国的利润更丰厚的商路。吉尔斯芒：前引书，第336～341页。在伊斯法罕、大不里士和设拉子等城市中，在萌芽中的洲际贸易和地方产业的共同作用下，出现了一些零散分布的集市。这些集市和清真寺共同构成了伊朗城市复兴的中心点。马苏德·凯拉拜迪（Masoud Kheirabadi）：《伊朗城市：形成与发展》（Iranian Citie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奥斯汀，得克萨斯大学出版社，1991，第45～65页。

到了公元14世纪，伊朗和伊斯兰文化开始对突厥人和蒙古人等游牧群落产生影响，这些游牧群落的征服使他们控制了印度和中亚的城市。这些文明中心在伊斯兰征服之前就已经形成，然而，新的城市宗教使城

市生活变得多姿多彩。

印度：伊斯兰的再生

印度是一个主要相关的案例。在公元前4至公元前2世纪的孔雀帝国时期，撒帕尔：前引书，第52页；钱德勒、福克斯：前引书，第301页。印度是城市文明的一个主要中心，可是最终衰落了。城市中心大规模衰退，战乱频繁，敌对城市之间相互残杀，远程贸易因而受到破坏。斯蒂芬·P 布莱克（Stephen P Blake）：《沙贾汉纳巴德：1639～1739年莫卧儿时期的独立城市》（Shahjahanabad:The Sovereign City in Mughal India,1639-1739），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1，第1～5页。

同样严重的是，印度教的种姓制度排斥贸易，压制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心，从而减缓了印度城市的发展。公元11世纪的阿拉伯历史学家阿勒白儒尼评述说：

印度人相信，除了他们自己的国家以外没有其他国家、其他民族像他们一样，没有国王像他们一样，没有宗教像他们一样……他们在交流他们所知道的东西方面天生小气，并且尽最大的可能来保守它，不让别的种姓的人知道，不让他们自己的人知道，当然更不能让任何外国人知道。撒帕尔：前引书，第239页。像他们在近东和北非的阿拉伯前辈一样，获胜的穆斯林苏丹迅速地复兴了印度的城市。他们使行政管理专业化，修缮道路，为旅行者建造馆舍，并鼓励同外部世界的贸易联系。这不仅推动了贸易城市的繁荣，如古吉拉特邦的坎贝；而且也造就了德里（公元12世纪末期被征服的城市）这样的行政中心。

当伊本·白图泰在穆斯林图格鲁克王朝统治期间访问德里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巨大而宏伟的城市……不仅是印度最大的城市，而且是东方所有伊斯兰城市中最大的城市”。德里兴建了大型市场而且吸引了来自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学者、科学家、艺术家和诗人。邓恩：前引书，第136页；塔班·雷坎德胡利、伊凡·哈比卜（Tapan Raychaudhuri and Irfan Habib）：《剑桥印度经济史：第一卷，1200至1750年》（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India,vol 1,1200-1750），德尔亥，东方

朗曼出版社，1982，第82～83页。

虽然全国绝大部分印度人信仰印度教，但是穆斯林控制了整个次大陆的城市中心。穆斯林的商人连同部分印度教的商人，经营着利润丰厚的东南亚和波斯湾之间的海岸贸易路线。雷坎德胡利、哈比卜：前引书，第37～42页；柯廷：前引书，第123～125页。

印度大量的药品、香料、奢侈品和奴隶在中国的沿海城市找到了销路，穆斯林的商人和传教士已经出现在这一地区。但是，中国不可能成为穆斯林世界的一部分，它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城市文明中心的代表——其宏伟和实力可以同伊斯兰世界相媲美。

第九章　机会的丧失

在马可·波罗和以后的伊本·白图泰时代预言东方代表着城市和文明的未来是合乎情理的。然而到了1600年，从漳州的码头和货栈到开罗的嘎萨巴可以明显地看出，中国和伊斯兰世界城市的活力开始消散。

繁荣的弊端

为什么中国和伊斯兰世界的城市与这个机会失之交臂？部分的原因就在于给那些到东方的欧洲旅行者留下深刻印象的高度繁荣。在16世纪北京、德里、伊斯坦布尔和开罗的统治者看来，欧洲城市看上去渺小而落后。中国和穆斯林多数的技术、药品和各种各样的工具远比欧洲更加先进。在东方，特别是中国，灌溉和河渠系统高度发达，农业生产远远超过了西方。

中国和伊斯兰世界的主要城市在人口和建筑的华丽程度上看上去超过了欧洲同等的城市。1526年，蒙古人的后裔莫卧儿人夺取了印度的控制权，定都德里进行统治，伊斯兰的历史学家把这里描绘成“有人居住的伊甸园”。伊斯坦布尔这个在被征服的君士坦丁堡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伊斯兰城市，比当时欧洲任何城市都拥有更多的财富和更多的人口。马润潮：前引书，第11～13页；珀西瓦尔·斯皮尔（Percival　Spear）：《印度现代史》（India:A Modern History），安娜堡，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61，第153页；雷坎德胡利、哈比卜：前引书，第141、170～171页；布莱克：前引书，第30页；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The　Perspective of the World: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15th～18th Century,vol　3），思安·雷诺兹译，纽约，哈珀与罗出版公司，1984，第534页；豪瑞理：前引书，第232页。注：并不只因为这些城市规模巨大，还因为其经济绝大部分比欧洲更为富足。事实上，最迟到1700年，中国和印度的人均收入相当于或者超过英国或法国，这里并不包括欧洲的穷国。即使有更多的人口，亚洲的总体经济将占世界经济的更大份额。

东方都城的辉煌进一步加深了长期存在的自傲感。尤其是中国宫廷

的态度：他们认为，按距离都城的远近依次为皇室到王公的领地，此后是“被安抚的地区”，然后是“半文明的野蛮人地区”，最后是“没有开化的野蛮人的地区”；在边缘地带末端的欧洲几乎没有什么考虑的价值。欣兹：前引书，第1～2页。

伊斯兰世界上层人物的观点不时表现出同样的对外国人的轻蔑态度，特别是对欧洲人。公元9世纪巴格达的一份贸易调查报告认为，拜占庭、中亚、印度和中国可以提供有价值的物品；而北欧和西欧的城市的价值仅仅是奴隶和稀有矿产的来源地。更值得注意的是，直到18世纪这样的态度也没有太大的变化，而这时欧洲的军事和科技已经显现出明显的优势。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欧洲穆斯林发现》（The Muslim Discovery of Europe），纽约，W W 诺顿出版社，1982，第60～68、185～187页。

专制的局限

*专制集权的强大进一步减缓了亚洲和伊斯兰城市的发展进程。甚至像西班牙的科尔多瓦和中国长安这样宏伟的城市，也随着统治王朝的倾覆而衰落。布莱克：前引书，第183、192～194页。专制体制也特别使得东方城市容易受到伊本·赫勒敦伊本·赫勒敦（1332～1406），阿拉伯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译者注。所描绘的政体的自然“生命周期”的破坏。他认为大多数穆斯林世界的统治机构都是由攻占城市掠夺财富的强悍的游牧民族建立的。第一代游牧民族——早期阿拉伯人、马格里布部落和突厥人——经常表现出建设伟大帝国和城市所需要的超凡精力和想像力。

阿拉伯学者注意到，在稳固的地点享受奢侈生活越久，统治者必然越快地失去尚武的精神和顽强的品质。由于纵容他们的后代放弃了马背上的生活，所以就不能指望他们的后代保持着其祖先的豪放品格。

当新的游牧入侵者出现的时候，对于大多数已经繁荣起来的城市来说，结果是灾难性的。当公元1258年蒙古入侵者击败衰弱的阿拔斯哈里发的军队的时候，巴格达就是这样的命运。蒙古人不仅杀掉了最后的哈里发及其大部分家属，而且屠戮了城内的多数居民。大部分的城市被夷

为平地。巴格达再也没有成为“世界的十字路口”。赛格斯：前引书，第49页；伊本·赫勒敦：前引书，第135～137、247页；格鲁塞：前引书，第323～325页。

虽然伊本·赫勒敦的观点多来自穆斯林世界的事例，但是同样也适用于中国的王朝。在发展初期，宋、元、明、清每一个朝代都表现出相当的尚武精神和强有力的统治能力。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政权日益软弱和腐败。特权贵族、官僚和退伍士兵组成的“军团”吞噬着帝国的财富。这就不可避免地把王朝脆弱的首都留给了新的游牧入侵者。马润潮：前引书，第122页。

企业家受到压制

这种持续衰颓的过程并非亚洲或者伊斯兰社会所独有。欧洲的贵族阶层在经历了几代强盛之后也衰落下来。然而，与东方不同的是，欧洲兴起的商人和手工业者阶层为城市经济带来了生机，而且他们有能力实现政权的更迭。

在日本、朝鲜、中国、印度或者埃及，中产阶级力量的蓬勃兴起却不曾发生。斯皮尔：前引书，第156～157页。专制政权到处任意征税、没收财产，以宫廷喜好行事，破坏了对企业家的激励机制。马润潮：前引书，第43、134～137、162页；艾拉·马文·拉皮德斯（Ira Marvin Lapidus）：《中世纪后期的穆斯林城市》（Muslim Cities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7，第96、101页；雷坎德胡利、哈比卜：前引书，第185～187、277～278页。伊本·赫勒敦这样评述：“对民众的财产的侵犯封杀了获取财富的动机。”伊本·赫勒敦：前引书，第238页。

无论从商业还是从政治的角度看，这些重要城市越来越背离了世界的发展潮流。在新儒家学者的影响下，中国限制勇敢的探险活动，使沿海的城市遭受损失。柯廷：前引书，第127页；拉图雷特：前引书，第234页。这样的决定最终将海洋贸易拱手让给数千英里外欧洲城市里的商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现代世界体系：16世纪的资本主义农业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起源》（The Modern

World System: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 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纽约，学术出版社，1974，第55～56页。

欧洲的再度兴起

正当东方衰弱的趋势不断显现时，在欧洲的城市中，先是在意大利，后来在大不列颠和荷兰，新的资本主义精神正在兴起。拉皮德斯：前引书，第50～65、78～80、185～191页。16世纪晚期，这里有些城市已经和东方一样富有，并且后劲不减。

中国、印度和穆斯林的政权不了解、也没有兴趣了解这些发展。有权有势的人——在自己的体系中安然度日——统治着北非、近东、印度和中国的大城市，当来自于西方的探险者出现在他们的海滨城镇时，他们一般没有感觉到威胁。毕竟，这些人只是来自世界相当落后地区的商人，他们的产品对于宫廷和集市来说都没有什么价值。

甚至欧洲人的高桅小船似乎也不会给人什么印象。不久，这些小船出现的频率越来越令人警惕，速度也越来越快，而且具备了更长距离航行的能力。17世纪末期，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商人逐渐控制了东南亚香料产地的贸易，同时也控制了利润丰厚的非洲奴隶、象牙和黄金贸易。

贸易中心不再重要，像开罗、伊斯坦布尔这样的城市开始在商业上衰落下来。阿布-卢格霍德：前引书，第48～51页；刘易斯：《问题何在？》，第13页。甚至最初由近东出口到西方的咖啡，也是在荷兰的殖民地爪哇生产，再由荷兰的船只贩运咖啡豆到奥斯曼的市场上出售。刘易斯：《穆斯林发现》，第195页。

西方人开始以强有力的姿态出现在东方。中国、印度和非洲边缘地带的小商业居住点开始缓慢地发展成为巨大的、充满商业活力的城市。表面上依旧宏伟的伊斯兰世界和中国内陆的大都市，开始逐渐失去对本国国内贸易的控制。最后，政治控制力和文化影响力也很快消失了。城市文明的一个时代画上了句号，一个由欧洲人和他们的后裔所掌控的新

时代即将开始。

第十一章　财富之城

尽管巴黎以及欧洲崛起的其他首都城市创造过辉煌，但城市未来的关键并不在此。虽然占据神圣之地和拥有政治权力对于城市的发展至关重要，然而属于这些伟大城市的最美好的未来并不取决于上帝或国家的权力，而取决于对财富孜孜不倦的成功追求。

扩展中的欧洲城市秩序

到亚洲和美洲的新航线仅仅是这些城市努力开拓其经济领域的一部分。新的欧洲市场甚至出现在过去罗马时代最偏远的内陆地区。在这个千年里，欧洲大陆第一次被打上了城市烙印。村庄正在变成城镇，一些城镇则转变为城市，拥有自己的大教堂和中心市场。城市中心从莱茵河上游开始兴起，经过里加、格但斯克，一直延伸到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大草原。尼古拉斯·V　雷萨诺维斯基（Nicholas V Riasanovsky）：《俄国史》（A History of Russia），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3，第92～117页。

古典时期以来，欧洲的城市化水平首次超过了亚洲和近东。罗斯曼：前引书，第71～72页。1500～1650年期间，超过1万人口的城镇数量几乎翻了一番，接近200个。总体而言，城市居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由原来的7 4% 上升到10%。人口在10万人以上的新城市数量急剧增加。甚至长期挣扎在痛苦边缘的罗马也出现了城市的复兴，其人口由公元14世纪70年代的1 7万人增加到了1650年的12 4万人。莫里斯：前引书，第104～105页；德·福瑞斯：前引书，第29、50页。

关键问题在于，在城市网络的发展过程中，哪些城市的位置更优越。虽然巴黎和其他炫目的首都城市是先进的城市模式和富丽堂皇的典型，而实际上基本处于寄生状态，主要依附于他们的腹地。历史总是垂青那些控制了通往广阔世界的主要通道的城市。

西班牙帝国的衰落

正在扩张的欧洲经济最大的受益者，可能是那些已经掌控了面积广阔的海外帝国的城市。但是里斯本、塞维利亚以及后来的马德里没有足够的商业头脑去完全收获艰苦播种的果实。黑尔：前引书，第456页。

文化价值是这次失败的关键。像贝尔纳尔·迪亚斯的统帅和特诺奇蒂特兰的征服者赫尔南·科尔特斯之类的人，与其说是城市和经济的建设者，还不如说更像中世纪的武士。和其他征服者一样，科尔特斯主要是为了荣誉、上帝和金银财宝而奋斗。《普雷斯科特的历史》，第155页。

西班牙人自大意识浓厚，根本没有什么宗教宽容，这种情况最后有所改观。几个世纪以来，犹太人和新近皈依的新基督教徒在蒸蒸日上的欧洲城市的商业和职业生活中一直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在西班牙更是如此。黑尔：前引书，第168页。

塞维利亚、巴塞罗那、瓦伦西亚等城市意识到犹太人对商业活动的重要性，反对宗教裁判所。随着西班牙国家的专制统治日益加强，自治城市权利被全部清除，所有自治市的抵抗都被镇压。公元1492年的驱逐令颁布之后，超过18万的犹太人和新基督教徒离开了西班牙。对于这个生死攸关的一年，历史学家巴尼特·内特文夫评价说："西班牙让哥伦布航海探险，它因此获得了一个大陆；西班牙驱逐犹太人出国，它因此失去了左膀右臂。"亨利·卡门（Henry Kamen）：《1469~1714年的西班牙：冲突的社会》（Spain 1469-1714:A Society of Conflict），伦敦，朗曼出版社，1991，第39～42页；巴尼特·内特文夫（Barnet Litvinoff）：《1492年中世纪精神的衰落与现代的崛起》（1492:The Decline of Medievalism and the Rise of the Modern Age），纽约，埃文出版社，1991，第34、58页。

西班牙多数的资本由教会和贵族控制，清除犹太人和新基督教徒之后剩余的商业中产阶级大都缺乏商业经验，不能充分地利用摆在他们面前的新的商业机会。卡门：前引书，第246～248页。　财富基本上经过塞维利亚港涌入西班牙，最后流入意大利的中间人和贸易商手中。即使是出口西班牙殖民地的大部分商品，也要在西班牙以外的其他国家生产加工。西班牙帝国的黄金都抵押给了外国人去资助他们连年不断的战争

和为贵族阶层购买奢侈品，这成了西班牙的祸根。卡门：前引书，第170～171页；内特文夫：前引书，第66页；沃勒斯坦：前引书，第195页；J H 帕里（J H Parry）：《探索的时代》（The Age of Reconnaissance），纽约，门特出版社，1963，第66页。

连年粮食短缺，年轻人送到国外战死疆场，巨额的公共债务，人口大量外流，最为致命的是17 世纪末的瘟疫大流行，凡此种种，使西班牙的城市规模急剧减小。在16世纪，西班牙的人口增长了一倍，超过了90万人，人口超过1万人的西班牙城市数量到1650年减少了1/3。到17世纪，那不勒斯港是西班牙所占领的最大的意大利城市，该市在工业和人口两方面都轻而易举地超过了西班牙的任何一座城市。布罗代尔：《地中海》，第146～152页；卡门：前引书，第98～99、224～225页；德·福瑞斯：前引书，第30页。

北方的崛起

相比之下，北方的城市像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以及后来的伦敦，从迅猛扩展的世界贸易中受益匪浅。然而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城市中心在17、18世纪衰落了，而荷兰的城市中心人口增长了4倍，英国则超过6倍。伊迪丝·伊南（Edith Ennen）：《地中海城镇》（The Mediterranean Town），纳塔利·弗里德译，阿姆斯特丹，北荷兰出版公司，1979，第187页；德·福瑞斯：前引书，第30页。

这些城市崛起的关键武器不是它们雇佣的英勇无畏的探险家或武士，而在于银行家、商人和熟练手工业者的世俗性技艺。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1页。拥有勇敢的战士和坚忍不拔的传教士的西班牙并没有摘到帝国的商业果实，而是安特卫普和其他以经商为目的的荷兰的城市得到了它。罗森堡、伯泽尔：前引书，第70页。

如果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者查理五世能够接受宽容的原则，西班牙通过对这些城市的控制，或许仍可以主导着繁荣的欧洲城市经济。遗憾的是，西班牙统治者们推行天主教教义的强烈愿望将这些生产力发达、以基督教人口为主的北部城市变成了——正如西班牙的一位将军所描述

的那样——“欧洲的墓地”。

1572 年的大叛乱发生之时，荷兰的大部分地区揭竿而起，反对西班牙统治，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西班牙统帅阿尔巴公爵发动了残忍的镇压新教教徒的战争。荷兰的北部地区进行了成功的抵抗，而南部依然处在天主教的统治之下。

阿尔巴的战争对西班牙的商业未来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以新教徒为主的商人阶层纷纷逃离西班牙人统治的地区。1576年，安特卫普被西班牙军队洗劫一空，从此衰败下去。而西班牙多数有才干之人、资金和商界精英都转移到了北方新独立的城市。黑尔：前引书，第170页；德·福瑞斯：前引书，第30页。

阿姆斯特丹：第一个伟大的现代商业城市

在与西班牙进行战争的末期，阿姆斯特丹已成长为新独立的新教城市中最重要的一个。与当时欧洲城市明显的区别是，阿姆斯特丹并没有控制在贵族和牧师的手中，而是处于唯利是图的商人和工匠控制之下。精明的荷兰人被17世纪的英国作家描写成“尼科青蛙”(Nick Frog)，“只崇拜财神的泥浆之子”。西蒙·沙玛（Simon Schama）：《财富的困窘：黄金时代荷兰文化解析》（The Embarrassment of Riches:An Interpretation of Dutch Culture in the Golden Age），纽约，诺普夫公司，1987，第261页；J M 宝斯（J M Bos）：《十四世纪蒙尼肯丹的工业联合体及之前的事件》（A 14th Century Industrial Complex at Monnickendam and the Preceding Events），选自H A 海丁格、H H 范·雷格特伦(H A Heidinga and H H van Regteren)主编《梅德布雷克的蒙尼肯丹：中世纪荷兰北部的城市化》（Medemblik and Monnickendam:Aspects of Medieval Urbanization in Northern Holland），阿姆斯特丹，阿姆斯特丹大学出版社，1989，第21页。

公元13世纪的阿姆斯特丹不过就是一个渔村而已。之后，城市的居民扩充了运河系统，以此来有条不紊地扩大他们的贸易能力。随城市的发展，它一点点加强了城市周边的安全，通过行政命令要求用砖建设房屋以防火灾，并采取了措施改善城市卫生。莫里斯：前引书，第164

页；西蒙·格恩维德（Simon Groenveld）：《为了穷人的利益：阿姆斯特丹的社会救济》（For Benefit of the Poor:Society Assistance in Amsterdam），选自彼得·范·凯塞尔、伊利斯亚·舒特(Peter van Kessel and Elisja Schulte)主编《罗马和阿姆斯特丹：17世纪欧洲两个正在增长的城市》（Rome&Amsterdam:Two Growing Cities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urope），阿姆斯特丹，阿姆斯特丹大学出版社，1997，第206～208页。

荷兰的其他商业中心如莱顿和鹿特丹也采取步骤提高它们与世界的贸易能力。依仗1800只海船组成的巨大的海上舰队，荷兰城市的企业家们将触角伸向了其他地方。在地中海地区、非洲、亚洲和新发现的美洲大陆，他们常常在低买高卖的关键商战中，击败竞争对手。

到17世纪早期，荷兰半数的人口居住在城镇和城市，已经成为欧洲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84～185页；乔纳森·伊斯雷尔（Jonathan Israel）：《荷兰共和国的产生，壮大和衰落》（The Dutch Republic:Its Rise,Greatness and Fall），英国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第113～115页。荷兰的主要城市阿姆斯特丹让人感觉新鲜又似曾相识：这是一个人口密集的现代城市，并没有太多显眼的英雄雕塑和宽敞的城市大道，教堂、宫殿以及遍布的小巷、繁忙的码头、整洁舒适的住宅区却十分普遍。为赢得独立，阿姆斯特丹人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他们没有寻求军事冒险，建立一个新的罗马。他们仅仅是想摆脱一切干扰，进行贸易。沙玛：前引书，第15、253、294、311页。

阿姆斯特丹的加尔文教教义也帮助城市培育了以贸易和商业活动为中心的市民文化。加尔文教牧师删去了旧天主教教义中反对高利贷的规定，摈弃了根深蒂固的反对资本企业的偏见。相反，荷兰人把物质上的成功看成是上帝对他们认可的证明。17 世纪荷兰十分流行的史籍中这样写到：“阿姆斯特丹是在上帝的一手提携之下，才走到繁荣和伟大的顶峰。”沙玛：前引书，第44～46、300页。

就像古代的亚历山大里亚、鼎盛时期的开罗和15世纪的威尼斯一样，阿姆斯特丹商业的成功还要归功于城市广大的多元化的人口。该城

市宣称诸多教派都可以在那里和睦相处，其中包括天主教、胡格诺教、犹太教、路德教和门诺教等宗教机构，以及处于主导地位的荷兰归正教会。处在官方认可之外的宗教人口约占城市总人口的1/4。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德·布罗代尔评价说："宗教包容的奇迹在贸易集中的地区总能找到。"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0页。

商业活力与多元人口的结合为艺术、技术和哲学的大胆创新营造了一个理想的氛围。相比之下，在西班牙，宗教法庭审判官的儿子罗德里戈·曼里克抱怨说："如果为了免遭邪教徒、谬误和犹太教的嫌疑，就不能拥有任何文化。"卡门：前引书，第116～117页。而荷兰城市不但容许公开探索和创新，而且也在它们的大学、科学团体和出版物中培育这种精神。

实践证明，这种进取精神对城市的成功至关重要。起初，荷兰的贸易严重地依靠葡萄酒、木材、蔗糖和化学制品等商品。然而到了17世纪，荷兰使用了创新技术，更加果断地转向了"高利润贸易"——染料、釉料、陶瓷、尼龙、精制家具和织锦等商品。荷兰的企业家同样出口工程服务、工业技术和专门知识到范围更广的欧洲国家，甚至遥远的墨西哥。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85～188页；伊斯雷尔：前引书，第116～117页。

荷兰日益膨胀的中产阶级对城市发展成为文化中心起到了关键的作用。16、17世纪的荷兰的艺术家常常是技艺精湛的手工艺者如织锦的设计者、剪毛师、金银匠等人的后代。这些艺术家常常得到当地商人和制造业精英们的支持。艺术不仅成为赢得荣誉的渠道，也是挣钱的一种方式。伦勃朗就是一个很受欢迎的肖像画家，他的名气远远超过了他作为大学教授的名气。伊斯雷尔：前引书，第350～351页。

伦敦

文化的民主化在欧洲其他城市清晰可见。技术的进步使普通民众有越来越多的机会接近书籍。到16世纪30年代，甚至是法国普通的劳动者也能买得起一本《新约全书》。传统的障碍消除了。如斯宾诺莎人斯宾

诺莎人的祖先原居住于西班牙的埃斯皮诺萨地区，因其犹太种族出身，受到西班牙的伊斯兰与天主教以及封建专制的迫害。译者注。这样的犹太人和妇女当时可以参与到知识与文化的对话当中。法国作家路易丝·拉贝勉励妇女们说："知识给予我们的荣誉属于大家，谁也不能把它从我们身边偷走……或因时间的流逝而消失。"黑尔：前引书，第274～276页。

*这种新的精神在伦敦最为突出。在16世纪末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伦敦变成了包括从戏剧到激烈的科学与技术辩论等一切展示新事物的精彩的舞台。长期以来被禁锢而且使人心生恐惧的知识，此时被看作最有价值的东西。黑尔：前引书，第78～79、137页；A R 迈耶斯（A R Meyers）：《中世纪末期的英国》（England in the Late Middle Ages），伦敦，佩利肯出版社，1951，第211页。

不久，伦敦在学术成就和商业活力两个方面都开始超越阿姆斯特丹。到17世纪后期，荷兰人很明显已经失去了其曾经拥有的那股勇猛无畏和坚韧精神。荷兰的资本家——和以前威尼斯的资本家一样——常常选择成为食利者、土地和股份投资者，而不主动进行新的商业冒险。

荷兰的精英们主要对短期的商业利益感兴趣，1636～1637年对郁金香的狂热就是一个缩影，而他们缺乏决心捍卫在海外拥有的至关重要的领地。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其对待羽翼未丰的新尼德兰殖民地的态度。一位早期的探险家认定新阿姆斯特丹殖民地定居点是"一个绝佳的天然码头，可以接纳世界的商业"。这个面积不大的殖民地被河流和海湾包围，向大海敞开，居民人数不到1000人，是荷兰企业扩张的无与伦比的好机会。

但由于它受到周围英国殖民地的包围，有被入侵的危险，荷兰的商业界害怕投入用于防卫的资金而退却了。他们所关心的是坚守苏里南，它四面环海，易守难攻，而且岛上的蔗糖等 "商品"十分丰富。1664年，荷兰人几乎没有任何的反抗，将新尼德兰拱手让给英国人，后者很快将这个城市更名为纽约。亨利、巴巴拉·范·德齐（Henri and Barbara van der Zee）：《美好而不同的地方：荷兰控制下的纽约》（A Sweet and Alien Land:The Story of Dutch New York），纽约，韦金出版社，1978，

第2～3页；《新阿姆斯特丹：贸易邮递的边疆》（New Amsterdam,Ftontier Trading Post）；尼古拉斯·范·瓦森纳（Nicholas van Wassenaer）：“口述史学”（Historisch Verhael），选自肯尼思·T 杰克逊、戴维·S 邓巴《帝国城市：穿越世纪的纽约》（Empire City:New York Through the Centuries），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2，第26页。

世界资本主义之都

在新阿姆斯特丹更名为纽约之后不到10年，伦敦就已经做好了充当世界资本主义首都角色的准备。彼得·伯克（Peter Burke）：《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17世纪精英的研究》（Venice and Amsterdam:A Study of Seventeenth century Elites），英国剑桥，政治出版社，1994，第135～139页；范·德齐夫妇：前引书，第492～494页；埃德温G 伯罗斯、迈克·华莱士（Edwin G Burrows,and Mike Wallace）：《愚人村：1898年前的纽约城市史》（Gotham:A History of New York City to 1898），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第73～74页。这一角色的转换从长远来看是不可避免的。正如之前的意大利城邦那样，荷兰城市也受到资源匮乏和人口下降的制约。与其相反，伦敦能够吸引英国数量更多的人口充当定居者、士兵和水手。英国还拥有煤炭、铁和锡等重要的原材料。再加上英国极为开明的统治，这些因素将足以使荷兰城市臣服于伦敦之下。奥利弗A Rink（Oliver A Rink）：《哈得逊河上的荷兰：荷兰控制下纽约的经济社会史》（Holland on the Hudson: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Dutch New York），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6，第248～250页。

伦敦的崛起依靠的是将伟大的首都城市的优势与荷兰和意大利城邦的商业才干相结合的能力。自公元14世纪起，伦敦已经吸引了国内更广大的年轻且有抱负的各个阶层的人口。甚至像温彻斯特和林肯等老的城市中心衰退之时，伦敦的人口和经济迅速扩张。

像荷兰一样，新教主义的胜利加速了伦敦商业的发展。亨利八世出售教会土地，其面积大约为王国总土地面积的1/6，此举使国家和包括商人和手工业者在内的财产所有者变得富有。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中的

暴发户——他们中的一些人热心于加入贵族阶层——构成了被历史学家F R H 杜宝莱称之为“野心的年代”的基本组成部分。F R H 杜宝莱（F R H Du Boulay）：《野心时代：中世纪末的英国社会》（An Age of Ambition:English Society in the Late Middle Ages），纽约，韦金出版社，1970，第66页。

英国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从事航海的民族。当时那股抑制不住要“改善”其地位的欲望，驱使每一个英国人从事远洋贸易。迈耶斯：前引书，第37页；杜宝莱：前引书，第30页。强大的英国帝国梦想所产生的推动力，最终使其成功地控制了从中国沿海到北美荒野的贸易据点。最关键的是英国逐渐地接管了印度及其巨额的贸易。1601年，英国的税收还不到印度莫卧儿王朝的1/10。在不到200年的时间里，两者的税收情况完全颠倒过来。斯皮尔：前引书，第231页。

冒险精神反映了国家野心和决心的膨胀。教皇亚历山大在1712年预言，“无边无际的泰晤士河将为整个人类川流不息”。麦克尼尔：《权力的追逐》，第151页；罗兹·墨菲（Rhoads Murphey）：《变革中心的城市：西欧和中国》（The City as a Centre of Change:Western Europe and China），选自D J 德怀尔（D J Dwyer）主编《第三世界城市》（The City in the Third World），纽约，巴恩思·诺布尔图书公司，1974，第65页。到16世纪，伦敦的人口从6万人增长到近22 5万人。1666年大火之后，伦敦进行了大规模的重建，它很快成为了欧洲最大的城市。黑尔：前引书，第143页。到1790年，伦敦人口接近90万人，是阿姆斯特丹的四倍多。伊斯雷尔：前引书，第1011页；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65页；黑尔：前引书，第116页。

由于看到了新的机遇，意大利、荷兰和德国的商人和银行家逐渐地被吸引到了英国的首都。迈耶斯：前引书，第161～163、225、232～233页。在17家总部设在伦敦而且到20世纪一直存在的主要商业银行当中，有15家的创始人是来自不同地方的移民，而且很多银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此阶段的早期。由于企业家和熟练劳动力寻求宗教自由，逃离弗兰德斯、德国和法国等地，移民到英国伦敦，使其受益匪浅。哈米什·

麦克雷、弗朗西丝·凯恩克罗斯（Hamish McRae and Frances Cairncross）：《都城：金融中心伦敦》（Capital City:London as a Financial Centre），伦敦，艾尔·梅休因出版社，1973，第9页。

伦敦的崛起不仅规模更大，而且从性质上明显有别于其竞争对手如巴黎、马德里、维也纳或圣彼得堡等城市。和伦敦一样，这些首都都以其壮观的教堂、华丽的宫殿和景致优美的公园，以及国家的宏大为自豪。而只有伦敦才创立了充满活力的经济机构，用于掌控和管理日益扩大的世界经济。自很早的时候起，伦敦就已经具有作为伟大城市支柱的至关重要的道德意识。如同鼎盛时期的罗马帝国一样，伦敦做好了领导和改善世界的准备。埃姆里斯·琼斯（Emrys Jones）：《大都市》（Metropolis），英国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0，第93页；朱克：前引书，第196～198页。

第十三章　工业主义及其反对者

G　C　艾伦于1922年秋在神户下船登陆后，踏上一列开往日本城市名古屋的列车。在最初的几个小时里，这位22岁的英国学者旅程所见的是令人亢奋的、彻头彻尾的异国风貌，到处是阡陌相连的稻田、绿色的茶园和云雾缭绕的山地。

渐渐地，随着火车咔嚓咔嚓地驶入目的地，周围的景物变得熟悉起来。随后，一个城市赫然出现在艾伦面前，这座城市“淹没在林立的厂房、拥挤不堪的办公楼、水泥的高架路和新的高速火车系统的轨道桥梁之中”。艾伦恍然又回到家乡、工业大都市伯明翰。G　C　艾伦（G　C　Allen）：《约会在日本：六十年回忆录》（Appointment in Japan:Memories of Sixty Years），伦敦，阿思隆出版社，1983，第2～5页。

在名古屋如在英国一样，城市地域的工业化把曾经存在的那座城市彻底变了样。艾伦注意到，往往在同一个街区，“美与丑比肩而立”。在密密的厂房和丁当作响的有轨电车之间可能发现一条汩汩流淌的小溪，也可能一个保存完好的花园被包裹在令人抑郁、千篇一律的街道之中。艾伦：前引书，第37页。

工业主义的全球意义

随着工业化向全世界扩展，它开创了一个城市化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增长的新时代。到19世纪后期，大型城市中心几乎出现在每一个大陆上，在南美，在非洲，在澳洲，甚至竟然也出现在亚洲。就世界范围而言，已有5%以上的人口居住在10万人以上的城市中，几乎是一个世纪前的三倍。C　E　小伊莱亚斯、詹姆斯·吉利斯、斯文·里米尔（C　E　Elias,Jr　James Gillies,and Svend Riemer）：《大都市：冲突的价值》（Metropolis:Values in Conflict），加利福尼亚贝尔蒙特，沃兹沃思出版社，1965，第11～12页。

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这种增长是由行政服务、贸易、原材料出口

等因素驱动的。工业扩展受到殖民大国的重商政策、欠发达的交通系统和其他近代基础设施等因素的限制。在亚洲和非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过低的劳动力成本和缺少一个大的消费基础妨碍了机器的使用，所以多倾向于较分散的原始乡村工业。扎马尔·库马（Dhamar Kumar）：《剑桥印度经济史，第二卷，1757至1970年》（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India,vol 2,1757-1970），海德拉巴，东方朗曼出版社，第568～569页。

较显著的进步发生在其他地区。到20世纪早期，三个关键国家日本、德国和俄罗斯都自诩拥有蓬勃发展的工业大城市。东京、大阪、柏林和圣彼得堡开始直接与纽约、曼彻斯特以及伦敦相竞争，不仅在地区范围，有时甚至是世界范围。

正如艾伦在去名古屋的路上所看到的，这些城市都具有与英美都市同样的外部特征——杂乱无章的铁路、烟雾弥漫的厂房、拥挤的办公楼。但是它们以远远不同于英国或美国城市的方式回应工业化，寻求构成现代城市的另一种道路。

这种探求另一种道路的努力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工业化过程中，英国或美国都具有能够适应新的城市环境冲击的民主传统，而这三个国家没有。这几个国家试图在几乎是中世纪政治体制下迅速建成工业城市，缺少法治基础和社会态度去应对西格蒙德·弗罗伊德在其名著《文明及其缺憾》中所描述的在一个大型的、几乎是非人性化的现代大都市世界的生活中的“文化挫折”。西格蒙德·弗罗伊德（Sigmund Freud）：《文明及其缺憾》（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詹姆斯·斯特雷奇译，纽约，W W 诺顿出版社，1962，第59页。

日本突发性的工业革命

弗罗伊德是在维也纳落入国家社会党人手里的4年前写下这些话的。他也完全能够在日本看到“文化挫折”之类的现象。日本向工业时代的转变非常艰难，因为这种转变是爆发性的，而且发展极其迅速。在1686年推翻德川幕府的统治后，日本全速开始现代化进程。明治维新的设计师们迫不及待地试图追赶占支配地位的工业大国，优先考虑基础设

施投入和强调西方科技的重要性。

在明治之前，由于德川幕府实行限制与外国人接触政策，日本的城市发展很慢。卡尔·莫斯科（Carl Mosk）：《日本工业史》（Japanese Industrial History），纽约州阿蒙克，M E 夏普出版社，2001，第50页。但是当1853年威廉·佩里准将在东京湾的炮舰打破这种孤立状态时，日本已经比欧洲以外其他国家都更好地准备应对工业时代的挑战，这得益于它有一个文化层次较高的人口、较完善的全国市场、能干的工匠艺人和强烈的创业精神。托马斯·O 威尔金森（Thomas O Wilkinson）：《1868至1955年日本劳工的城市化》（The Urbanization of Japanese Labor:1868-1955），阿默斯特，马萨诸塞大学出版社，1965，第22～23页。

如在英国和美国一样，制造业经济的兴起也伴随城市人口迅速的增长。在明治维新后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日本城市人口就翻了一番。到20世纪20年代，每4个日本居民就有1个居住在城市。大阪出现了五花八门的小型工厂，享有“东方曼彻斯特”之美誉，其人口从1875年到20世纪20年代增长了5倍。名古屋也从一个古老的城堡式小镇变成主要工业中心，后来成为世界最具支配性的大型工业巨头丰田汽车公司就座落在该城。各地方性工厂城如福冈、川崎、九州岛和札幌增长更快。莫斯科：前引书，第55、201、202页；理查德·蔡尔德·希尔、藤田训子（Richard Child Hill and Kuniko Fujita）：《世界经济中的日本城市》（Japanese Cities in the World Economy）；中村八郎（Hachiro Nakamura）：《战前日本的城市发展》（Urban Growth in Prewar Japan），载于藤田训子、理查德·蔡尔德·希尔（Kuniko Fujita and Richard Child Hill）主编《世界经济中的日本城市》（Japanese Cities in the World Economy），费城，坦普尔大学出版社，1993，第5、30页；格伦·T 特里瓦撒（Glenn T Trewartha）：《日本地理》（Japan:A Geography），麦迪逊，威斯康星出版社，1965，第161页。

东京成为日本所有城市的龙头。在取代京都成为王室所在地后，东京获得了成为全国精神和世俗的都城的“合法性”。马里尤斯·B 詹森（Marius B Jansen）：《剑桥日本史，第五卷：19世纪》（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vol 5:The Nineteenth Century），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8，第731页；中村八郎：前引书，第30页。许多领先地位的商界大牌企业发现把其总部设在东京好处多多，所以他们更偏爱东京，而不是传统的商业中心如大阪或其他新兴工业城市。莫斯科：前引书，第174～175页；威尔金森：前引书，第45页。

1923年关东大地震，东京死10万余人，数百万人无家可归，遭受了摧毁性打击。但东京很快复兴起来，保持甚至强化了它在全国的支配地位。到20世纪30年代，东京号称拥有一个兴盛的中心商业区，高楼林立，百货商店云集，交通系统完备。艾伦：前引书，第124～125页。东京成为自工业化以来亚洲第一个能与纽约或伦敦相媲美的城市，甚至一度想超过它们。

“钢铁大鳄”

尽管有这些辉煌的成就，但工业化在社会、道德和环境等方面都造成了某种灾难性后果。一个作家注意到，甚至在19世纪后期，“还能看到丹顶鹤在东京的上空翱翔”，狐狸和獾类动物在大量繁衍，隅田河的河水还可以用来沏茶。西山松之助（Nishiyama Matsunosuke）：《江户文化：1600至1868年日本城市中的日常生活与娱乐》（Edo Culture:Daily Life and Diversions in Urban Japan,1600-1868），杰拉尔德·格勒默尔译，火奴鲁鲁，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97，第9页。但到了20世纪20年代，日本城市出现了日益恶化的环境污染，到处是丑陋不堪的景象，他们传统宗教信仰和古代文化所赖以依存的美轮美奂的自然环境遭受了灭顶之灾。靠运河串联起来的大阪曾被称为“水城”，现在成了“烟城”，它的运河臭气熏天，充斥着有毒化学物。莫斯科：前引书，第217页。

新技术当然也带来很多神奇的变化。从前的农夫乘上了由电力公司运营的火车和有轨电车，到城里工厂做工。出身卑微的工匠或穷困潦倒的武士也超越了古代流传下来的阶级障碍，成为日本新兴工业经济的新领导人物。曾经对学者和政府官员们封闭的信息现在也可广为利用，其途径是普及教育，市场化大批量的书刊报纸，还有广播。

但是人们还是普遍感觉到，传统观念和高尚生活方式现在受到了非人性化和危险的外来力量的冲击。19世纪60年代发行的地图曾标示风景名胜和历史古迹；新时代的铁路地图索性摒弃这些文化和审美的因素，纯粹是计量距离而已。

作家夏目漱石1916年时曾在其著述中抨击这个“钢铁大鳄”肢解乡村、威胁个性的存在的“暴力方式”。比阿特丽克斯·M 波达特-贝利（Beatrice M Bodart Bailey）：《城市化和德川霸权的特性》（Urbanisation and the Nature of the Tokugawa Hegemony），选自《历史视角中的日本首都》，第175、199页。这个“钢铁大鳄”似乎要用烟尘蔽日的工厂和灰暗的水泥建筑取代传统日本城市生活中欢快而丰富多彩的古代中心性标志，如城墙、庙宇和大型中心市场。威尔金森：前引书，第77～78页。

重塑日本城市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险峻的经济形势导致很多日本人质疑西方模式的合理性。日本领导人也越来越思考如何使其更加城市化的社会需求与根深蒂固的传统主义、往往是过分的排外情感相协调。有些日本人并不认可或接受这种冲突以及与欧美工业城市相伴生的反常状态，而是寻求用更习惯的又少有争议的扩展家庭网络的定义构建城市社会的方式，这就是社会学家植节子所说的“房屋的理念或意识”。威尔金森：前引书，第122～123页。

维护“房屋”的等级结构会强化父母、厂主、军事和政治领导人、最终是天皇的权威。很多政府和学界领导人物现在都认为西方应对反对派的理念和渐进式民主变革不适合日本。相反，用教育部精神文化研究所的话来说，他们寻求某些使“国家尽善尽美、全国一心”的方式。约翰·W 道尔（John W Dower）：《战争没有怜悯：太平洋战争中的种族与权力》（War Without Mercy:Race and Power in the Pacific War），纽约，万神殿出版社，1986，第31页。

把这些道义上的一致贯彻到一个日益复杂的城市化的社会，需要高度的组织管理和纪律约束。工人阶级组织或可以同化，或需要压制。伊

夫林·S 科尔伯特（Evelyn S Colbert）：《日本政治的左翼》（The Left Wing in Japanese politics），纽约，太平洋关系研究所，1952，第33页；乔治·奥克利·托顿三世（George Oakley TottenⅢ）：《战前日本的社会民主运动》（The Social Democratic Movement in Prewar Japan），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66，第106～107、259页。当局也发起一些防范西方影响的文化讨伐运动，所抨击的对象从西方的时装和爵士乐到好莱坞电影或女性解放主张。东京、大阪和其他日本大城市都是西方影响最深的，自然也要肃清从纽约、洛杉矶和伦敦舶来的文化标准。罗伯特·J C 布托（Robert J C Butow）：《东条英机与战争的来临》（Tojo and the Coming of the War），加利福尼亚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9，第146～148页；道尔：前引书，第228～229页；谢尔登·加戎（Sheldon Garon）：《成型的日本人思想：日常生活中的国家》（Molding Japanese Minds:The State in Everyday Life），新泽西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7，第82～83页。

除了这些道义改革外，日本的城市规划者们也寻求某些方法来重塑与传统生活方式更加匹配的城市生活。有日本这个日益丰厚的帝国财富可利用，有些人致力于在满洲、朝鲜和崛起中的“大东亚共荣圈”的其他地方创建新的理想的城市中心。

在靠近他们家乡较近的地方如东京和名古屋，他们制订规划，用绿带和洁净的卫星社区取代蔓延的住宅街区。日本最有影响的规划师西山夘三就是把他的城市视野放在传统的邻里结构“町”（Machi）上。工作和居住将尽可能地结合在一起，使居民的生活方式与传统的村落更接近。西山秉承传统理念，反对那种以美国城市为典型的高层建筑，赞成发展他所说的“生活圈”，即分散化的自我管理的邻里社区。

纳粹的实验

西山和其他日本规划师从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家戈特弗里德·费德所阐发的新传统主义思想中获得灵感。费德在其《新城市》（die neue Stadt）中，极力赞成产生一个分散化的由农业区域所环绕的城市区。卡萝拉·海因（Carola Hein）：《梦想的计划与计划者：日本的传统与西方的影响》（Visionary Plans and Planners:Japanese Traditions and Western

Influences），选自《历史视角中的日本首都》，第309～342页。费德与西山和其他日本规划师一样，认为欧美社会在世界范围对他所称谓的传统价值产生了消极影响，他对此深感不安。杰弗里·M 迪芬多夫：《西德人关于城市规划的辩论》（The West German Debate on Urban Planning）、《美国对西欧的影响：美国化与西方化在大西洋彼岸的视角》（The American Impact on Western Europe:Americanization and Westernization in Transatlantic Perspective），德国历史研究所会议，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1999年3月25日至27日；克劳斯·P 费希尔（Klaus P Fischer）：《纳粹德国：新的历史》（Nazi Germany:A New History），纽约，科提因姆出版社，1995，第116～117页；乔吉姆·里曼克（Joachim Remak）：《纳粹时代：记录历史》（The Nazi Years: A Documentary History），新泽西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Prentice Hall出版社，1969，第30页。

如在日本一样，德国工业革命虽然稍晚一些，但也带有突发性，产生很多悬而未决的结果。这一点在新近统一的德国首都柏林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明显。几个世纪以来，柏林一直是普鲁士的“兵营城镇”，死气沉沉，毫无生机。19世纪末，她突然一跃成为人口达150万人之众的大都市。在其周围出现大量工厂，一个观察家发现，那里的“每一个烟筒都喷涌出滚滚浓烟，火花四溅，仿佛它就是伏尔甘伏尔甘是古罗马宗教所信奉的火神，专门象征破坏性的火。译者注。引发的火城”。

* 柏林这个统一后的德国之都被普遍认为是欧洲最现代化的城市，它也被看成是“美国缩微版”或者“狂热的芝加哥”。菲利普·奥斯瓦德（Philipp Oswald）：《柏林：一座无形之城》（Berlin:A City Without Form），http://www urban os com/think pool/one?think_id=3164；恩格斯，前引书，第333页；海伦·梅勒（Helen Meller）：《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欧洲城市的历史、文化和环境》（European Cities 1890s-1930s:History, Culture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纽约，约翰威利出版社，2001，第10页；莫里斯：前引书，第166～167页；里奇：前引书，第141、144页。这种迅速发展给它带来了工业城市常见的问题：贫民窟式住房、犯罪、层出不穷的违法乱纪现象。到1900年，柏林既是欧洲最拥挤的城市，也是激进的社会党人潜滋暗长的主要中心。利斯：

前引书，第119～121页；里奇：前引书，第163、167页。

柏林兴盛的工业吸引了德国乡间的农民，也吸引了邻国波兰穷困潦倒的内陆地区的移民。很多新来者都被这样一座“金钱经济”压倒传统价值的城市弄得神魂颠倒。一位柏林人、社会学家乔治·辛梅尔注意到：

在每一个街道交叉口，随着经济、各个行业和社会生活的迅速发展和多样化，这座城市在心理生活的感觉基础方面与小城镇和农村生活形成了明显的反差。乔治·西姆尔（Georg Simmel）：《大都市和精神生活》（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引自《乔治·西姆尔的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库尔特·H 沃尔夫（Kurt H Wolff）译，纽约，自由出版社，1950，第410～413页。

如同在日本一样，这种对德国人“心理生活”的抨击导致一种对舶来品的恐慌。长期以来被欧洲人憎恨、恐惧和愤懑的犹太人，在这种日见增长的排外情绪中首当其冲。里曼克：前引书，第8～9页；威廉·阿普尔曼·威廉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现代美利坚帝国之根基：对市场社会中社会意识的成长和塑造的研究》（The Roots of the Modern American Empire: A Study of the Growth and Shaping of Social Consciousness in a Marketplace Society），纽约，兰登书屋，1969，第204页。1895年，维也纳这个德语世界的心理文化之都的选民选举了一位公开反对亲犹太主义的卡尔·卢埃格尔为市长。

卢埃格尔市长在反对亲犹太主义方面所进行的成功的鼓动宣传给一位年轻的乡巴佬阿道夫·希特勒以深刻印象，当时希特勒还是在维也纳为生计而奔波的小艺术家。几十年以后，这位国家社会党领袖（Fubrer）把卢埃格尔称为“纵贯古今的全能市长”。卡尔·迪特里希·布雷克（Karl Dietrich Bracher）：《德国独裁统治：国家社会主义的起源、结构和影响》（The German Dictatorship: The Oringins, Structure and Effects of National Socialism），琼·斯坦伯格（Jean Steinberg）译，纽约，普莱格出版社，1970，第45页；卡尔·E·斯库斯克（Carl E Schorske）：《世纪末维也纳的政治与文化》（Fin de Siecle Vienna: Politics and Culture），纽约，诺普夫出版社，1979，第5～6页。象卢埃格尔一样，希特勒和国家社会党人、包括他的顾问戈特弗里德·费德，

都把犹太人看成是对德国城市中产阶级在经济和道义上的主要威胁。《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计划》（Program of the 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 Workers Party），选自里曼克前引书，第27～29页。因为这些犹太人精于理财并且在鼓吹社会主义方面异常活跃。

像日本一样，纳粹发动了一场范围更加广泛的文化战争，凡是他们认为属于外国的艺术、音乐和文化，一概反对之。他们发起运动反对盎格鲁-美利坚风格的服饰，反对“堕落的”爵士乐以及当时在德国城市里已很流行的文学。此类所谓堕落现象在柏林最突出，当地的党务头头约瑟夫·戈培尔把柏林嘲讽为“邪恶的老巢”。迈克尔·伯利（Michael Burleigh）、沃尔夫冈·卫普曼（Wolfgang Wippermann）：《种族主义国家：1933～1945的德国》（The Racial State: Germany, 1933-1945），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1，第220～222页。

一旦当权，希特勒立即抛弃了费德的使城市区域分散化的主张，让这位老导师处于体面的半退休状况。当然，纳粹党人并没有退回到过去的农村生活，而是寻求把城市塑造为他们自己选择的“另一种现代化模式”。罗杰·伊特威尔（Roger Eatwell）：《法西斯主义：一个三维的途径》（Fascism: A Three Dimensional Approach），最终稿。亚历山德·坎皮（Alessandro Campi）主编，罗马，安东尼奥·佩里卡尼出版社，2000。希特勒也并没有削减柏林的人口，而是坚持认为柏林“应该被提升到可与世界上所有首府城市相抗衡的较高文化层次”。

在1936年大事张扬地开完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后，希特勒的主要设计师阿尔伯特·斯皮尔拟定了一些周密的计划，试图把柏林转变成德国式的、人口众多的大都市，成为古罗马或巴比伦的今日版本。根据该规划，柏林将铺设宽阔的大道，设立几个可举行大型仪式的中心，包括一个可容纳12 5万人的带穹顶的大会堂，以及可容百万之众的阿道夫·希特勒广场。

然而，并不是费德的所有主张都被弃置不用，在纳粹党人对新开发的东部领地规划中，纳粹党人设计了一个由德国人支配的密集的工业中心所组成的“群岛”，周围是农业聚落和传统的村镇。克劳斯·费希尔：前引书，第367页；里奇：前引书，第407、432、437页。这些大而不当

的规划，像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那些规划一样，随着二战这场浩劫而灰飞烟灭。日本和德国的这些城市成为一片废墟，它们将再度崛起，但这次却是在美国人的监护之下。

俄国：第三种选择

俄罗斯的城市化远远落在包括日本和德国等其他国家后面。1689年代加冕的彼得大帝曾在欧洲广为游历，造访过诸如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等大城市。他所设想的帝国之都应该是现代的，而且有外向性特征。他认定，唯有俄罗斯能与欧洲竞争对手平起平坐之时，他们才敢对西方“有所不恭”。W 布鲁斯·林肯（W Bruce Lincoln）：《午夜阳光：圣彼得堡和现代俄罗斯的崛起》（Sunlight at Midnight: St Petersburg and the Rise of Modern Russia），纽约，基本出版社，2002，第1～3页。

彼得大帝的新都圣彼得堡于1703年奠基，设计理念是把荷兰的商业能量与意大利和凡尔赛的富丽堂皇的建筑艺术结合起来。它将包罗万象：亚洲的、反西方的、粗拙的、庸俗的、沉闷的、乡野的，而不似莫斯科。罗杰·P 巴特利特（Roger P Bartlett）：《人类的首都：外国人在俄罗斯的拓殖历程》（Human Capital: The Settlement of Foreigners in Russia），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79，第1～2、94～95页。

作为新的政治中心所在地，圣彼得堡迅速扩展，到1796年凯瑟琳女王时期已达到20万人口，到19世纪中叶再增长到50万人。雷金纳德·E 泽尼克（Reginald E Zelnik）：《沙皇俄国统治下的劳工和社团：1855～1870年圣彼得堡的工厂工人》（Labor and Society in Tsarist Russia: The Factory Workers of St Petersburg, 1855-1970），加利福尼亚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1，第221页。制造业发展略为迟缓。像北美一样，俄罗斯有发展工业的天然有利条件：丰富的自然资源，幅员广阔的土地，密如蛛网的江河水系。这种自然界的有利优势却被每况愈下的社会秩序抵消了。直至1861年，全国大部分人口，包括很多临时居住在首都的，都是被束缚在各自村落土地上的农奴。泽尼克：前引书，第23、27页；雷萨诺维斯基：前引书，第309页。

甚至在农奴制被废除之后，俄罗斯城市也仍然缺少大量独立的财产

所有者阶层，而在英美国家城市增长方面这些人是非常关键的。大部分经济资源仍掌握在国家和贵族以及越来越多的外国投资人手中。中等阶层主要是小商贩、官吏、学者和其他服务于当权部门的专业人士。丹尼尔·R 布劳尔（Daniel R Brower）：《1850～1900年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俄罗斯城市》（The Russian City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1850-1900），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0，第9、13～14、23、202、221页；尼古拉斯·雷萨诺维斯基（Nicholas Riasanovsky）：《尼古拉斯一世和俄罗斯的民族性1825～1855》（Nichlas I and Official Nationality in Russia, 1825-1855），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59，第134～135页。

这种高流动性的阶级结构以及独裁性的政治体制，扩大了城市人口和当权者之间的鸿沟。渐进性改革毫无希望，国家的进步也遥不可及，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日益变得激进起来。阿纳托尔·G 曼殊（Anatole G Mazour）：《1825年第一次俄国革命：十二月党人运动的起源、发展和意义》（The First Russian Revolution, 1825: The Decembrist Movement, Its Origins, Development, and Significance），加利福尼亚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1，第261～272页；泽尼克：前引书，第17页。

通向革命之路

俄罗斯工人和中产阶级的愤懑有其充分的理由。自俄罗斯开始工业化以来，其市政体制和基本设施就在封建的历史中徘徊。莫斯科的这座古都依然是密密麻麻的、只有一层的木制建筑杂乱堆积，简陋粗糙，连下水设施都没有；没有专业治安队伍和起码的医疗保障系统。

这些现实与统治阶级的奢侈生活之间的反差在圣彼得堡体现得最突出，在那里，如同格戈尔所注意到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虚幻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梦境，每一件事情都不是它应该的样子”。从意大利高雅风格的冬宫向外几步之遥，就是工人居住的通风不良、臭气熏天的贫民窟，圣彼得堡是当时欧洲病态特征最明显的城市。

圣彼得堡的工业结构主要是由大型制造业构成，这在客观上反而有

利于工人创办群众性组织。在满足他们基本食物供应和改善工作条件的要求失败后，工人组成了苏维埃或自治委员会，并很快转变成政权组织形式。劳拉·恩格斯坦（Laura Engelstein）：《1905年莫斯科的工人阶级组织和政治冲突》（Moscow 1905: Working Class Organization and Political Conflict），加利福尼亚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2，第13、27页；林肯：前引书，第9页；泽尼克：前引书，第240～241页；雷萨诺维斯基：《俄国史》，第470～474页。1917年10月，圣彼得堡工厂的工人在一个到处是农业人口、城市居民少而又少的国度里，催生了一个新的政权，成为除英美工业城市以外的第三种类型的城市。

苏维埃体制

如果有区别的话，获胜的布尔什维克政权被证明比沙皇政权更加独裁专制。它们对西方实利主义的抵制比之日本和纳粹更加广泛深入。小说家阿列克塞·托尔斯泰回忆，“每一样事情都被取消了，包括级别、荣誉头衔、补助金、官员的肩章、字母表的第13个字母、上帝、私有财产，甚至人们希望生活的权利”。林肯：前引书，第242页。

共产主义者欣赏彼得大帝试图产生一个高度城市化的俄罗斯的梦想。一位历史学家注意到，直至1917年，俄罗斯的城市也不过是“农民汪洋大海中的几个孤岛 ”，只有15%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中心。随着共产党人权力的强化，他们决心改变历史，使这些孤岛变得更大、更有实力。威廉·J 蔡斯（William J Chase）：《工人、社会和苏维埃国家：1918～1929年莫斯科工人及其生活》（Workers, Society, and the Soviet State: Labor and Life in Moscow, 1918-1929），厄巴纳，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87，第6～7页；保罗·E 莱恩多夫（Paul E Lydolph）：《苏联地理》（Geography of the U S S R），纽约，约翰威利出版社，1964，第275页。

作为苏维埃选定的首都，莫斯科重新获得有利的地位。把莫斯科的人口保持在一个令人满意的程度上现在已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一个关键的政治任务。列宁注意到，“把莫斯科的工人从饥饿中拯救出来就是拯救革命”。食物往往是用武力从农民手中夺过来，为这些新的统治阶级、城市无产者充饥。蔡斯：前引书，第24～25页。

1917~1921年的内战使莫斯科人口剧减，但在20年代中期开始迅速增长，到20年代末达到200万人。随着统治秩序的稳固，死亡率下降，出生率飙升。每一年都有数以千计的雄心勃勃但又饥肠辘辘的人涌入这座城市，试图在这个新的权力中心找到工作。蔡斯：前引书，第73页。

更具有世界性特征的圣彼得堡情况更糟，它于1924年被改名为列宁格勒，以纪念这位过世的苏维埃创立者。早在日本和德国的统治者之前，共产党人就发起了横扫西方城市文化的运动。任何人只要收到从国外来的信，都会被遣送到数量不断增加的集中营(gulag)去。30年代大清洗运动迫害了圣彼得堡大多数知识分子和文艺界的精英，包括在50个赫米塔西国立博物馆的馆员。林肯：前引书，第231～233页。

“磨快斧头”

苏维埃同样也不尊重城市在其演化过程中所发挥的神圣之地的作用。下诺夫格罗德市很快就被改成了高尔基市；查里津市变成斯大林格勒市；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家人被斩杀的城市叶卡捷琳堡市被改为一个苏维埃领导人的名字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新近更名为列宁格勒的城市景观以成片的新住宅群落、办公楼群和商业用房为主，用一位作家的话说，呈现出“沉闷的新古典风格”。林肯：前引书，第260～261页；威廉·亨利·钱伯林（William Henry Chamberlin）：《俄罗斯的钢铁时代》（Russia s Iron Age），波士顿，小布朗出版社，1935，第5页。

莫斯科经历了更剧烈的变化。斯大林这位从边远的格鲁吉亚来的乡巴佬并不看好城市的价值，在这一点上他都不如在维也纳和慕尼黑长大的希特勒，也比不上对本国城市历史有偏爱的日本的民族主义者。令大多数建筑界人士感到恐怖的是，苏维埃的这位独裁者竟下令拆除该城宏伟的、用俄罗斯信徒的钱建造的救世主大教堂，另建一个新的苏维埃宫殿，斯大林竟把这个建筑称之为“数百万苏维埃民主的创造性理念”的纪念碑。

赫鲁晓夫跟随斯大林成为苏维埃民主的领导人，他对城市同样具有相似的复杂微妙的情感。他于1937年曾说，“在建造莫斯科的过程中，我们不在意搬走一棵树，一个小教堂或是某种教堂，诸如此类”。德米

特里·沃尔科古诺夫（Dmitri Volkogonov）：《斯大林的胜利与悲剧》（Stalin: Triumph and Tragedy），哈罗德·舒卡曼（Harold Shukman）译，纽约，葛罗夫·威登费尔出版社，1991，第234页。赫鲁晓夫下令拆毁原有的老城，包括它的凯旋门、老的塔楼和城墙。当建筑师们恳求他保留一些有历史性纪念意义的建筑时，他的回答是，让他手下的建筑人员继续“磨快斧头”。德米特里·沃尔科古诺夫：《为帝国验尸：创建苏联政权的七个领袖》（Auto for an Empire: The Seven Leaders Who Built the Soviet Regime），哈罗德·舒卡曼译，纽约，自由出版社，1998，第184～185页。

共产党人试图扩大制造业生产能力，在城镇建设上发起一次雄心勃勃的大跃进，到30年代，苏维埃政权已远远超过沙皇时期的工业生产能力。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崛起为干旷草原上的一个钢铁巨人，是苏维埃新城市的典型：没有清真寺、没有教堂、没有自由市场，主要人口构成是被一些狂热青年共产党人组成的军团的驱赶下的强制劳动力。像英国在资本主义工业化早期阶段的牺牲品一样，苏维埃国家的这些强制劳动力忍受着恶劣的工作环境，受各种流行病如伤寒、斑疹伤寒和其他传染性疾病的威胁。钱伯林：前引书，第51～53页。

在某种意义上，苏维埃的城市政策确实是成功了：他们把一个以农村为主的国家完全转变成大部分是城市居民的国家。到30年代，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等城市跻身于欧洲大城市之列，其他略小一些的，尤其是工厂城如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高尔基、斯大林格勒和车里雅宾斯克等扩展得更快。从1939到1959年，苏联的城市人口增加了3000万人，而农村人口减少2000万人。到1960年，50%的苏联公民是城市居民。莱恩多夫：前引书，第275页。此外，也有些闻名遐迩的建设成就，如莫斯科地铁和新的电气化系统。

共产主义的城市遗产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城市的状况逐渐有所改善。食品丰富起来，长期的住房短缺问题也得到了缓解。然而，作为居家生活的地点，共产党人的城市依然是昏暗呆滞的，了无生气，自发的商业活动被限制在偶然为之的农民市场或者悄然兴起的地下经济的不轨行为中。社会生

活很少集中在街道或公共场合，更多的是亲朋好友挤在狭小的公寓住宅里，自娱自乐。

最说明问题的是，苏维埃未能产生一个城市生活标准，即使与西方城市相比差得很远的标准也没有，如果考虑到这种体制号称推崇“唯物主义”价值体系，就更说明问题了。赫鲁晓夫在70年代时还在自我吹嘘苏联将“超过”美国的生活质量，这对于那些在舒适程度方面远远落在不仅是西方、甚至包括崛起中的亚洲国家的苏联城市居民而言，颇为尴尬。N S 赫鲁晓夫（N S Khrushchev）：《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1956～1963年选集》（Socialism and Communism: Selected Passages 1956-1963），莫斯科，外语出版社，1963，第18、43页。

随着共产党政权在80年代后期步入四面楚歌的窘境，情况更糟糕。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的大批高层建筑开始渐渐破损。俄罗斯城市化程度很高的欧洲部分的城市有2/3供水紧张，无法满足最低生活需要，大多数苏联城市空气污染程度比西方任何城市严重。沃尔科古诺夫：《为帝国验尸》，第280页；《俄罗斯环境前景》（The Environmental Outlook in Russia），俄罗斯国家情报委员会，1999年1月。

共产党人的城市主义本意是试图修补工业城市的缺损，但实际上在每一个方面都没有实现其初衷，尤其在道义问题上。尼古拉斯·别尔加耶夫曾注意到，共产党人寻求培养一种有更高抱负的“新人”，但其“唯物主义”哲学最终把人转变成一种“平面的二维结构物体”。在城市和个人的神圣的特质及其历史被剥夺之后，苏维埃的实验留下了一份灰暗而贫乏的城市遗产。尼古拉斯·别尔加耶夫（Nicolas Berdyaev）：《俄罗斯共产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 of Russian Communism），安阿伯，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60，第182页。

第十五章　郊区的胜利

二战后，美国郊区化的速度又一次加快，20世纪50年代，郊区人口显著增长，占全国城市人口增长的84%。这其中很大的原因是因为通过了资助退伍军人的法律，拥有住房成为中产阶级、甚至工人阶级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到80年代中期，美国所有家庭中的2/3拥有自己的住宅，家庭住房拥有率是经济繁荣的德国、瑞士、法国、英国和挪威的两倍。近3/4的美国劳工联合会和产业工会联合会的会员和绝大多数结构完整的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杰克逊：前引书，第7页；唐纳森：前引书，第4页。

曾经以农场和城市为主的美国，正在向郊区为主的国家转变。人们不再被限定在老城区或离城市中心不远的“城市电车郊区”，越来越多的郊区居民住在更加分散的新开发的郊区，如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在长岛平原地带上兴起的莱维敦。弗雷德·西格尔（Fred Siegel）：《未来在这里发生：纽约、哥伦比亚特区、洛杉矶和美国大城市的命运》（The Future Once Happened Here: New York, D C , L A , and the Fate of America s Big Cities），纽约，自由出版社，1997。为了让莱维敦之类的开发计划切实可行，纽约规划大家罗伯特·摩西曾帮助设计了道路系统，他了解这些新社区巨大的吸引力：

那些只有房屋颜色和所种植物略有区别的火柴盒式的普通郊区住宅，是成功的标志，在其他大陆上数以百万居民对此闻所未闻。狭小的住宅分块不仅反映了开发商的贪婪，也反映了房屋主人不愿修剪太多的草坪和清除太多的积雪的谨慎——这些细节历史学家很难知情。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城市死亡了吗？》（Are Cities Dead?），选自《大都市的价值冲突》（Metroplis: Values in Conflict），第53页。

历史学家乔恩·蒂福德解释说，郊区不仅向人们展示了一排排没有尽头的草坪和车库，同时也反映了人们想“逃避现实又不得面对现实的复杂心理”。乔恩·C 蒂福德（Jon C Teaford）：《后郊区时代：边缘城市的政府与政治》（Post Suburbia: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the Edge Cities），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7，第10页。

郊区为从拥挤的城市归来和受原有的种族关系困扰的人们提供了临时休息的港湾。在那里，人们可以建立新的友谊和加入新的团体而不必顾及传统的社会习俗。小说家拉尔夫·马丁说，郊区宽敞的庭院、崭新的学校和公园仿佛是“孩子们的天堂”。拉尔夫·G 马丁（Ralph G Martin）：《新的生活模式》（A New Life Style），选自路易斯·H 马苏迪（Louis H Masotti）与杰弗里·K 哈登（Jeffrey K Hadden）主编《转变中的郊区》（Suburbia in Transition），纽约，新观点出版社，1974，第14～21页；威廉·H 怀特（William H Whyte）：《组织人》（The Organization Man），纽约加登城，双日出版社，1957，第331页。

“死一般沉睡”

显而易见，郊区赢得了数百万普通居民的青睐，但在当时富有经验的社会批评家和城市学者们中却不受欢迎。他们把新的城市边缘社区贬得一无是处，说它们不但破坏了自然景观，还造成了文化的荒漠。整个20世纪后半期，郊区使美国变成了“一个没有固定位置的小块土地的集合体”，“分裂了”国家的认同感并导致民族间界限的扩大。安德列斯·杜安尼（Andres Duany）、伊丽莎白·普雷特-赞贝特（Elizabeth Plater Zybeck）、杰夫·斯珀克（Jeff Sperk）：《郊区国家：无序扩张的兴起和美国梦的衰落》（Suburban Nation: The Rise of Sprawl and the Decline of the Amercian Dream），纽约，北点出版社，2000，前言第7页，正文第59页。如20 世纪50 年代的诗人理查德·威尔伯的诗所写得那样：

在精神萎靡与麻木的夏日， 上中郊区死一般沉睡。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城市的前景》（The Urban Prospect），纽约，哈考特·布瑞斯出版社，1968，第221页；唐纳森：前引书，第202页。当小块的郊区土地发展成为成熟的、有建制的社区，尤其在东北部和中西部，它们常常会破坏当地久已存在的经济和生活方式。一位观察家写道，康涅狄格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工厂曾经是当地的经济支柱，现已经倒闭，静静地荒废在那里。“山谷里，通勤者来回穿梭，从乏味的城市匆匆赶往郊区的家，他们的汽车前灯，让它感到了恐惧。”威廉·M 多布

里恩（William M Dobriner）：《郊区的阶级》（Class in Suburbia），新泽西恩格尔伍德克立夫，学府出版社，1963，第140页。

对郊区最尖刻的批评往往来自执著的城市规划家和情绪激昂的城市居民。刘易斯·芒福德认为，郊区是“城市对立面”，它抽取了老城区的精华。他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居民和企业迁移到城市郊区，郊区正在把城市由创造性的中心变成被令人唾弃的“杂乱无章而四分五裂的城市集合体”。

对于向郊区迁移最多的指责集中在日益扩大的种族分裂局面，即大多数白人居住在郊区，而越来越多的黑人滞留在中心城市。很明显，一些新的郊区居民和迎合他们需要的开发商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偏见：1970年，将近95%的郊区居民是白人。作家威廉·怀特抱怨说：“在一些郊区，（你）很难看到一个黑人、穷人或年龄在50岁以上的人。”杰克逊：前引书，第42页；威廉·H 怀特（William H Whyte）：《反城市》（The Anti City），选自《大都市的价值冲突》，第69页；克拉克等：前引书，第469页；海斯：前引书，第7页。

过去多年居住在南部农村的非洲裔美国人，现在成为很多大城市的主要居民，尤其是北部和中西部大城市。到20世纪60年代，超过51%的非洲裔美国人居住在内城，而内城的白人人口仅为30%。蒂福德：《心脏地带的城市》，第232～244页；克拉克等：前引书，第418页。这种人口分布模式在底特律、纽瓦克、圣路易斯、克利夫兰和加利福尼亚的奥克兰等工业城市最明显。约翰·J 哈里根（John J Harrigan）：《大都市中的政治变化》（Political Changes in the Metropolis），波士顿，小布朗出版社，1976，第36～37页。

郊区和城市之间隔阂的日益扩大所引起的社会危机，有分裂国家的危险，并且加剧了中心城市的恶化。1968年刘易斯·芒福德令人信服地写道，美国城市“正在解体”。芒福德：《城市的前景》，第207页。当时许多城市似乎被违法、犯罪、吸食毒品等社会病症所吞噬。希默尔法布：前引书，第225～233页。《纽约时报》在1968年指责说：“社会混乱肆虐纽约。”路易斯·M 哈克（Louis M Hacker）：《美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过程》（The Course of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and

Development），纽约，约翰威利出版社，1970，第351页。相比之下，郊区成为了白人躲避内城居高不下的犯罪率的避难所。

“摩天大楼美如烈焰”

面对大量居民向郊区迁移和贫困居民积怨日益加深，中心城市竭尽全力以保全它们的历史优势。有人提出,新的技术造成了城市的蔓延，也能促成人口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向城市集中。他们坚持认为，如果能扫除阻碍城市发展的固有障碍，用更加现代的东西取而代之，古老的城市中心就会得救。

在瑞士出生的建筑设计师查尔斯·埃德亚·基纳瑞特是这一观点最明确的推崇者，该设计师以柯勃彦这个名字广为人知。他对当时城市小别墅、小公寓和多户分租住房这种大杂烩居住模式不屑一顾。相反，他试图在商用大楼林立的旁边，竖起16层高的公寓大楼。他发表在《郊区居民》杂志上的理想是将居住、商业、娱乐和交通的功能分开，让城市居民享受到足够的绿地空间。

柯勃彦非常讨厌以前城市那种浪费空间和反现代的装饰风格。为确保城市的将来，他力劝城市要摧毁过时的一切。他甚至赞同苏联城市规划家拆除莫斯科多数历史建筑的举措，苏联在二战后建造的那些超大建筑群反映了他的观点。

他对纽约古老的棕色石头、市中心狭窄的街道和混合的建筑风格没有任何兴趣，就如同对克里姆林宫尖顶蒜头建筑不感兴趣的一样。对城市中大片租借公寓的肮脏、地铁里人流拥挤而造成的混乱，他感到惊骇。而曼哈顿大跨度的桥梁、高耸建筑的磅礴气势令他兴奋不已，他曾写道：“当黎明的曙光照在玻璃上时，摩天大楼如同美丽的烈焰。”

在他看来，纽约应该向更高的空中发展。柯勃彦想看到这样的城市：“玻璃幕墙的摩天大楼拔地而起，高耸入云，晶莹剔透，在繁茂的树木映衬下，显得更加清澈透亮。” 柯勃彦理想当中的纽约，应当是一座“梦幻般的、几乎是神秘的城市……一座挺拔高耸的城市，一个新时代的标志”。

虽然他希望欧洲重新在城市设计方面引领时代潮流，并将它们的文明建立的“宏伟庄严的成熟之上”，梅勒：前引书，第16、51页；李·科巴斯尔（Le Corbusier）：《明天的城市及其规划》（The City of Tomorrow and Its Planning），弗雷德里克·埃切尔斯（Frederick Etchells）译，马萨诸塞坎布里奇，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71，第1～7页；雷布琴斯基：前引书，第158～159页；李·科巴斯尔（Le Corbusier）：《幻想中的灾难》（The Fairy Catastrophe），选自《帝国城市：穿越世纪的纽约》，第611～613页。但对那些钟情于欧洲大陆19世纪的建筑风格的欧洲人而言，柯勃彦的城市理念没有多大的吸引力。斗转星移，他的部分想法不仅在美国，还在发展中国家的迅速发展的城市找到了知音，如在巴西、韩国、日本、中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国家的城市。

“伟大的成就”及其局限性

柯勃彦雄心勃勃的现代主义观点给美国的城市留下了深深的印记。1960～1972年，芝加哥中心的办公空间扩大了50%，而纽约的办公空间剧增74%，对城市高耸的建筑与天际背景勾勒出的轮廓，英国作家安姆瑞斯·琼斯曾这样描写：“其对比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有时候令人感到畏惧。”巍峨的塔楼也在其他城市，如波士顿、旧金山、休斯敦，甚至在洛杉矶耸立起来。琼斯：前引书，第99页。

世界首席现代建筑师之一的山崎建议说，恢弘的城市建筑折射了“我们这样一个规模巨大、成就超然的社会”。马里安纳·莫吉列维奇（Mariana Mogilevich）：《大而差的建筑》（Big Bad Building），选自《美国城市的未来》（The Next American City）；罗伯特·W·吉尔默（Robert W Gilmer）：《美国石油在城市的巩固：以休斯敦为例》（The Urban Consolidation of American Oil: The Case of Houston），美国联邦储备银行达拉斯、休斯敦分行，1998年6月6日。然而，这些混凝土与玻璃复合结构的“辉煌成就”要求现已存在的城市街区为此付出沉重大代价。由山崎设计并于1966～1977年兴建的命运多舛的世贸中心，不仅迫使周围原有的供电区里数千个小企业迁出，而且基本上把整个纽约西城与其他城区切割开来。罗伯特·费奇（Robert Fitch）：《纽约的暗

杀》（The Assassination of New York），伦敦，沃休出版社，1993，前言第6～9页。

显而易见，这种大规模的城区重建没能阻止人口与企业向郊区迁移。事实上，正如城市规划师简·雅各布指出的那样，它反而加速了向郊区的分散。在20世纪最后的几十年中，全国人口增长超过6000万人，而中心城市的人口停滞不前，有些甚至出现负增长。到1990年，甚至连纽约人似乎对其万人仰慕的地位也丧失了信心。大约10个人当中有6个向民意测验调查员反映，如果可能，他们将选择其他地方居住。威托尔德·雷布金斯基（Witold Rybczynski）、彼得·利纳曼（Peter Linneman）：《收缩中的城市》（Shrinking Cities），摘自《沃顿房地产评论》（Wharton Real Estate Review），1997年秋季号；威廉·科恩布拉姆（William Kornblum）：《包围中的纽约》（New York Under Siege），选自苏姗娜·麦格雷格（Susanne Macgregor）、阿瑟·利波（Arthur Lipow）主编《另一个城市：纽约及伦敦的人们与政治》（The Other City: People and Politics in New York and London），新泽西阿特兰蒂克海茨，休曼尼提斯出版社，1995，第37页；杰克·纽菲尔德（Jack Newfield），保罗·杜·布鲁（Paul Du Brul）：《权力的滥用：永久的政府和纽约的衰落》（The Abuse of Power: The Permanent Government and the Fall of New York），纽约，维京出版社，1977，第18～24页。

工业城市最后的烦恼

20世纪行将结束之际，在世界主要城市中，每两个城市出现人口增长，就会有三个城市出现人口流失。人口下降最严重的是历史悠久的工业城市，如圣路易斯、曼彻斯特、莱比锡等。一个世纪以前，它们引领着世界城市发展的新潮流。在有些城市中，不仅中心城市出现空心化，其周围区域随之衰落，而且城市原有的高度认同意识已消退到令人难以辨识的地步。凯特·斯托尔（Kate Stohr）：《收缩中的城市综合症》（Shrinking Cities Syndrome），摘自《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2004年2月5日出版；《伦敦恢复生机》（London Comes Back to Life），选自《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1996年11月9日出版。小说家乔纳森·弗莱泽写到他的家乡时问道：是什么让城市中活着

的人记不起逝者的年龄，并对他的去世没有遗憾？答案只有圣路易斯知晓。埃里克·桑德威斯（Eric Sandweiss）：《介绍》（Introduction），选自提姆·福克斯（Tim Fox）主编《我们住在哪里：圣路易斯社区指南》（Where We Live: A Guide to St Louis Communities），圣路易斯，密苏里历史协会出版社，1995，第2页。

美国其他强大的世界级制造业中心——纽瓦克、克利夫兰、圣路易和底特律——的个性，如果不是被来自纽约的城市形象与理念超过，就是被洛杉矶或硅谷这样的城市新贵所超越。虽然这些城市的郊区相对健康发展，但它们不能构成主要的城市中心。历史学家乔恩·蒂福德指出，中西部城市已被转变成了一个“文化的殖民地……如同不受人注意的衣衫褴褛的妇人，炫耀着她昨日拥有过的文化时装”。这些昔日引以为荣的、独树一帜的城市灯塔，随着斗转星移，“受到了来自有卫星城的大都市发出的强有力的挑战”。蒂福德：《心脏地带的城市》，第244、255页。

工业城市走向没落反映了一个世界范围的普遍现象。在日本，大阪、名古屋和其他以制造业为主的城市流失了最有天分的都市居民，丧失了许多有别于东京的城市特征。与其相似，曼彻斯特这样曾经的世界制造业巨擘，与拥有世界级的文化机构、全球广泛联系、商业广告代理云集的伦敦相比，逊色了许多。欧洲其他老工业中心，如都灵和杜塞尔多夫，也陷入停滞状态并走向衰落。安娜·塞格雷（Anna Segre）：《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都灵》（Turin in the 1980s），选自休·克劳特（Hugh Clout）主编《二十世纪晚期的欧洲城市》（Europe s Cities in Europe s Cities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乌得勒支，荷兰皇家地理学会，1994，第106页；冈特·格莱伯（Gunter Glebe），《杜塞尔多夫：经济的重新构建与人口变化》（Dusseldorf: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Demographic Transformation），选自《二十世纪晚期的欧洲城市》，第127页。

“普遍的渴望”

郊区在世界主要经济大国取得了胜利，也横扫了所有工业发达国家的每一个角落。与选择居住在拥挤的公寓大楼相比，更多的人似乎把他

们心中“更好的城市”定义为有更多的个人空间和隐私，甚至还要有一块私家草坪。著名的洛杉矶城市规划家意大利移民埃德加多·孔蒂尼解释说：

郊区住宅是每个移民的梦想，如同仆人想拥有自己的城堡一样的梦想。到这里来的欧洲人对郊区感到非常的兴奋。他们再也不要住在公寓里！拥有自己的住宅是所有人普遍的渴望。杰克·罗森塔尔（Jack Rosenthal）：《外部城市：美国郊区骚动概览》（The Outer City: An Overview of Suburban Turmoil in the United States），选自马苏迪与哈登，前引书，第269页。

阿根廷和澳大利亚

拥有私人住宅的“普遍的渴望”早期出现在阿根廷和澳大利亚的前殖民城市。这些国家土地资源富足，城市居民利用土地优势很快地迁居城市边缘。到1904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城市规模扩展的如此之大，以至于一位西班牙观察家评价说：“它简直不是一座城市，而是许多城市的连接组合。”在随后的整个20世纪，这种趋势没有减退。詹姆斯·R　斯科比（James R　Scobie）：《1870～1910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从广场到郊区》（Buenos Aires: Plaza to Suburb, 1870-1910），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4，第191页；查尔斯·S　萨金特（Charles S　Sargent）：《1870～1930年阿根廷大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空间演进》（The Spatial Evolution of Greater Buenos Aires, Argentina, 1870-1930），坦佩拉丁美洲研究中心，亚利桑那州立大学，1974，第123～125页。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澳大利亚。1930年以后，随着农村人口的骤然下降，澳大利亚大城市周围郊区的发展和美国郊区一样迅速，在墨尔本和悉尼，这种情况尤为明显。和美国一样，澳大利亚的知识分子总体上反对郊区化趋势，但人口照样被吸引到了文化相对滞后的地区。一位作家善意地写道，请“澳大利亚人呆在家里，和家人在一起”。杰弗里·博尔顿（Geoffrey　Bolton）：《牛津澳大利亚史：中间路线（1842～1968年）》（The Oxford History of Australia: The Middle Way），墨尔本，牛津大学出版社，1990，第121～124页。

英国和现代“花园城市”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摧毁之后，英国的城市规划人员有意识地寻求将伦敦市中心拥挤的工业及人口向郊区转移。1943年首次启动的阿伯克龙比计划，重点强调发展“新城”，城外绿地环绕，旨在扩展首都的周边面积。芒福德：《城市的前景》，第236页；哈透格：前引书，第103页。

这个计划只是部分地得到了执行，但随后的数十年里，随着汽车使用量的增长，伦敦向郊区迁移的速度和其他地方一样迅速加快。1980～2000年，英国人口增长虽不明显，但建设面积却增加了两倍以上。理查德·罗杰斯、理查德·伯德特（Richard Rogers and Richard Burdett）：《让我们把更多的东西添进城市》（Let s Cram More into the City），摘自《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2000年5月22日出版。可能最为明显的是，在2000年大约有70%仍然居住在城市中心的居民向调查者反映，他们更喜欢住在其他地方。帕特里克·科林森（Patrick Collinson）：《财产：减速意味着更稳定的市场》（Property: A Slowdown Will Mean a Steadier Market），摘自《卫报》（The Guardian），2000年10月28日出版；《大都市的音乐》（The Music of the Metroplis），摘自《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1997年8月2日出版。

伦敦这个头号国际化都市和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郊区化趋势最为突出。二战后，伦敦周围向不可能在城市中心拥有自己住宅的城市中产阶级，甚至工人阶级提供了住所。伦敦外城60%以上的居民拥有住房，是靠近城市中心人们拥有住房比例的两倍。埃姆里斯·琼斯（Emrys Jones）：《伦敦》（London），选自马太·多甘与约翰·D 卡萨达（Mattei Dogan and John D Kasarda）主编《大都市时代》第二卷《大型城市》（The Metropolis Eras, vol 2, The Megacities），加利福尼亚纽伯里公园，传奇出版社，1988，第105页。

寻找实现“普遍的渴望”改变了区域的基本地理状况。1960年以后，伦敦市中心人口开始流失，而整个地区，尤其城市周边人口增长十分明显。哈透格：前引书，第121页。就像H G 威尔斯一个世纪以前预言

的那样，英格兰南部的大部分，甚至是中部正在迅速地变成伦敦广阔而分散的郊区。以致像肯特郡和康沃尔郡这样的曾经距离遥远的农村地区，也异想天开地想成为伦敦的住房供应市场。并非所有到乡下的人都要每天通勤，有些人一周内通勤两到三次，而平时在家里或卫星城的办公室里工作。亨利·特里克斯（Henry Tricks）：《逃离城市》（Escape from the City），摘自《金融时报》（The Financial Times），2003年10月12日出版。

西欧的郊区化

尽管西欧的其他城市管理部门存在着强大的偏见，反对郊区发展和人口的低增长，但从这些城市也可以看出相似的城市人口分布模式。皮艾特罗·S 尼沃拉（Pietro S Nivola）：《风景的规则：政治如何塑造欧洲和美国的城市》（Laws of the Landscape: How Politics Shape Cities in Europe and America），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布鲁金斯出版社，1999，第27～28页；彼得·马库塞与罗纳德·范·肯彭（Peter Marcuse and Ronald van Kempen）：《结论：已改变的空间秩序》（Conclusion: A Changed Spatial Order），选自彼得·马库塞与罗纳德·范·肯彭主编《全球化中的城市：新的空间秩序？》（Globalizing Cities: A New Spatial Order? ），伦敦，布莱克威尔出版社，2000，第260页。20世纪80年代，马德里和杜塞尔多夫等城市人口下降，而这些城市的周边地区人口急剧膨胀。曼维尔·巴伦苏埃拉与阿纳·奥利维（Manuel Valenzuela and Ana Olivera）：《马德里首都城市与大都市区》（Madrid Capital City and Metropolitan Region），选自《二十世纪晚期的欧洲城市》，第57～59页；格莱伯：前引书，第126～132页。这种趋势在欧洲最大的经济强国德国非常流行。尽管德国的城市规划者对中心城市社区比较偏爱，但也无法阻挡郊区化势头。杰弗里·M 迪芬多夫（Jeffry M Diefendorf）：《美国对西欧的影响：跨大西洋视角中的美国化与西方化》（The American Impact on Western Europe: Americanization and Westernization in Transatlantic Perspective），德国历史学会会议，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1999年3月25日至27日。

在1970至1997年之间，德国的金融中心法兰克福中心城市人口下

降，而人口密度较低的城市郊区人口急剧膨胀，向外延伸了30到50英里。就业随之向郊区迁移，导致中心城市就业机会减少，郊区地区就业人数增加。汉堡的发展模式与此类似。哈透格：前引书，第110～116页。

英国和美国一样，人口外迁反映了拥有住房是“普遍的渴望”，这一梦想只有在城市周边新开发的住宅区得以实现。正如一位德国学者指出的那样，在郊区拥有住房并不是抛弃大都市，只是人们“向幸福生活”迈出了一步。《讨论》（Discussion），选自《城市史研究》（The Study of Urban History），前引书，第278页。

欧洲城市的隔都现象

对城市犯罪的恐惧等诸多负面因素，也开始加速了欧洲主要城市人口的分散。埃里·利尔（Eli Lehrer）：《逍遥法外》（Crime Without Punishment），摘自《标准周刊》（Weekly Standard），2002年5月27日出版。　在一些城市，这种不安全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移民涌入城市造成的，他们多数来自非洲和中东国家。这些新来者是20世纪50、60年代由于劳动力缺乏而招募来的劳工，其中大多数人留了下来，随着欧洲大陆经济的衰退，越来越多的人处于半失业或者失业状态。简·拉思（Jan Rath）：《族裔音乐主持人的游戏？阿姆斯特丹移民企业和小环境的延续》（A Game of Ethnic Musical Chairs? Immigrant Businesses and the Alleged Formation and Succession of Niches in the Amsterdam Economy），选自索菲·鲍狄-杰德特与马科·马蒂内欧（Sophie Body Gendrot and Marco Martiniello）主编《欧洲城市中的少数民族：社会融合与社会排斥的动力》（Minorities in European Cities: The Dynamics of Social integration and Social Exclusive at the Neighborhood Level），洪德密尔贝辛斯托克汉普郡，麦克米兰出版社，2000；《欧盟需要外国劳工但憎恨他们的成功》（E U Needs Foreign Workers but Resents Their Success），摘《印度人》（The Hindu），2001年8月3日出版；《犯罪与政治》（Crime and Politics），摘自《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2002年3月18日出版。

在许多地方，移民人口占当地人口的30%到40%，如鹿特丹和阿姆

斯特丹。长期以来，这些城市地区非常平静，而现在这些移民的怨恨与日俱增，有时带有暴力成分。荷兰的埃德伍德·博默夫（Eduourd Bomhoff）和奈伯（Nyber）提供的一份研究报告；詹尼弗·埃里克（Jennifer Ehrlich）：《慷慨的荷兰对移民似乎不那么慷慨》（Liberal Netherlands Becomes Less So on Immigration），摘自《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2003年12月19日出版；菲利普·里斯（Phillip Rees）、埃弗特·范·英霍夫（Evert van Imhoff）、海伦·德拉姆（Helen Durham）、马奇·库匹泽斯基（Marek Kupiszewski）、戴伦·史密斯（Darren Smith）：《欧洲国内移民与地区性的人口动力学：对荷兰的个案研究》（Internal Migration and Regional Population Dynamics in Europe: Netherlands Case Study），欧洲议会，1998年8月出版。越来越多的外来移民聚集中心城市，他们成为城市中心的主要居民，而许多土生土长的荷兰人开始向城市周边开发的富裕郊区迁移。简·霍尔茨·凯（Jane Holtz Kay）：《在荷兰美国式城市扩张的压力》（In Holland, the Pressures of American Style Urban Sprawl），摘自《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2002年10月3日出版。类似人口分布模式同样发生在邻近的城市布鲁塞尔。克里斯琴·凯斯里特（Christian Kestletoot）：《布鲁塞尔：后福特时代中福特空间背景中的两极分化》（Brussels: Post Fordist Polarization in a Fordist Spatial Canvas），选自《全球化城市》，前引书，第186～210页。

甚至在巴黎

甚至在巴黎这个长期以来的城市集中化的堡垒，也开始出现了人口向外迁移的现象。尽管人们认为巴黎人“偏好”居住在人口稠密的地方，但许多巴黎居民也似乎像美国人一样，渴望郊区的生活方式。整个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产阶级家庭和就业岗位一道迁离城市中心，跨过更为贫困的靠近城市中心的移民聚集的郊区，迁到首都最边缘的“大花园地带”。马蒂内·伯杰（Martine Berger）：《生活空间的道路，就业与住房设备：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巴黎的大都市为例》（Trajectories in Living Space, Employment and Housing Stock: The Example of the Parisian Metropolis in the 1980s and 1990s），摘自《国际城市与地区研究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1996年，第

240～254页；菲埃罗：前引书，第19页；琼·罗伯特（Jean Robert）：《巴黎和拉得方斯新区：国家的首都，世界的城市》（Paris and the Ile de France: National Capital, World City），选自《二十世纪晚期的欧洲城市》，第17～22页。

日本的“花园城市”

二战之前，日本的城市规划人员被英国“花园城市”理念所吸引，虽然他们开发“花园城市”的努力由于二战时经济的需求半途而废。二战后，随着经济的复苏，城市郊区地价便宜，可供开发的空间易于得到，城市居民、部分企业向城市周边地区迁移的趋势凸显。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第二大城市大阪的人口开始流失，周边社区的人口迅速增长。小型重工业城市人口外流现象非常严重，这些城市的经历同欧洲和北美的同类城市如出一辙。安德烈·索伦森（Andre Sorensen）：《次中心区和卫星城市：东京二十世纪规划多中心主义的经历》（Subcentres and Satellite Cities: Tokyo s 20th Century Experience of Planned Polycentrism），选自《国际规划研究》（International Planning Study）第1期，第6页（2001年9月）；莫里斯：前引书，第263～264页。

20世纪70年代，东京这个发达国家中最大都市向外扩展的势头强劲。第一步是修建新宿、涩谷和池袋等新的城市次中心，以缓解原有核心区的压力。起初这些大规模开发是依照石川秀明的基本规划进行的，其城市分散理念也是在首都周围创建绿色环绕带。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次中心发展成为繁华都市的一部分，这里有许多日本最高的建筑，像阳光塔、东京都厅等。爱德华·塞登斯蒂克（Edward Seidensticker）：《上升中的东京：大地震以来的城市》（Tokyo Rising: The City Since the Great Earthquake），纽约，诺普夫出版社，1990，第290～303页。在远离城市中心的边缘地带开发更多的绿色环绕带的计划没能成功。如同洛杉矶的奥姆斯特德规划一样，石川秀明的“花园城市”宏伟计划成为了经济私利和土地拥有者的政治权利的牺牲品。卡罗拉·海因：前引书，第309～342页。

东京城市中心地价日益飞涨，促使城市大规模向外扩展。到了20世

纪70年代，中产阶级梦想拥有自己的住房，甚至是拥有只能放一张床位的公寓的想法也难以实现。为了能买得起住房，1970～1995年，有将近1000万人不得不居住在环绕中心城市的关东平原的郊区。索伦森：前引书；希尔与藤田：前引书，第11页；塞登斯蒂克：前引书，第336～337页。

第十七章　“远东的皇后”

以绝对数字计算，亚洲在20世纪后半期经历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人口迁移。《2001年世界各国人口状况》（State of the World s Population,2001）。与中东、拉美大部分地区和非洲的城市发展相比，亚洲的都市发展大体上更多发生在具有悠久历史的地带。这些城市不仅有数量上的进展，而且经济增长显著。与此同时，政治和社会秩序也常常经历了更大程度的变化。

许多城市真正地实现了像一位19世纪的殖民者称作的“远东的皇后”的期盼，而非后殖民时代统治的窘境。C M 特布尔（C M Turnbull）：《新加坡的历史（1819～1875年）》（A History of Singapore: 1819-1875），古拉鲁普，牛津大学出版社，1977，第1～45页。当然，这种乐观的图景并不普遍。在新千年即将拉开序幕之际，卡拉奇1000万人口中将近40%的人居仍居留在非法占地的居住区。政治动荡，尤其是反西方和反现代的伊斯兰运动的发展，减缓了巴基斯坦城市成功地加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沙马：《管理我们的城市》；多纳德·N 威尔伯（Donald N Wilber）：《巴基斯坦：人民、社会与文化》（Pakistan: Its People, Its Society and Its Culture），纽黑文，HRAF出版社,1980，第373页；安东尼·金（Anthony King）：《殖民地都市化进程：文化、社会力量与环境》（Colonial Urban Development: Culture, Social Power and Environment），伦敦，鲁特雷奇与克甘保罗出版社，1976，第273页；库马：前引书，第520页。

亚洲其他的主要城市——雅加达、曼谷和马尼拉——已经饱受了政治动乱的苦难。多数城市的经济发展了，但经常难以支撑它们自身增长的人口。虽然不及非洲和近东城市贫困人口之众，但这些城市的多半居民依然非常贫困。

印度的城市革命

20 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印度重新成为全球都市生活的主要中心。与圣雄甘地倡导的以乡村为中心的国家理念相反，印度的经济体系从以

农村和农业为主转变为以工业化（甚至是后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主。受国家带头投资制造业和现代基础设施的刺激，1950～1995年，印度城市在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翻了两番还要多。尼格尔·哈里斯（Nigel Harris）：《城市、阶级与贸易：第三世界社会与经济的变革》（City, Class and Trade: Social and Economic Change in the Third World），伦敦，I B Tauris出版公司，1991，第30页；巴内特·E 鲁宾（Barnett E Rubin）：《通往东方之路：印度的工业化与中国的经验》（Journey to the East: Industrialization in India and the Chinese Experience），选自底里普·K 巴素与理查德·西珊（Dilip K Basu and Richard Sisson）编《重新评估印度社会与经济的发展》（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India: A Reassessment），新德里，塞奇出版社，1986，第69页。印度改革了过去一直抑制企业投资的准社会主义体制，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城市的发展。

新的城市发展多数并没有集中在老殖民中心加尔各答，而是发生在首都新德里和另一个帝国主义的主要殖民据点孟买（1995年孟买由英语习惯拼写Bombay改为规范罗马拼写Mumbai）。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发展相比，孟买的城市发展前景可谓差强人意。在整个工业体系中，孟买的金融服务、制造业和娱乐业已经居主导地位。孟买计划到2015年成为仅次于东京的世界第二大城市。20世纪90年代末，孟买努力建设诸如“新城市”之类的新的发展极点，有助于吸引日益扩大的中产阶级。《丰富的空间，更少的占有者》（Plenty of Space, Few Takers），摘自《商务干线》（Businessline），1999年5月24日出版；杰奎明：前引书，第275～277页。

更重要的是，大量接受过教育、技术熟练的工人构成了印度大都市区发展至关重要的优势。到2000年，印度软件工程师约占全世界总数的30%。在像班加罗尔这样规模较小的印度城市，这种优势尤为明显。沙马：《管理我们的城市》；艾瑟·贾奇·阿鲁瓦里亚（Isher Judge Ahluwalia）:《印度的工业化发展：60年代中期后的停滞》（Industrial Growth in India: Stagnation Since the Mid Sixties），德里，牛津大学出版社，1985，第161～187页。

到了80年代，班加罗尔成为印度发展最快的城市。1960年，其人口还不足100万人，到20世纪末猛增到450万人。该城市拥有900多家软件公司，被普遍视为印度的“硅谷”。它的发展大体上是其美国原型的翻版——这里城市蔓延扩散，汽车成为生活的中心，拥有大量的自主发展的、以研发为主的工业园区。阿里·撒拉夫、莱斯利·格林（Ali Sharaf and Leslie Green）：《加尔各答》（Calcutta），选自威廉·A 罗宾森与D E 里根（William A Robson and D E Regan）编《世界上伟大的城市：他们的政府，政治与规划》（Great Cities of the World: Their Government, Politics and Planning），加利福尼亚贝弗利，塞奇出版社，1972，第299页；蒂姆·麦克唐纳（Tim McDonald）：《美国技术不再眷顾亚洲》（U S Tech Bust a Boon for Asia），《新闻代理人网络》（News Factor Network），2001年6月7日；阿文德·辛格哈尔与埃弗雷特·M 罗杰斯（Arvind Singhal and Everett M Rogers）：《印度的信息革命》（India s Information Revolution），新德里，塞奇出版社，1989，第163～165页。

紧随其后的是印度其他城市，如海得拉巴，它建成了有利于先进工业发展的新的办公园区、科研机构、高速公路和飞机场。90年代末，海得拉巴所在的安得拉邦拥有1 5万名软件开发工人，软件专家的人数增加了26倍。

随着全球人才需求的扩大，技术与服务业甚至开始扩展到加尔各答这样的落后的巨型城市。凯莉·艾斯琛（Kyle Eischen）：《印度的高科技奇迹让抽象变为现实》（India s High Tech Marvel Makes Abstract Real），摘自《圣琼斯墨丘利新闻》（San Jose Mercury News），2000年5月19日；乔安娜·斯拉特：《购物中心技术性工作的流入把现代性带给加尔各答》（Influx of Tech Jobs Ushers in Malls, Modernity to Calcutte），摘自《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2004年4月28日出版。这并没有结束后来被更名为Kolkata的加尔各答印度政府于2000年12月23日将加尔各答的英语习惯拼写Calcutt改为规范罗马拼写Kolkata。译者注。和印度其他城市的贫困状况。即使在经济最具活力的中心，大量没有工作和极度贫困的工人为了赚得可怜的工资而辛勤地工作，其中包括数百万的童工。与此同时，这些城市的中产阶级日益壮

大。卡斯特斯：前引书，第151～155页；艾米·沃尔德曼（Amy Waldman）：《印度经济的快速增长中缺乏低技术和高技术工作》（Low Tech or High, Jobs Are Scarce in India s Boom），摘自《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2004年5月6日出版。

*东亚打破了旧有模式

毫无疑问，亚洲的远东城市发展最引人注目，其中不少城市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中国丰富城市文化的影响。早在印度城市经济表现出成熟迹象之前，亚洲城市追随大阪和东京早期走过的路，利用经济的快速发展所取得的成果为城市扩展提供经济支持。

20世纪60年代，大多数亚洲城市被看成像开罗、拉各斯或加尔各答一样，是没有明显特征的、贫困的“发展中世界”的一部分。到20 世纪末，汉城、台北、新加坡和香港的发展令人刮目相看。如同腓尼基和古希腊充满活力的贸易城邦或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的现代亚洲版，这些城市驰骋于世界舞台，寻找可以征服的新工业和新市场。彼得·约翰·马克托里欧（Peter John Marcotullio）：《亚太地区城市的全球化，城市构成和环境条件》（Globalization, Urban Form and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in Asia Pacific Cities），摘自《城市研究》（Urban Studies）2003年第2号。

汉城的崛起

直到1876年，汉城依然是朝鲜“隐士王国”的首都，它几乎全然与其他经济大国断绝联系。它只是在日本商业利益的强烈刺激之下，迫于外界压力向世界敞开大门。20 世纪初，日本彻底占领朝鲜。在日本的残暴统治之下，汉城屈尊于大阪和东京之下，如同孟买和加尔各答屈从于伦敦、伯明翰和利物浦那样。日本像印度和其他地方的欧洲殖民者一样，促使汉城从一个古老的帝国首都转变成为一个拥有制造业、有轨电车和专业人士阶层日增的现代化城市。

1945年日本战败之后，汉城获得了独立，成为了大韩民国的首都和最主要的城市。5年之后，共产党控制的北朝鲜发动突然袭击，摧毁了

这座城市。在随后长达3年的对抗中，这座城市和它的郊区成为了联合国军和共产主义力量交战的主要战场。

韩国的首都从战争的创伤——47%的建筑被摧毁——和极度贫困中东山再起。同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城市一样，来自农村的移民的涌入使汉城人口迅速膨胀；20世纪60、70年代，每年大约有超过30万人迁移到这座大部分依然是废墟的首都城市。

随着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汉城的人口增长毫不逊色于开罗、圣保罗、孟买和其他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的城市。1960年，这座城市的人口为300万人，到2000年，城市人口超过1100万人，这还不包括居住在大都市区周围的900多万人口。金珠春、崔相哲（Joochul Kim and Sang Chuel Choe）：《汉城：大都市的形成》（Seoul:The Making of a Metropolis），英国西萨塞克斯，约翰威利出版社，1997，第3、8～11页。

最初，汉城也同样反映了城市发展所带来的并不陌生的负面影响——摇摇欲坠的非法占地者居住区、永远超负荷的交通、不合格的卫生和健康设施。杰奎明：前引书，第35页：A S 欧伯罗伊（A S Oberoi）：《第三世界百万人口城市人口增长、就业与贫困的分析与政策问题》（Population Growth, Employment and Poverty in Third World Mega Cities: Analytical and Policy Issues），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93，第11页；金珠春、崔相哲：前引书，第11～12、26～29、191～192页。最大的不同是，汉城的经济发展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都要快。

汉城财富的增长为其快速膨胀的人口所带来的诸多挑战提供了资金支持。新公路、新住房、办公大楼和研究园区出现在整个地区。为了给城市中心区域的发展鸣锣开道，汉城在60年代拆除了蔓延的非法占地者居住区。为了准备1988年奥运会，它在80年代又拆除了一部分同样的非法居住区。虽然有许多人流离失所，贫困问题还是得到了有效的遏制。哈道伊：《在永恒危机中建造与管理城市》，第21页。联合国的一项研究表明，到了1988年，汉城只有14%的人口居住在贫民窟，贫困人口只相当于开罗的1/6。艾尔-萨克斯、阿米拉马地：前引书，第240页；杰奎

明：前引书，第35页。

此时，韩国首都与拥挤、交通不畅、物价昂贵的东京和现代西方城市更为相似，与中东和非洲贫困的城市中心差别较大。汉城对韩国经济的影响胜过东京对日本经济的影响；汉城是全国50家最大企业当中48家的公司总部、主要政府机构和许多外国公司总部所在地。理查德·蔡尔德·希尔（Richard Child Hill）、金俊宇（June Woo Kim）：《全球性城市与发展状况：纽约、东京与汉城》（Global Cities and Development State: New York, Tokyo and Seoul），摘自《城市研究》（Urban Studies），2000年第12期第37页。同法兰克福和大阪等传统商业中心一样，汉城也成为了许多大型公司的大本营。约翰·瑞尼·肖特（John Rennie Short）、金永勋（Yeong Hyun Kim）：《全球化与城市》（Globalization and the City），伦敦，朗文出版社，1999，第26、57页。鉴于汉城对经济有如此强大的辐射作用，因此，有人建议到21世纪初将韩国首都迁移到南部的农村地区。巴巴拉·戴米克（Barbara Demick）：《韩国计划迁都》（South Korea Proposes a Capital Change），摘自《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2004年7月9日出版。

英国的成功后裔

汉城的崛起部分的代表了东亚城市在20世纪后半期广泛出现的一个引人注目的发展模式。在现代城市历史中，此事件源起于新加坡和香港这两个商业城市的演变，它们是大英帝国权威和经济实力培育下的产物。

香港在1841年被完全割让给英国。在英国的帮助下，这个新出现的欧洲城市的“缩影”，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南部最主要的贸易港口。香港逐渐地培育了强大的中国经济文化，不久之后，这种文化很快传播到了整个东亚地区。这个融会了中国和欧洲双重影响的新型城市社会发展迅速，人口从20世纪初的仅仅几千人猛增到1937年的100多万人。

10年之后，共产主义革命迟滞了中国大陆的经济中心的发展。香港自立自强，成为仅次于东京的亚洲第二大经济首都。随着毛泽东时代大

陆移民涌入香港，到20世纪80年代，香港的人口增长了3倍还要多。香港的崛起不仅依靠激增的人口，还得益于来自整个大陆的企业家和专业人才，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来自上海的金融界和产业界精英人士。杰拉德·瑟加（Gerald Segal）：《香港的命运》（The Fate of Hong Kong），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93，第1～27页；小罗伊·霍夫海因茨、肯特·E 考尔德（Roy Hofheinz, Jr and Kent E Calder）：《东亚的边缘》（The East Asia Edge），纽约，基本出版社，1982，第103页。

新加坡：亚洲的模范城市

新加坡是1819年由斯坦福·拉弗尔斯爵士创建的一个帝国贸易据点，到1867年，它发展成为英国的一个成熟的殖民地。由于远距中国大陆南部，这座城市吸引了大批的中国移民。为数众多的印度人、马来人、阿拉伯人、犹太人以及殖民地代表使新加坡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国际性大都会，它不仅与伦敦，也和巴格达、雅加达、广州和上海都有联系。新加坡被约瑟夫·康拉德约瑟夫·康拉德（1857～1924），英国著名小说家。译者注。形容为“喧闹而有生机”的城市，到处是商人、船员，主要是来自中国的工人阶层。特布尔：前引书，第1～45页；潘翎（Lynn Pan）：《黄色帝国之子：中国人向国外散居的历史》（Son of the Yellow Emperor: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Diaspora），波士顿，小布朗出版社，1990，第110页。

二战期间日本的占领使这个殖民地社会遭受了严重的破坏。英国受到亚洲强国日本的羞辱，失去了至高无上的霸主地位。在日益增长的要求独立的压力之下，英国于1965年最终离开了这个古老的殖民地城市。

起初，这个只有225平方英里的狭小共和国的前景令人担忧。这座城市遇到了所有发展中国家遇到的问题——巨大而拥挤的贫民窟、黑社会帮派和技术水平较低的人口。同时，新加坡还要面对人口更多的穆斯林邻国马来西亚的敌意，她就是从该国独立出来的。

新加坡的巨大成就是后殖民世界罕见的。它没有利用自己新的国家主权为少数腐败精英服务，而是谱写了发生在20世纪后半期一个令人难

以置信的成功的城市神话。在接受过牛津大学教育的李光耀的威权主义领导下，新加坡彻底告别了殖民主义的过去，打造了一个亚洲城市发展的新的模式。有规划的公寓大楼替代了廉价的公寓和低矮的商店；现代的公路体系和先进的地铁系统取代了堵塞的街道；一度猖獗的犯罪活动几乎销声匿迹。

同汉城和香港一样，大规模的经济增长是城市成功的关键。李光耀和他的政府兢兢业业，充分利用了新加坡作为跨亚洲贸易的港口和交通枢纽的天然优势。新加坡迅速地完成了从纺织这样的低薪工业向高科技和服务业的转型，到20世纪末，新加坡自称是世界上人口受教育程度最高、经济生产力最强的国家之一。虽然阶级分野依然存在，但绝大多数人口现在已经达到了其他后殖民世界城市难以想象的生活水平和富裕程度。1964年新加坡人均年收入水平仅有800美元，到1999年则超过了2 3万美元。珍妮特·W 萨拉夫（Janet W Salaff）：《新加坡国家与家庭：重新构建一个发展的社会》（State and Family in Singapore: Restructuring a Developing Society），纽约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8，第3、226～227页；林崇椰（Lim Chong Yah）：《新加坡25年来转型一瞥》（The Transformation of Singapore in Twenty five Years: A Glimpse），选自杨宝森与林崇椰编（You Poh Seng and Lim Chong Yah）《新加坡：25年的发展》（Singapore: Twenty five Years of Development），新加坡，南洋星洲联合早报，1984，第6～7页；黄玉玲（Giok Ling Ooi）：《国家在新加坡自然保护中的角色》（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Nature Conservation in Singapore），摘自《社会与自然资源》（Society and Nature Resources），2002年第15期，第445～460页。

新加坡人口的教育程度、说英语的中产阶级、廉洁的政府和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吸引了大批的跨国集团公司到这里投资。李光耀不仅仅对提高城市国家的短期经济前景感兴趣，他还要建设一个新的亚洲都市文化，使其在21世纪同样具有全球竞争能力。他的一个部长宣称：“我们给了市民一个环境整洁的城市、现代的生活福利设施和强大的经济。现在，我们所想的是给予他们一种什么样的文化。”T J S 乔治（T J S George）：《李光耀的新加坡》（Lee Kuan Yew s Singapore），新加坡，东部大学出版社，1984，第109页。

儒家思想的复兴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李光耀已经决定要给予他的人民何种的“文化类型”——一种建立在亚洲、尤其是中国的价值体系基础之上的城市文化。李光耀自称为亲英派，并且曾经暗示说他的中国情结并不比美国总统肯尼迪的爱尔兰情结更深。现在他却提倡一种基本的儒家文化精神，其根基在于对睿智而强大的知识界精英的权威的尊重。他说如果没有这种文化，新加坡将会很快地退化成他所苛刻地称之为“另一个第三世界社会”。潘翎：前引书，第264～265页；乔治：前引书，第16页。

儒家精神的复兴，不仅逐渐影响了新加坡的思维模式，而且对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人为主导的台湾经济乃至香港产生了影响。乔治：前引书，第16、109页。儒家思想的“集体主义”与西方以及传统的个人和家庭进步的观念结合起来，提供了一种道德秩序和集体意志的意识，此状况在其他发展中世界的许多地方是不明显的。

到20世纪80年代，长期以来对有资本主义思维观念的海外同胞持蔑视态度的中共领导人，甚至也转而支持这种观念。1992年，中国杰出的领导人邓小平公开表示了对新加坡“社会秩序”的羡慕，支持这个城市国家领导人对待资本主义的方式，认为它就是中国城市迅速发展的最佳蓝图。乔治：前引书，第28页；戴维·S G 古德曼（David S G Goodman）：《邓小平与中国革命：一份政治传记》（Deng Xiaopi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 Political Biography），伦敦，鲁特雷奇出版社，1994，第120页；霍伊曼·陈与兰司·P L 李（Hoiman Chan and Rance P L Lee）：《香港家庭：处在现代主义与传统主义的十字路口》（Hong Kong Families: At the Crossroad of Modernism and Traditionalism），摘自《比较家庭研究》（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mily Studies），1996年春季号；马克托里欧：《全球化》；卡斯特斯：前引书，第292页；杜维明（Weiming Tu）：《超越启蒙心态：对伦理、移民和全球性工作的儒家解读》（Beyond Enlightenment Mentality: A Confucian Perspective on Ethics, Migration and Global Stewardship），选自《国际移民评论》（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1996年春季号。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城市

在中国共产党革命胜利后的早期，有这种想法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中共取得政权主要依靠农民的支持。国民党这个被打败的对手的强大后盾则是沿海城市和那里的大都市精英。罗兹·墨菲：《作为变革中心的城市：西欧与中国》（The City as a Centre of Change: Western Europe and China），选自D J 道伊尔（D J Dwyer）编《第三世界的城市》（The City in the Third World），纽约，巴恩斯与诺伯书屋，1974，第62～63页。

1949年取得大陆统治权之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谋求改变国家的发展模式，发展的重点由“腐败”的沿海商业中心城市转向农村和内陆城镇。他想通过限制人口迁移，有意识地遏制大城市的发展。在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共产党定期把大批的城市青年“下放”到农村去接受农村教育，为社会主义大发展计划提供劳动力。

结果，与东亚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速度缓慢。在香港、孟买、墨西哥等城市人口快速增加之时，中国许多原有的商业中心，如广州、天津和上海，人口增长幅度有限。与之相反，北京这个共产党的权力中心的人口持续增长，从1953年到1970年，北京增加的人口是上海的两倍。

在毛泽东时代的所有城市，许多传统的城市生活被压制。古老的寺庙不是被荒置就是被捣毁。公共市场是千百年来中国城市重要的组成部分，受到了限制。虽然犯罪、卖淫嫖娼、公开的贪污腐败等行为基本上绝迹，但曾经“喧闹而有生机”的中国商业城市都变成了单调乏味的地方。吉尔伯特、古格勒：前引书，第187页；杜维明：《超越启蒙心态》；杨汝万（Yue Man Yeung）：《东亚的大城市》（Great Cities of Eastern Asia），选自《大都市时代》第一卷《大城市林立的世界》，第158页；马丁·金·怀特（Martin King Whyte）：《都市中国的社会控制与复原》（Social Control and Rehabilitation in Urban China），选自《第三世界的都市化》，第264～270页；西德尼·戈尔茨坦（Sidney

Goldstein）：《中国的城市化水平》（Levels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选自《大都市时代》第一卷《大城市林立的世界》，第200～221页；陈祥明:前引书，第230～232页；黛博拉·戴维斯（Deborah Davis）：《1949年以来中国大都市的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Metropolitan China Since 1949），选自《发展中世界的城市》，第247～252页。

四个现代化与中国城市的复兴

自1976年毛泽东去世以后，中国城市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在邓小平“四个现代化”的指引下，北京逐渐放松了对城市的严格管制。地方官员开始鼓励私人的积极性和外来投资。创建经济特区，例如在香港和广州之间的深圳，吸引了巨额的外国资金，这些资金多数来自香港、台北和新加坡。在15年的时间里，珠三角地区变成了像19世纪中期英国的中部地区那样，不仅成为“中国的工厂”，也很快发展成世界工厂。詹姆斯·金奇（James Kynge）：《工业化水电站在滨水地区蓬勃发展》（An Industrial Powerhouse Emerges by the Waterfront），摘自《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2003年1月23日出版。

可以确定地说，中国城市成为国民生活的中心，这在中国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是没有过的。由于对人口的流动和寻找新的机会取消了严格管制，数以千万计的农村人口如潮水一般涌向了城市。

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城市的街道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塞满自行车的街道，如今到处是汽车。新的现代化办公大楼、酒店和高耸的公寓大楼使街道两侧斯大林风格的国有老建筑变得如此的矮小。公共市场重见天日，为不断增多的富裕群众提供品种日益繁多的肉类、蔬菜和水果。

上海的复兴

毛泽东时期一直受到扼杀的大都市文化又一次回到了城市，尤其是沿海城市。戴维斯：前引书，第294～254页；《中国能否保持中心地位？》（China: Can the Centre Hold），摘自《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1993年11月6日出版；林友素（Lin You Su）：《简介》（Introduction），选自加文·W 琼斯与普拉唯·维萨瑞亚（Gavin W Jones and Pravin Visaria）编《发展中大国的城市化：中国，印度尼西亚，巴西与印度》（Urbanization in Large Developing Countries: China, Indonesia, Brazil and India），英国牛津，克莱尔登出版社，1997，第26～44页；杜文彬（Ben Dolven）：《中国城市的经济吸引力在增长》（Economic Lure of China s Cities Grows），摘自《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2003年2月26日出版。这一现象在古老的殖民地要塞上海尤为突出，它逐渐对香港和东京的亚洲首要经济中心和外国投资场所的地位提出挑战。

上海也启动了世界上最具雄心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项目，包括新的地铁系统和飞机场改造。跨越上海黄浦江最大的建设项目浦东新区于1990年动工；10 年之内，一座崭新的城市拔地而起，并配备了绿化带、豪华酒店、140多层高的办公大楼、平整的公路、现代化的轮渡终点站、地铁和地下人行隧道。《香港的衰落》（The Decline of Hong Kong），摘自《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2003年7月1日出版；《上海：2004》（Shanghai:2004），摘自《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2004年1月15日出版；沙希德·尤素夫与吴卫平（Shahid Yusuf and Weiping Wu）：《通往世界城市的道路：上海在全球化时代中崛起》（Pathways to a World City: Shanghai Rising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选自《城市研究》（Urban Studies），2002年第7期，第39页；赵宾（Zhao Bin）、竹村延和（Nobukazu Nakahoshi）、陈家宽（Chen Jia Kuan）、孔龄易（Kong Ling yi）：《中国上海浦东的土地使用与保护的城市规划》（The Impact of Urban Planning on Land Use and Land Cover in Pudong of Shanghai, China），摘自《环境科学》（Journal of Environment Sciences），2003年第2期，第15页。

中国城市的迅速崛起同时也带来了与快速发展相伴生的许多新的挑战。数百万的流动劳动力——“流动人口”——重蹈贫困的兰开夏农夫、爱尔兰农民和欧洲移民在芝加哥或纽约的覆辙。他们住进了拥挤狭小的公寓，却要支付高昂的房费。百万计的中国城市居民不得不在肮脏、危险和常常不安全的地方工作。卖淫嫖娼、赤裸裸的贪污腐败、小偷小摸

和其他旧中国时期滋生的“邪恶”返回到城市，严重程度有时令人吃惊。戴维·拉格（David Lague）：《中国最重要的群众运动》（China s Most Critical Mass Movement），摘自《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2003年1月8日出版；戴维·墨菲（David Murphey）：《中国盛宴的被遗弃者：百万下岗工人正变得愤怒》（Outcasts from China s Feast: Millions of Laid Off Workers Are Getting Angry），摘自《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2002年11月6日出版；《中国上海文化种类的性别》（Sex of a Culture Sort in Shanghai, China），摘自《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2002年7月13日出版；尤金·林登（Eugene Linden）：《发展中世界城市的爆炸性发展》（The Exploding Cities of the Developing World），摘自《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1996年1月出版；戴维·克拉克（David Clark）：《城市化的世界，全球化城市》（Urban World/Global City），伦敦，鲁特里奇出版社，1996，第175页。

郊区出现在东亚

尽管所有这些与过去的老工业城市颇为相似，亚洲中心城市的崛起主要是城市分散时代的产物。不像欧洲或北美那些高度集中的城市中心，这些地区是在汽车、电子通讯和工业技术圈定了城市地理轮廓的时代里发展。

随着高楼大厦在上海、香港和汉城的拔地而起，城市向外扩展的压力越来越大。东亚一些城市日益增多的中产阶级对纽约或东京快节奏的城市生活青睐有加，许多城市新住宅、工厂和购物商城搬迁到了城市郊区。这一现象在亚洲的其他城市如雅加达、吉隆坡、曼谷和马尼拉都能看到，这些城市优雅的郊区吸引着富裕的城市居民和工业企业。哈里斯：前引书，第73页；马宾：《南部都市化进程中的郊区与种族隔离》；杨汝万：前引书，第158、181页；马克托里欧：《全球化》，第219～247页。

许多在新的办公园区、工厂和科研机构工作的人，期盼着移居到舒适的和快速蔓延、依赖汽车的郊区社区，有时候人们会把这些社区误认为是人口密度比洛杉矶或圣何塞更为密集的郊区的翻版。伊利斯贝丝·

罗森塔尔（Elisbeth Rosenthal）：《北京北部，加利福尼亚的梦实现了》（North of Beijing, California Dreams Come True），摘自《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2003年2月3日出版；《上海计划大规模的郊区发展》（Shanghai Plans Massive Surburban Development），摘自《人民日报》（People s Daily），2003年5月18日出版。这些亚洲城市居民像西方城市居民那样，发现他们的“更好的城市”出现在城市正在扩展的众多类似岛屿的郊区。托马斯·坎贝拉（Thomas Campenella）：《让100个住宅小区茁壮成长》（Let a Hundred Subdivisions Bloom），摘自《大都市》（Metropolis），1998年5月出版；马宾：《南部都市化进程中的郊区与种族隔离》；诺顿·金斯伯格（Norton Ginsburg）：《未来亚洲城市的规划》（Planning the Future of the Asian City），选自《作为亚洲变革中心的城市》，第277页。

巨型城市的危机

发展中国家的巨型城市尚处在不断扩展的进程中，更能感受到这些强烈的变化。过去，城市的规模有助于使城市成为内陆腹地的经济主导，而今天，大多数人口密集的巨型城市，如墨西哥城、开罗、拉各斯、孟买、加尔各答、圣保罗、雅加达、马尼拉等，其规模与其说是城市的优势，毋宁说是城市的负担。　　艾尔-萨克斯、阿米拉马地：前引书，第237页；萨利·E　芬德里（Sally　E　Findley）：《第三世界城市：发展政策与观点》（The Third World City: Development Policy and Issues），选自《第三世界城市》（Third World Cities），第7、11页；《2001年世界各国人口状况》（The State of the World s Population,2001）；哈里斯：前引书，第49页。

在一些地方，这些城市巨无霸已经输给了规模较小、管理更好以及社会包袱较小的新开发的区域。在东亚，21世纪城市化重要的摇篮新加坡，广义上也包括吉隆坡，已经比人口众多的曼谷、雅加达和马尼拉更成功地融入到全球一体化之中。阿里·巴萨（Ali　Parsa）、瑞敏·凯法尼（Ramin　Keivani）、卢李新（Loo　Lee　Sin）、王索恩（Seow　Eng Ong）、阿希德·艾加威（Asheed (接下页注)

同样，如一位观察家指出的那样，接第254页注③）Agarwai）、巴瑟姆·尤内斯（Bassem　Younes）：《全球化城市的兴起：新加坡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比较》（Emerging Global Cities: Comparison of Singapore and the Cities of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伦敦，RICS（The Royal Institution of Chartered Surveyors）基金会，2003；苏龙·穆罕默德（Sulong Mohammad）：《马来西亚的地区发展规划中作为都市化策略的新城镇》（The New Town as an Urbanization Strategy in Malaysia s Regional Development Planning），载于罗伯特·B　普特与亚丁诺拉·T　萨劳（Robert B　Putter and Adenola T　Salau）《第三世界城市和发展》（Cities and the Development in the Third World），伦敦，曼塞尔出版社，1970，第127～128页。膨胀的城市规模“削弱了墨西哥城的经济威力”。坎德尔：前引书，第187页。该首都由于受到犯罪、交通堵塞、

人口压力的困扰，企业家们和有抱负的工人们常常避开这个城市而到发展迅速、管理有方的城市如瓜达拉哈拉和蒙特雷，或者穿过边界到其他城市区域定居或发展。费尔巴克：前引书，第627页；苏茨曼：前引书，第5页；乔治·马丁、克雷里奥·坎伯林娜·迪尼茨（George Martine and Clelio Campolina Diniz）：《发展中大国的都市化进程》（Urbanization in Large Developing Countries），引自《巴西经济与人口统计：最近对历史模式的倒置》（Economic and Demographic Concentration in Brazil: Recent Inversion of Historical Patterns），第205～227页；特里萨·P R 卡德拉（Teresa P R Caldeira）：《墙之城：圣保罗的犯罪、种族隔离与公民权》（City of Walls: Crime, Segregation and Citizenship in Sao Paulo），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0，第233页；《世界都市化展望：2003年修订本》（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 The 2003 Revision）；芬德里：前引书，第27页；哈里·W 理查德森（Harry W Richardson）：《不发达国家中大城市的效率与福利》（Efficiency and Welfare in LDC Megacities），选自《第三世界城市》，第37页；拉里·罗特（Larry Rohter）：《第三世界城市的研究模型的兴起》（Model for Research Rises in a Third World City），摘自《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2001年5月1日出版；《芝兰哥的天堂》（Chilango Heaven），摘自《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2004年5月1日出版。

(上在近东，像开罗和德黑兰这样的巨型城市为了应付爆炸性增长的城市人口吃尽了苦头，而较小的、更加紧凑的中心如迪拜和阿布扎比却兴盛一时。1948年，迪拜是一个仅有2 5万人口的尘土飞扬的居民点，50年之后，人口接近100万人。然而，如何避免经济停滞问题一直困扰着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的城市。巴萨等：《全球化城市的兴起》；图金·内伊肯-雷冯特（Tuzin Naycan Levent）：《伊斯坦布尔的全球化与发展策略：地区政策与大型都市交通工程》（Glob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or Istanbul: Regional Policies and Great Urban Transportation Projects），第39次IsoCa大会，2003。

同迪拜一样，兼容并蓄的态度和积累独特技术仍然对城市的成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相对而言，接纳不同文化和雇佣一流人才才能帮助小

城市发挥比其规模更大的作用，例如当年的特里尔、佛罗伦萨和阿姆斯特丹等城市做到了这一点。无独有偶，21世纪的小型世界性城市，如卢森堡、新加坡或特拉维夫，它们的经济影响往往超过了人口在1000万人或1500万人、无规则蔓延的巨型城市。约瑟夫·W 孔威茨（Josef W Konvitz）：《全球化城市与经济增长》（Global Cities and Economic Growth），摘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观察家》（OECD Observer），巴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94。

在此情形之下，甚至那些地理位置优越的城市地区也面临着人口和经济的挑战。许多20岁左右的年轻人被吸引到城市，他们常常在成家立业之时又离开中心城市。在社会阶梯中向上爬的移民曾是城市复兴的主要推动者，他们现在也越来越多地加入到向外迁徙的大军之中。欧洲和日本城市中心面临着更为严峻的人口危机。大城市对年轻人有很大的吸引力，而现在低出生率减少了各阶层年轻人的人口比例，这样从乡下到城市的传统人口来源被堵死了。菲什曼：前引书，第187页；《威廉·弗里所做的美国人口普查分析》（U S Census analysis by William Frey），布鲁金斯学会；《技术重塑美国》（Technological Reshaping of America），第93页；萨拉·B 米勒（Sara B Miller）：《成本上涨时大城市努力保持新的移民输入》（Big Cities Struggle to Hold On to New Immigrants as Costs Rise），摘自《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2003年10月9日出版；《美国城市有了更少的孩子和更多的单身》（U S Cities Have Fewer Kids, More Singles），来自News Max com，2001年6月13日；威廉·H 弗里（William H Frey）：《大都市对国内外移民的吸引力》（Metropolitan Magnets for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Migrants），布鲁金斯学会，2003年10月；伯杰：前引书，第42页；弗里德曼：前引书，第40～41页。

随着经济的发展，甚至高端服务业也转移到城市之外的其他地方，许多发达国家主要城市日后的发展只有靠城市的文化和娱乐中心的功能加以维持。如H G 韦尔斯一个世纪前预测的那样，这些城市正在经历着一场变异，从以前引领经济生活的中心向“大集市、各种各样的商店、中央广场和聚会地”的暂时性角色过渡。弗格森：前引书，第42页；威尔斯：前引书，第32页。

从产生之初城市就发挥着集聚作用。长期以来，中心广场、寺庙、教堂和清真寺附近是商人出售商品的最佳地点。城市作为天然的舞台，它向周围的广大农村人口提供了许许多多全新的人生体验，这一点在远离大都市或文化中心的地区是无法获得的。第一个巨型城市罗马淋漓尽

致地发挥了城市的这种功能。罗马人吹嘘拥有当时世界最大的购物广场、多层建筑梅尔卡图斯·特拉伊尼和罗马圆形大剧场，这是罗马城的娱乐场所，不论从规模还是性质上看，在当时都是空前的。

法国哲学家雅克·埃吕尔指出，在工业时代，“娱乐技术”越来越成为“人们忍受城市病不可或缺的原因”。到了20世纪，出版物、电影、收音机和电视等大众娱乐已被产业化，成为城市居民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生产影像产品的重要城市，如洛杉矶、纽约、巴黎、伦敦、香港、东京和孟买，与媒体相关的企业在经济中所占份额日益攀升。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技术社会》（Technological Society），约翰·威尔金森（John Wilkinson）译，纽约，梵泰奇出版社，1967，第113～115页；诺曼·本鲍姆（Norman Birnbaum）：《工业化社会的危机》（The Crisis of Industrial Society），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9，第113～114页。

到21世纪初，许多城市经济政策开始偏重于文化产业。城市地区一改过去努力留住中产阶级家庭、工厂，或与城市周边地区进行经济竞争等做法，转而关注流行、“时髦”等短暂性的概念作为振兴城市的关键。B 约瑟夫·派恩二世、詹姆斯·H 吉尔摩（B Joseph Pine II and James H Gilmore）：《经验经济：工作是剧场，每项业务是舞台》（The Experience Economy: Work Is Theater and Every Business a State），马萨诸塞坎布里奇，哈佛商学院出版社，1999，第1～3页；《关于作为现代都市范例的拉斯维加斯的很好的讨论》（a good discussion of Las Vegas as modern urban paradigm），选自罗伯特·冯图瑞（Robert Venturi）、丹尼斯·斯科特·布朗（Denise Scott Brown）、史蒂文·伊兹诺（Steven Izeenour）编《向拉斯维加斯学习》（Learning from Las Vegas），马萨诸塞坎布里奇，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77。

旅游业在罗马、巴黎、旧金山、迈阿密、蒙特利尔和纽约等城市已经成为最大、最具潜力的产业之一。一些城市，如拉斯维加斯和奥兰多，通过提供戏剧性的“经历”以及吸引眼球的个性建筑和全天候娱乐服务设施而实现其快速的经济发展。

甚至在一些人们认为是不可能的城市，如曼彻斯特、蒙特利尔和底

特律，政治和企业领导人希望通过创建“超酷城市”来吸引同性恋者、放荡不羁的文化界人士和年轻的“创新人才”到他们的城市定居和工作。 基思·施奈德、沙琳·克罗威尔（Keith Schneider and Charlene Crowell）：《格兰霍尔姆斯的城市理论》（Granholm s Urban Theory），《五大湖新闻服务报》（Great Lakes News Service），2004年5月6日；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创造性阶层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摘自《华盛顿月刊》（The Washington Monthly），2002年5月出版；拉里·所罗门（Larry Solomon）：《加拿大的外包活动》（Canada sOutsourcing），摘自《金融邮报》（Financial Post），2004年3月31日出版；佩吉·柯恩（Peggy Curan）：《蒙特利尔光明的一面》（Montreal s Bright Side），摘自《政府公报》（The Gazette），2000年9月25日出版。在一些城市，高级社区、上流酒店俱乐部、博物馆与数量巨大、随处可见的同性恋和单身人口的出现，让一度荒凉凋敝的城市中心开始复兴，但这些都不能使人们联想起城市过去强劲的经济活力。艾伦·科威尔（Alan Cowell）：《曼彻斯特的崛起》（Manchester Rising），摘自《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2001年6月24日；布鲁斯·韦伯（Bruce Weber）：《艺术的树苗在美国闹市区结出了果实》（Arts Sapling Bears Fruit in Downtown U S ），摘自《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1997年11月19日；本·克拉弗特（Ben Craft）：《兄弟之爱城市在艺术上下赌注》（City of Brotherly Love Bets on the Arts），摘自《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1998年6月24日出版；《在伦敦的阴影下》（In London s Shadow），摘自《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1998年8月1日出版；尤素夫与吴卫平：《通往世界城市的道路》。

欧洲大陆的城市——最明显的如巴黎、维也纳和后冷战时期的柏林——更青睐以文化为依托的经济产业。当柏林无力挽回它作为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时，便把奔放不羁的文化界人士社区作为摇钱树。对城市的实力逐渐地不以商品出口和服务为标准，而是依据城市招牌性的陈列馆、独特的商店、生气勃勃的街道文化和旅游贸易的增长。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维也纳的伟大没能掩饰失落感》（Vienna s Grandeur Fails to Mask a Sense of Loss），摘自《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2003年8月3日出版；阿金·奥尤姆（Akin

Ojumu）：《逃离柏林》（Escape: Berlin），摘自《观察家》（Observer），2001年7月15日出版；约翰·伯格斯（John Burgess）：《反传统的复兴》（A Renaissance of Counterculture），摘自《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2004年3月9日出版；戴维·威瑟尔（David Wessel）：《如果一个城市没有阳光与空调，应该是明智的》（If a City Isn t Sunny and Air Conditioned, It Should Be Smart），摘自《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2004年2月26日出版。

安全与城市的未来

长久以来，在持续的混乱中没有任何城市体系能够长存。只有在强有力的法律和秩序统治之下，城市才能兴旺发达。城市居民至少要有某种程度的人身安全感。他们也需要一个负责而有能力的政府来监管合约并监督执行基本的商业行为法规。

维持一个强有力的安全制度对城市地区的复兴起很大的作用。在20世纪末一些美国城市复兴的关键因素，尤其是纽约，应归功于城市犯罪率的明显下降。之所以有此番成就，是因为城市警察采用了新的执勤方法以及众志成城地将维护公共安全作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20世纪90年代无可辩驳地代表了美国历史上犯罪率降低的一个伟大时代，这一点为某些大城市旅游业的发展、甚至城市人口适度回流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先决条件。埃里·利尔：《重新审视突破的窗口》（Broken Windows Reconsidered），摘自《公众利益》（Public Interest），2002夏季号；弗里德曼：前引书，第40～41页。在经历了1992年灾难性的城市骚乱之后，洛杉矶不仅设法遏制了犯罪，而且明显地完成了经济和人口的复原。弗里德·西格尔（Fred Siegel）：《美国城市的死亡与生活》（The Death and Life of American Cities），摘自《公众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2002年夏季号。

然而，虽然美国的城市安全问题有所改善，然而，在发展中国家对城市未来的新威胁又浮出水面。伯德特（Burdett）：《面向21世纪》。到20世纪末，像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这样的巨型城市，正如一位执法者所言，城市犯罪演变成了“城市游击战”。毒品走私、黑帮势力和普遍的无政府状态也同样困扰着墨西哥城、蒂华纳、圣萨尔瓦多和其他城市的诸多区域。拉里·罗特（Larry Rohter）：《里约热内卢犯罪与政治的碰撞，城市在恐惧中退缩》（As Crime and Politics Collide in Rio, City Cowers in Fear），摘自《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2003年 5月8日出版；乔纳森·佛里德兰（Jonathan Friedlan）:《墨西哥伤口中的生活：办公室，商店和饭店现金需要安全的保障》（Living a Cut Above Mexico: Offices, Shops and Restaurants Cash In Need for Safer

Ground），摘自《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1998年6月24日出版。

基本安全感的丧失不可避免地损毁了城市生活。对犯罪以及对政府反复无常的恐惧延缓了外国资本的流入，有时候城市周边的安全区域成为外国投资的理想选择。甚至在相对和平的国家，强盗式的官僚机构迫使商业投资不得不转向相对安全和政府贪污腐败较少的地区。

也许，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环境污染以及与健康相关问题的日益增长更令人担忧。世界范围内至少有6亿城市居民得不到最基本的医疗卫生条件。林登：《发展中世界城市的爆炸性发展》；威达尔（Vidal）：《疾病威胁新兴大城市》（Disease Stalks New Megacities）；托马斯·H 马夫（Thomas H Maugh）：《人类开始了土地战利品的抢夺》（Plunder of Earth Began with Man），摘自《洛杉矶时报》（The Los Angeles Times），1994年6月12日出版。这部分人口自然成了致命性传染病滋生的土壤，外国公民和富人对这种疾病同样没有免疫力。这些威胁不仅迫使当地的专业人士，还有外国投资者都寻求到国外或者更健康的郊区工作或投资。扎卡基斯-史密斯：前引书，第8、38页；洛夫奇：前引书，第23页；麦克吉尔:前引书，第21页；吉尔伯特、古格勒：前引书，第25页；马宾：《南部都市化进程中的郊区与种族隔绝》、《黑暗的航程》（Black Flight），摘自《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1996年2月24日出版。

Table of Contents

译者序
中文版序言
鸣谢
前言
序言　神圣、安全、繁忙之地
第一章　神圣的起源
第二章　权力的映射——帝国城市的兴起
第三章　最初的商业都市
第四章　希腊的成就
第五章　罗马——第一个大都市
第六章　古典城市的衰落
第七章　伊斯兰群岛
第八章　中央王国的城市
第九章　机会的丧失
第十章　欧洲的城市复兴
第十一章　财富之城
第十二章　盎格鲁——美利坚的城市革命
第十三章　工业主义及其反对者
第十四章　追求“更好的城市”
第十五章　郊区的胜利
第十六章　后殖民时代的窘境
第十七章　“远东的皇后”
结论　城市的未来
　　巨型城市的危机
　　当代城市复兴的局限
　　昙花一现的城市
　　社会分层的前景与局限
　　安全与城市的未来
　　恐怖分子的威胁